

甘肃史志



2012.3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

《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志》

编纂动员会召开



《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志》编纂动员大会10月12日在兰州召开。参与编纂工作的64个省直部门、单位和相关市、州、县政府的负责同志共计1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省政府副秘书长俞建宁主持，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李虎作了《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志》编纂工作有关情况的说明及安排意见，副省长郝远出席会议并讲话。



郝远在讲话中指出，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认真做好《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志》的编纂工作。在编纂过程中，要在保证质量上下功夫，把好政治关、内容关、文字关、体例关、资料关和审核关；要在抓好工作进度上下功夫，按编纂工作进度抓好落实，处理好质量和进度的关系，确保修志工作开好头、起好步，并顺利按期完成编纂、出版和发行工作。



怒吼吧，黄河

九 日

我们礼让，因为我们
是炎黄子孙，礼仪之邦
我们怒吼，因为我们
有黄河血脉，万里海疆

我们曾经贫穷，但
黄河没有停止过奔腾
我们曾经落后，但
泰山没有弯曲过脊梁
我们有过腐败的朝廷，但
仁人志士没有停止过呐喊
我们受过列强的凌辱，但
中华民族没有惧怕过刀枪
曾记否？倭寇犯边
自有民族英雄戚继光
擒贼复土，除暴安良
他的英勇事迹，至今
被中华民族传唱
曾记否？甲午风云

自有民族英雄邓世昌
勇撞敌舰，虽败犹荣
他的爱国精神，已经
注入中华民族的胸膛
曾记否？八年抗战
多少将士血染沙场
“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这歌声，一直
在中华大地上回荡

我们谋求发展，因为我们
没有忘记落后挨打的痛伤
我们奋发图强，因为我们
时刻牢记民族复兴的理想
怒吼吧，黄河
中国的领地，寸土不让！
怒吼吧，黄河
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



甘肃史志

季刊

2012年第3期
(总第11期)

(史志资料 免费交流)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 G01—0098 号

卷首语

怒吼吧,黄河 九 日(1)

理论研究

钩沉中国地方志的传统 张世民(4)

西垂秦史中几个问题思考 袁智慧(9)

旧志整理

正宁县家谱编修概况 关润鸿(14)

明清以来《庆阳府志》的修纂整理出版与简要评价
..... 高恒祥(18)

史地考证

祁山位置考 薛方昱(21)

石羊河流域生态变迁史略 程对山(24)

工作论坛

甘肃新编地方志 车安宁(31)

经验交流

崇信县地方志工作综述 (38)

《甘肃近代机械工业史料》编纂始末 安文迟(40)

录

篇目选登

《张掖地区志(远古~1995)》篇目 (42)

志书评议

编千年历史辑百科地情 张志纯 何成才(50)

张国臂掖的辉煌 郝玉屏(53)

《张掖地区志·文录》编纂特色浅析 何忠(56)

二百年来又一书 黄岳年(58)

一部囊括古今张掖的百科全书 唐国增(60)

资料与可读性俱佳 蒲乾亨(63)

让张掖历史源渊流长 张恒善(65)

读《张掖地区志》感想 高慧琴(67)

陇原人物

华亭历史上的名人——皇甫规 孟春贤(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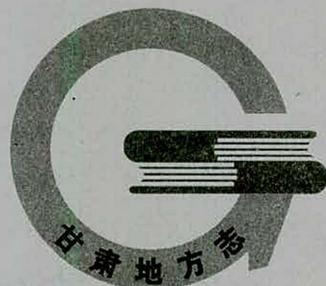
陇原颂

甘肃像什么(快板诗) 武威一宁(70)

历史回眸

甘肃民国大事记(1941—1943) (71)

延安时期的一项战略安排——陈云转岗 王杰(77)



《甘肃史志》编委会

主任:李虎

副主任:车安宁 钱旭

李振宇 孙奇明

编委委员:杨东海 李拾良

贺红梅 张正龙

石为怀

主办单位: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甘肃史志》编辑部

主编:李虎

副主编:钱旭

编辑部主任:贺红梅

责任编辑:梁兴明 陈谦

孔令奇 石战涛

司德芳 高天成

王旭

本期责编:孔令奇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
南路51号统办一号楼九楼

邮编:730000

电话:0931-8960622

电子邮箱:gsdfz911@163.com

印刷:甘肃省政协办公厅印刷厂

电话:0931-8960384



钩沉中国地方志的传统

张世民

首先，我们要总结近三十年来中国地方志事业的主要成就和缺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重新启动了中国地方志的编写工作，提出了新的指导思想，明确了新的编写体例，增添了新的内容要素，也初步探索和形成了有当代特色的学科理论。我们强调历史的真实性，主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知识创新来推进修志工作，取得了非常丰富的学术成果。这些做法是过去地方志书中所没有的，这些做法，具有基本的、建设性的意义。但是在现实的编纂实践中，我们的地方志工作有什么缺点呢？第一，强调了历史性，忽略了周期性。地方志本应与现实紧密结合，结果却成了历史杂烩，淡漠了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某些志书编纂周期过长，志书完成之日，也是资讯落伍之时。第二，著述有共性，但丧失了个性。如果把虚套的过程性文字筛选一下，不少志书就很难找出有个性的内容；强调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仍然限于资料的处理层面，而看不见编者的学术立场。第三，重视了政治性，却忽视了学术成效。我们编写地方志的指导思想，在

于“但求无过”，也就缺少创新，缺乏新知，缺失了必要的感情色彩。许多志书写得干巴巴的，没有真情灌注，编者也不敢将个人感情倾注其中，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客观性。出现这些缺点和不足，当然是新编志书在探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也是对传统地方志流于平面化的一种反驳。地方志工作者要对这些缺点和不足负责，不能单说编写经验有所不足，而要看到我们尚未将历史传统和编纂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甚至学到了皮毛而没有领会其精神。

地方志要贯彻落实新的指导思想，就必须设法改进当前的编辑工作。但是片面强调思想更新，而抛弃了优良的学术传统，那就要犯严重的错误了。我们的工作改进，主要在于形式方面，但不应限于形式。我们要进一步搞好第二轮地方志工作，尚需温习地方志的传统，在继承的基础上寻求创新，而不能简单地将对传统的割裂视同创新之举。

二

地方志具有中国的民族个性。有人说，地方志是中国独有的著述范式，西方国家没有这种著述

传统。正因如此,我们无法通过向西方学习,来改进地方志的著述范式,但在当代地方志的编纂实践中,借鉴源自西方传统的章节体、年鉴体等著述范式,实际上也是向西方学习。这种学习,是保持地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道活力源泉。但是,第二轮地方志编写中,还有没有钩沉中国地方志传统的余地呢?我看还是有的。

中国地方志有两种传统:一种是官方修志。一般是在地方行政长官的主持下,邀请专家学者来进行编写。搜集资料的或许是当地学人,但担任总纂的,可以是当地耆宿,也可以是异域鸿儒。比如明代嘉靖《陕西通志》,监修者是陕西布政使赵廷瑞,总纂马理、吕楠都是当地名儒;清代状元毕沅乾隆年间先后担任陕西巡抚、湖广总督,一些有名幕僚如孙星衍、洪亮吉、章学诚等,都参与过陕西、湖北地方志书的总纂,但他们都不是当地人。官修志书的特点,就是其官方的权威性和正统性。

另一种是私家修志。一般是当地人修当地志书,而且多是博学鸿儒,或地方耆宿。譬如明代弘治状元康海、吕楠,分别编写《武功县志》《高陵县志》,都是私家修志的典范。某些私家修志,甚至还有父子接替的特点。譬如康海与乃父康鏞两人,一个搜集资料,一个执笔撰写,就具有家族性的继承性,编撰者也饶具独立的立场。

我们要编写好当代地方志,固然要采用官方修志的基本立场,但在学术研究方面,则要重视私家修志的独立精神。有人讽刺说,地方志工作者是井底之蛙,是乡愿主义,长久依附于官场生态,不存在独立的人格精神。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地方志工作者应该是知识分子,甚至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尽管他们都有一定的地域性,但其公共人格是必须充分肯定的。就国内外的著书人格而言,根本不存在可以超越国家或地区限制之上的公共人格,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也有大小之分,区域性、民族性也是一切公共知识分子所不可避免的。就当代来说,我们不必企求所有的地方志工作者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正如一切知识分子未必都是公共知识分子一样,但是当代地方志工作者作为一个区域的舆情掌握者,应该努力保持和发挥其

独立的文化人格,则是毋庸置疑的。

在传统地方志书中,地方志工作者经常以表达独立的思想立场为个性标志。且不说康海、萧之保等私家修志工作者,他们常常通过张扬独立的个性而实现其公共人格;即使像毕沅、马理等官方志书的监修者和总纂者,他们也都曾将个人观点寓于著述之中,譬如嘉靖《陕西通志》中所署名的“雍人曰”,其实就是其个人观点的直接表达。他们对于国家问题、民生问题和官场利弊的分析,都带有强烈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具有鲜明的著述个性和感情色彩。

我们学习传统的地方志书,既要总结官修志书的组织特点,尽量发挥官修志书的权威性和公益性,同时又要师法私家修志所凸显的独立的公共人格。我们固然不必因袭传统地方志的具体做法,但是努力继承这种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张扬其民族个性,将历史经验和现实诉求相结合,将传统范式和当代创新相辉映,仍然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三

传统地方志工作的一些组织经验和工作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师法。举隅如下:

采访员制度。地方志编写要面向社会,要将社会变动的鲜活信息集中起来,就要推行采风制度。从先秦到明清时期,对于民间歌谣的采风制度,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在传统的采风制度中,设立采访员,由采访员直接进入社会各界,通过互动联络来集纳社会资讯,是一种重要的工作方式。采访员可以来自各个社会阶层,来自不同的公共人群,尤其是参与过社会公益工作的人员,应该成为采访员的主要来源。在首轮修志工作中,我们对于采访员制度使用不够主动,甚至完全依靠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而完全忽视了独立的采访员制度。在第二轮修志工作中,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作为地方志资料的主要提供者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事实上其工作范围逐渐缩小,涉及工矿企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亟需通过专

门社会调查加以征集,因而重新推行采访员制度很有必要(当然,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将社会调查交给学术中介机构也是保证其客观性的一种重要渠道)。

客观实录制度。对于一些重要志书的编写,不仅要考虑资料的征集、整理问题,更要考虑体例编排和思想指导的问题。所谓思想指导不应该是抽象的,更不是单纯依凭今日的思想观点来扭曲历史事实,而要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志书中不可能缺失了言论,所谓述而不作不可能完全做到,甚至压根儿不必如此去做。孔子当年主张述而不作,其实是寓观点于书法之中,这也就是“春秋笔法”,其实质在于有所避讳,有所褒贬。司马迁的《太史公书》中,也继承了孔子的春秋笔法,但司马迁不再随意避讳,而是通过具体事实的叙述,来表达个人的褒贬态度。对于尊者、亲者,也不是一讳到底,而是讲究必要的方式、方法。譬如对于汉高祖、汉武帝的态度,就是他运用叙述性体现褒贬态度的一种具体技巧,那种“把立场观点放在脸上,开口见喉咙,缺乏技巧”(徐铸成语)的做法,其实也不利于志书编纂艺术的提高。现在的新编志书,在指导思想的运用方面,明显有一种庸俗化的倾向,有其标签而无其作为,结果不但毫不深入,反而有所僵化、有所套化。追根究底,同样不利于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分析。对于包括重大事件、人物传记等问题采取客观实录制度,依据历史文献来进行统裁,通过专业审查来加以校正,就能尽量规避个人的主观倾向,更好地体现志书的权威性。有的新编志书缺失了业务监督,将个人的片面倾向灌注其中,歪曲了历史事实,这种做法是必须克服的。

资料长编制度。志书的编写,要有编辑层面和总编层面的区别。不要让普通编辑一面南墙走到底,走不通也要走,更不要期待主编、总纂统揽一切,包办一切。我们既要发挥编辑的基础性作用,又不能不强调工作程序。编辑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资料长编制度来落实。我们无法确知司马迁当年撰写《太史公书》时,是否有专门的学术助手,但以其从太史令到中书令的职务升迁,

以及实际支配权力的提高来看,这部史书不可能完全是私家修志,他也不可能没有一个学术助手。至少,他作为乃父司马谈的继承者,在政治上、学术上和思想上有过师承关系,他本人就是乃父的学术助手。司马迁与汉武帝时期包括董仲舒在内的学者的师承关系,也人所皆知。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不是五经博士,不是皇帝的“顾问官”,但是他的现实身份和政治地位,决定了他的整个著述活动不是孤立的、孤独的,他自称“藏诸名山,传之其人”,实际上并未锁入金匮,加上密钥,成为旷世罕睹的私家著述。至于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毕沅撰著《续资治通鉴》,都有多位重要的学术助手,帮助他们料理一些资料长编层面的基础性工作。当代第二轮地方志编写工作中,要重视资料长编制度,在编辑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主编、总纂的主导作用。

学术引进制度。地方志事业是一项可持续发展的事业,因而需要不断养成人才、培育人才。地方志事业的人才来源可以是多样的,但无非是管理人才和业务人才两种。其中管理人才是必需的,他们可以提供后勤保障,但不能因为实行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就认为地方志的一切工作都是管理层面的事情,依靠行政工作就可以完全代替一切;业务人才的生成和培育,在地方志工作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非常必要的,都是不可或缺的。要培养业务人才,就必须借鉴传统的学术引进制度。因为在我国的高等院校中,并不直接培养和生成地方志业务人才,一些历史学专业、档案学专业或其它社会科学专业的毕业生,要适应地方志工作的需要,还必须通过扎实的、手把手的业务训练,否则就很难养育成一支合格的地方志工作者队伍。所谓学术引进制度,也就是通过富有经验的修志工作者对于后来者的直接带动,使之逐步适应工作环境,掌握工作方法,独立地开展各项业务。现在的人们不愿“好为人师”,但这种做法仍是必要的。

监修、总纂并行制度。志书设立编纂委员会,是基于行政监督的需要;而主编、总纂亲自动手,更是题中应有之义。现在不少志书的主编是挂名主编,总纂也是甩手掌柜,主任与主编职责的交

又,主任协调工作量的增大,是导致此项工作流于挂名的原因之一,但是主编、总纂总是挂名,不仅不能保障志书的学术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学术腐败的一种表现。行政协调是必要的,但不能用行政协调代替学术原创;主编、总纂亲自动手,正是其参与学术原创活动的重要保证。主编、总纂是编辑人员的一种,不能忘却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主编、总纂要参与规划学术目标,撰写著述要领,梳理编纂经验,反思工作流程,尤其是对志书的纲领性要求,诸如科学分类和篇目大纲、主旨内容和工作方法,都需要主编、总纂亲自确定,亲力亲为。尽管传统正史的编写,经常以当朝宰相领衔其事,个别正史的署名者甚至只字未赞(如《旧唐书》的领衔者刘昫),但这恰恰是正史被意识形态化的一种官场陋习。传统志书的监修,一般由地方长官领衔,但主编、总纂多由学者亲力亲为。在第二轮地方志编写中,我们要努力克服这种封建的官场陋习,将现代知识产权理念贯穿到整个修志工作中来。

业务探讨制度。政治学习是养成一种眼光,培养一种视角;业务学习、业务探讨同样是培养一种眼光、养成一种视角。在很大程度上说,政治眼光有前瞻性,但反应的却是现实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观点;而业务探讨有专业性,但体现的却是志书的学术质量和文化水准。业务探讨制度,是保证志书适应社会现实,体现学术质量的一种制度。对于业务探讨制度的执行情况如何,探讨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怎样,以及是否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都是这种制度有无价值、价值高低的具体表现。业务探讨要走出封闭,走向人群,还需要有一个民主的、开放的公共话语平台,这就是地方志学会、研究会等学术中介组织,通过学术中介组织来容纳各个方面的专业人才,才能真正彰显地方志的学术性和社会性。

四

地方志工作的第一使命是做好编辑工作。过去地方志工作者的技术职务叫编辑、编审,实际上

就强调了地方志工作的编辑特点。有人称编辑是裁缝,总是为别人做嫁衣裳,自己的嫁衣总是做不出来。唐代有名的史学家刘知几,深感御用做嫁的困难和艰窘,退而求其次,专门思考如何做嫁衣的问题。如此一来,他的学术嫁衣研究——《史通》反而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不过,我要说的是,与报纸编辑、出版编辑相比,地方志的编辑有其相对的独立性。首先,与报纸编辑相比,两者同样有直接编采的任务,都要对所采撷的资料文献加以编缀处理。但是报纸编辑面对的是鲜活的现实资讯,而地方志编辑面对的是陈旧的历史资讯。现实中的意识形态比较鲜明,编辑人员容易拿出自己的判断立场,而历史资讯相对陈旧,其意识形态有所钝化,现实与历史之间意识形态的对比感就比较明显,这就要求地方志工作者进行科学辨析和学术考证,然后才能得出较稳妥、客观的结论。报纸编辑所表现的是现实的意识形态,其基本评价属于现实的功利评价;而地方志编辑所表现的固然也是现实的意识形态,但因与历史资讯出现了一定的距离感,某些现实的功利诉求相对疏离,所以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历史的审美评价。究竟怎样还原真实的历史现象,将现实的社会眼光投射进历史纵深而又不扭曲历史真相,乃是衡量地方志编辑学术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尺度。

其次,与出版社编辑相比,地方志书在出版环节仍然要遵循现行的出版规范和要求,但就编辑环节来说,地方志编辑与出版社编辑也有较大的差异。出版社编辑在选题上可以体现其社会倾向,但是不能随意改变著作权人的基本立场。在很大程度上,除了出版编辑自变角色成为著作权人,或者通过向特定的著作权人约稿来体现其社会倾向,否则他们都不能随意强加自己的学术立场。出版社编辑参与加工的图书大都已经成熟或基本成熟,即使有某些尚不成熟的书稿,也都有了既定的学术立场。而地方志的编辑则需要通过原料加工、改造的功夫,从原始档案、资料文献中爬梳、整理话语线索,先是编辑资料长编,然后打造成成熟的志稿。有的志书,甚至要求初始编辑处理到位、处

理到家,主编、总纂的缺位也要由责任编辑来补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志工作不单是一种编辑行为,更重要的还是一种著述行为,是一种有原创特点的著作权人的行为。与出版社编辑相比,他们的工作战线更长,工作领域更宽,工作周期更久,著述色彩也更加浓郁。

要做一名出色的地方志编辑,至少要有两套本领:一套本领是摸清舆情或行情。换句话说,就是要明确政策界限,了解实际情况,善于抓住问题的关键。对于现在的地方志编辑来说,要想掌握社会各个行业的全部情况,熟悉当地社会的角角落落,恐怕也不现实;但是熟悉行情、了解区域,又是我们对所有地方志工作者的基本要求。用时间换取熟悉,用投入获取行情,是地方志工作者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假如一个地方志工作者对所在的那个区域、那个行业茫然无知,一窍不通,要让他热爱工作,搞好工作,就是痴心妄想。

另一套本领是熟悉编辑技巧和规范。地方志著述有自己的一套相对独立的学术规范,这套学术规范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严格的表达程序,但是这套规范也有一定的张力和弹性,不可机械对待。地方志的学术规范,一个是其独特的分类体系。这套分类属于传统的分类体系,与近代西方的科学分类法不尽相同,很难用近代的学科概念来直接对照,但是它的科学性和逻辑性仍然显而易见。一个则是它的独特的编写体例。地方志的编写体例,包括了体裁、用语、技术规范和著述范式等。在著述范式上,当代志书所常见的章节体,其实来自近代西方学术传统,而传统地方志的平列分目体,主要体现在基本内容的部类划分上。至于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体裁,至今仍然在活化使用中。另外,在语言表达上、技术规范上,新编志书都有与时俱进的特点,但是传统志书语言简洁,内容写实的优点,仍未丧失其顽强的感染力。

地方志编辑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编辑,不能满足于熟悉编辑技巧,还要努力了解不同的行业。各位编辑可以有所专攻,有所特长,但是成为博学广识的“杂家”,大略熟悉不同行业的情况也非常必

要。尤其是从科学分类的角度,熟悉各个行业的基本分工和工作重点仍然是最起码的要求。如果是一部市县志的编辑,不但要掌握行情,还要熟悉地情,因为总的区域有限,所以熟悉地情也有客观的可能性;如果是一部省志的编辑,至少要了解部分行情,掌握省情的基本信息。至少,要掌握那些公共性、公益性较强的省情信息。作为一部志书的主编、总纂,要比普通编辑懂得更多一些,了解更广一些,否则就不配做一名主编或总纂。主编和总纂既要有深厚的业务知识,又要有足够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并非丧失原则立场的随意性,而是在原则基础之上的变通和适应。主编、总纂的协调能力和统揽能力,也可以在这个方面有所体现。

地方志编辑也要有开放性,注意吸纳那些掌握有行业知识和区域知识的社会人才。这些社会人才,一开始并不具备地方志知识,但是通过适当的培训和引导,使之逐步成为地方志机构的外援力量,成为地方志工作的有力后盾,甚至成为地方志工作者的直接顾问。就一个县区来说,不管是长期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人员,还是各个行业的资深当行者,都可以设法吸引到地方志工作者中来。事实上,历来的地方志工作者,尤其是担任采访员和审稿员的人员,也都是从不同社会界别、不同行业中邀请来的行家里手,他们未必皆熟悉地方志编写技巧,但是他们对于特定区域或行业的熟悉程度、认识深度,又是地方志工作者难以到位的。对于这些社会人才的广泛吸纳,正是地方志事业走向社会、走向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

(作者系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市县志处处长)



西垂秦史中几个问题思考

袁智慧

二十世纪末,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发现,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多年来的一些历史谜团得到破解,秦史研究中,关于秦国初创、秦人东扩、秦国故都、秦国西垂陵园及西畴等重要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然而,从现有的一些著作和文章当中发现,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在此,笔者不顾浅陋,就几个问题的一些思考整理出来,求教于专家。

一、“秦附庸”附于谁

秦国初创于周孝王时期,嬴非子(即“秦嬴”)为第一任国君。《史记·秦本纪》记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息养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谓之间,马大繁息。……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这之前,秦人称嬴,不称秦。“秦”的名称,由此开始。班固《汉书·地理志》说:“后有非子,为周孝王养马于汧谓之间。孝王曰:昔伯益知禽兽,子孙不绝。乃封为附庸,邑之于秦,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邑之秦”的“秦”,就是秦国的第一个都邑,其位置,现在普遍认为在今天水市东北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境内。

最初的秦国地盘很小,称为“附庸”。《史记·秦本纪》中也记载:“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秦被称为“附庸”,按当时惯例,一方面,地盘非常小,不到五十里;另一方面,在隶属关系上,只能隶属于诸侯,不能直属于周天子。《礼记·王制》记载:“附于诸侯曰附庸。”《孟子·万章下》说:“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由此可知,秦国初创时期,只是一个依附于地方诸侯国的附庸小国,地盘很小,没有独立性,不能直属于周天子。现在有些著作上仍把秦附庸国,说成周朝国王的附庸,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非子居住的“秦”,当时只称为“邑”。秦邑,相当于秦附庸国所依附的“诸侯国”的一个重镇而已,还够不上“都城”的级别。

非子“秦邑”级别较低,为“附庸”,不达天子,附于诸侯,那么,“秦附庸”附于谁呢?按照当时情况,只能依附于“大骆犬丘国”。因为,“犬丘”是非子父亲大骆之族的地盘,居住历史悠久,势力较大,当时,虽然不是周朝的分封国,但实际上是具有诸侯实力的地方部落国,周孝王都对它很尊重。《史记·秦本纪》记载:周孝王分封非子时,“孝王欲以为大骆嫡嗣”,但由于申侯的建议,孝王就把非子改封于秦,大骆之地留给了大骆的小儿子成(申侯女所生)。由此可知,“犬丘”之地,是秦非子父亲大骆的政治中心。犬丘不但是大骆犬丘国的都城,也是秦非子附庸国的政治中心。秦邑,只能算是秦国雏形时期

的小驻地,还不能称为都城,“秦”的一切还隶属于犬丘国。

秦附庸国受封之后,在秦邑居住的时间很短,有四任君主,即秦嬴(非子)、秦侯、公伯和秦仲,大约四十多年。到了秦仲的儿子庄公,又迁回到原犬丘之地。庄公从秦邑搬回犬丘居住之后,不是居住原地,而是向西推进,居住在“西犬丘”。《史记·秦本纪》记载:“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庄公居其故西犬丘。”因为,此前,原大骆犬丘曾被戎人灭掉,城池定会受到毁坏。于是,庄公迁居“西犬丘”,“西犬丘”成了秦国的唯一都城。此后,庄公、襄公、文公等都以此为都城。庄公“西犬丘”与大骆犬丘城不在一处。庄公“西犬丘”位置大约在大骆“犬丘”的西面不远处,相当于今天礼县大堡子山东侧附近。王国维也认为秦庄公返回西垂之后,“则又西徙”。从非子受封到庄公之前,秦国

作为“附庸”小国,名义上封于“秦邑”,实际上依附于大骆犬丘国,“秦附庸”仍受犬丘国统辖。后来,庄公直接迁都“西犬丘”。《史记》载,庄公“及其先大骆犬丘地并有之,为西垂大夫。”襄公时,秦国被周朝正式封为诸侯。

二、“西”、“西县”与“西垂”、“犬丘”、“西犬丘”等名称的关系

史籍当中,关于陇右西垂秦国故地的名称,有多种叫法(称呼)。如,西垂、犬丘、西犬丘、西、西县等。同样在《史记·秦本纪》之中,也不一致,有时,称“西垂”,有时称“犬丘”,也有时称“西犬丘”,有的地方还称为“西”,秦襄公在西垂设立的宗庙也称为“西畴”。笔者分析认为,西垂这片地方本名为“西”。秦庄公《不其簋》铭文中就有“西”的地名。秦朝在此设立“西县”,也取义于“西”,不称“犬丘”或“西垂”。又据《史记》记载,秦二世时,大臣们给二世奏报时说:“先王宗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这里的“西雍”,即“西”和“雍”两个地方,西,即“西垂”,雍,即雍都。到汉代,司马迁、班固等称西县之地为“西垂”或“犬丘、西犬丘”,不称“西”。这是为什么呢?笔者由此推断,“西”、“西县”是秦人自己的地理名称,“犬丘”、“西犬丘”、“西垂”是其他族人对“西”地的称谓。秦人从庄公到二世时,一直称自己的西垂祖地为“西”、“西县”,不称“犬丘”和“西垂”。别族称“西”地为“西垂”,不光是汉代司马迁和班固,早在西周孝王时就这样。据《史记》记载,非子养马有功,孝王要封赏,当时与犬丘大骆部族为邻的申国国王“申侯”与孝王的谈话中就有“保西垂,西垂以故和睦”之句。依据上述史实,可以将秦国早期都城“西垂”之地,也可称作“西”或“西都”。

西垂、西都之地,作为秦人故里和秦国故都,秦人在此活动的历史,最早可上溯到“和仲宅西”。就从记述可靠的殷商时期“中湫”“保西垂”算起,到秦始皇帝统一天下,至少在九百年以上,基本上包括殷商后期和整个周朝(西周到东周)。西周前期(包括殷商后期),秦人先祖虽然没有以“秦国”命名,但已经有嬴姓部落之国存在。西周中期非子始封为“秦”,到秦文公迁都之前,这里就是名副其

实的“秦国”国都。文公之后,这里虽然不是都城,但仍是故都、陵园及宗庙之地。刘瑞先生《秦信宫考》一文中说:秦西都“一直到秦始皇时他的地位依然重要,原因与其地有先王宗庙和寝陵有关。”(见《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五期)。按照《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直到二世纪时西都(西垂)故地仍有先祖宗庙,地位依然重要。关于“西都”的地理位置。祝中熹先生说:“西垂又名犬丘,即尧、舜时代肩负‘寅饩纳日’使命的和仲一族西迁后所宅之‘西’。它的位置,汉晋至唐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就是汉代陇西郡的西县。”(见《早期秦史》)《史记·五帝本纪集解》郑玄说:“西者,陇西之西,今人谓之兑山。”《正义》引《括地志》说:“秦州上邽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是也。”按《水经注》记载,“西县故城”在今礼县红河乡境内。《晋书·地道记》又记载:“天水始昌县,故西城也。”《水经注》中还载“始昌峡”和“始昌城”位置不在今红河乡,在今长道镇和盐官镇之间。祝中熹先生经过大量考证说,“西县城当在西和峡口与祁山之间,决不会在如《水经注》所说西北偏至阳廉川,即今礼县红河附近。”他认为今礼县永兴乡古称“店子上”,是古代“天嘉县”位置,也就是秦汉时代的西县城所在地。赵逵夫教授《略论“空城计”的有无与西城地望》一文认为秦汉至三国的“西县城”治地在今长道镇。上述两种观点,也并不矛盾,因为,礼县永兴乡和西和县长道镇连为一体,虽属两县两镇,实为一地。

按照祝中熹先生观点,秦人先祖居住陇右西地(西垂)的时间,还应该上溯到“和仲宅西”。《尚书·尧典》记载:“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宅西,意即居住“西”地。到夏初之际,秦族部落分布较广,“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见《史记·秦本纪》)夷狄,就包括“西都”地区。商朝时期,秦人之祖中湫部落就“在西戎,保西垂”(见《史记·秦本纪》)。到西周时,大骆、非子居住犬丘。由此看来,秦人祖先在西部陇右地区的居住时间很早也很长。《水经注》记载:西汉水支流杨廉川水“东南流,经西县故城北。秦庄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与其先大骆大丘之地,为西垂大夫,亦西垂宫也。”西都故地之所以称为“西”,是秦人鸟图腾的反映。“西”,从字形

字义分析,指秦人居住的地方。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上说:“西,鸟在巢上也。”小篆字形很像鸟儿栖息在巢上。这就是“西”的原始意义。作为地名意即“鸟儿栖息的地方。”西犬丘、西垂,怎么是鸟儿栖息的地方呢?因为,秦民族为鸟夷、鸟民族。意思即这里是鸟族秦人居住的地方。祝中熹先生认为,秦人为阳鸟部族,崇拜鸟或太阳。“西”或“西山”,是太阳落下的地方,于是后世“西”字又演变为“东西南北”的“西”。也有资料说,“西山”也叫“兑山”或“崦嵫山”,是太阳落的地方。秦人由于崇拜阳鸟(太阳),所以,他们的地名中喜欢用“阳”,如,平阳、栌阳、咸阳,而且,有一个地名就叫“阳”。远古时代关中及中原地区的居民对太阳在西部落山感到很神秘,于是产生“夸父逐日”等神话。史书记载,太阳落山的地方有“西”、“西山”、“兑山”、“崦嵫山”。《山海经》还说:“常羊之山,日月入焉。”西犬丘、西垂,后来作为秦国的都城,秦国人自己称“西”。居住在秦国“西都”之地的嬴姓部族,是秦人的正宗之族,其它嬴姓部落,只能算是旁系亲族。秦人在陇右西垂(西都)居住时间长,而且,科技文化也发达。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编钟等乐器和车马,都非常精美。《诗经·秦风》前四首,就是西垂秦地的作品,也是陇右地区天水、陇南最早的文学作品。

由于时间太久远,史料对秦在西都的历史有记述,但实际地方又没有建筑遗迹可寻,只有通过地下文物加以印证。《史记》记载较明确的是,襄公、文公葬于西垂,《史记》又载,文公“葬西山”,“宁(宪)公葬西山”,“宪(宁)公居西新邑,死,葬衙。”上述记载中,襄公葬西垂,无歧义;文公既葬西垂,又葬西山,这说明“西山”即“西垂”之地的“西山”;宁(宪)公居住“西新邑”,既葬“西山”,又葬“衙”,说明“衙”与“西山”为一地,所居“西新邑”也在西都故地。大骆、非子、秦仲和庄公等陵墓,无明确记述,但不会超出西都之地。根据以上情况看,西都之地的城池,不止一处,有犬丘、西犬丘、西、西垂宫和西新邑等等,秦人墓地,也不限于一处。墓地名称,按照上述《史记》所载也有几个名称,如,“西山”、“西垂”、“衙”、“西陵”等。它们是一

个地方的不同名称,还是几个不同地方的名称,有待进一步研究。按照酈道元《水经注》的记载,秦国故都在西汉水上游的红河、盐宫一带,但是,近年来秦公墓地又在西汉水中游的大堡子山一带发现,而且,大堡子山墓地也范围较广,包括大堡子山、圆顶山、赵坪、捷地、长道等多处,都有出土。此外,从蟠冢山、祁山、兑山(西山)及崦嵫山等山名的命名来看,秦人墓地也不会限于一处,有可能分布在西汉水中上游的大片地区,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只是其中一处。“蟠冢”,按照字义,也是陵墓。

至于秦国在西都地区的宗庙,有记载者,只有“西時”,这是见诸史籍的西都之地的唯一宗庙。《史记·秦本纪》记载:“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時”。《史记·始皇本纪》中又载:“襄公立,享国十二年,初为西時。”《史记·封禅书》也载:“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从这些记载可以推断,西時,一定是秦西都之地的大型祭祀场所,规模不会太小。

三、始皇西巡路线与鸡头山位置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在灭六国的第二年,即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有一件大事为“西巡”。《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写道:“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陇西,即陇西郡,范围相当于后来的陇右,包括今天的天水、定西及陇南北部等地。北地,即北地郡,就是现在的平凉庆阳一带。回中,即“回中宫”,在今陕西宝鸡附近。关于“鸡头山”,多年来,普遍认为是今平凉市崆峒山,也有人说是今成县鸡山。1997年新编《西和县志》认为是今西和塔子山。对此,笔者通过考证认为,秦始皇西巡所登“鸡头山”,是今天陇南市西和县东北二十多里的云华山。

首先,对《史记》所载始皇西巡的路线和地域范围进行分析。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按此记载来看,始皇西巡的地方是陇西和北地;顺序是先到“陇西”,后到“北地”。“陇西”和“北地”,都是当时的郡名。

始皇西巡时到达陇西、北地两郡辖地,是否到达郡府驻地,不得而知。再结合陇山地形来分析,陇右西垂与关中咸阳之间,有一道南北走向的陇山山脉阻隔。关中与西垂的交通路线主要有南、北两条。北面经陇县、张川、清水、天水到西垂,南面经故道凤县、徽县、鸡头道进入西垂。有些著作认为秦始皇西巡时先从咸阳到北地,再向西南到西垂,然后又经北地,过回中,返回咸阳,这是一种错误的结论。若把《史记》记载与陇山地形相结合,就可以推断出,始皇西巡路线,是从关中“咸阳”先来到陇西郡所辖的今陇南、天水等地,然后才到北地郡所辖的今平凉一带。这是说始皇西巡所到的大致区域。接着,《史记》又点出了始皇途径两个具体地点,即“出鸡头山,过回中”,以进一步标示西巡的具体路线。秦始皇巡陇西、北地二郡之地,在陇西郡境内出“鸡头山”,在巡完北地郡之后,路过“回中”返回京城咸阳。因此,可以认为,秦始皇所登鸡头山,在陇西郡范围,不是北地郡范围。平凉当时属北地郡。所以,认定平凉崆峒山为鸡头山不能成立。

第二,秦始皇西巡的目的主要是祭祖,西和云华山正好地处秦国西垂故地。近年来,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发现,已经完全证实了史书记载秦人故地秦国故都在今天陇南天水交界的西汉水上游地区,即古西垂、西县之地。这里有秦国的先祖宗庙及陵墓,也有祭天所用的“西畴”等。秦人先祖早在夏商时代就居住西垂,后来,非子牧马有功被周孝王封为“附庸”,到秦襄公时,犬戎攻入镐京,灭了西周,秦襄公率兵全力以赴保卫周平王,把平王一直护送到东都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秦襄公的举动使周平王感激不尽,于是,平王就把“岐以西之地”许诺给了秦襄公,并且承认秦国诸侯地位。从此,秦国正式成为诸侯国,并且,不断发展,地盘逐渐扩大,后来,把都城从西汉水上游平原迁到了陕西关中,直到统一天下。在古人的心目中,天地、先祖是非常神圣的。所以,秦始皇灭六国之后,首先考虑的就是到西垂故地祭奠先祖。秦民族本姓嬴,以鸟为图腾,称为“鸟民族”。其居住地西垂,原名为“西”,后设“西县”。西县周围地名、水

名,多以鸟类命名,如:鸡头山、凤凰山、鸡水、鸡谷、燕子河等等。又据史书记载,直到秦二世时期,西垂故地都一直保留着秦人宗庙,而且保持着定期祭奠的惯例。

第三,西和“鸡头山”是古“鸡头道”的必经之地,史书多有记载。

朱绣梓民国《西和县志》引述《后汉书·隗嚣传》记载,认为后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夏闰四月,王孟所塞“鸡头道”,就是今西和县云华山古道。唐代《元和郡县志》也说:“鸡头山在上禄东北二十里,隗嚣使王孟塞鸡头道即此也”。这里的“上禄”,就是今西和县城。酈道元《水经注·漾水》记述,西汉水向西南流到祁山军(今礼县祁山堡)南面位置时,有一条叫“鸡水”的河流汇入,这条“鸡水”,南出“鸡谷”。结合实地位置来看,“鸡水”就是今天的西和县长道镇大柳河,大柳河谷就是“鸡谷”。顺着大柳河谷向北,就是西汉水河谷平原,正好是秦国西垂故地;大柳河发源地就是云华山,而塔子山则是云华山脉的最高峰。由此翻山向南,就是今天的马元河谷,沿着马元河(麻沿河)谷向东行走,可通徽县,过两当,进入凤县“故道”,到达宝鸡关中。依此分析,再结合《史记》所载始皇西巡先陇西后北地的顺序,可以断定,当年秦始皇是从这条道上来陇西郡地西巡和祭祖的。然后,折向东北进入北地郡所辖地方,路过“回中宫”,返回咸阳。整个行程路线为顺时针方向。有些著作上曾说,始皇西巡路线为从“咸阳”到“北地”,再到“陇西”,后又折回“北地”,过回中返回“咸阳”,是错误的。

第四,从当时交通条件讲。《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的第二年(前220年),就“治驰道”。裴骃《集解》中应劭说:“驰道,天子道也。”当时驰道在全国四通八达,遍及全国。《汉书》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可见当时驰道的等级是非常高的,质量也就不会差。另据《汉书》记载,当时驰道是“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由此可知,秦始皇时代,不仅长城修得非常牢固,而且“驰道”建设也非常过硬。秦始皇就是沿着这些驰道巡游天下的。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

载,始皇西巡与“治驰道”同年进行。始皇由故道西巡,交通条件如何呢?追溯秦国历史,秦国为了开发西南地区,在交通上很早就着手,在秦岭西部宝鸡到凤县之间修筑栈道。《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栈道五尺”。秦国派李冰父子很早去经营成都平原,修筑都江堰工程,都是有一定的交通条件作基础的。不仅如此,秦国在早期居住陇右西垂时期为了东扩,就已经非常重视陇山(陇坂)东西的交通。从天水东北的清水、张川到陕西陇县之间有交通道路;南面在陇南、天水与关中交界的地方,也一定有道路可通。天水放马滩发现的战国木版地图和纸地图等,就反映了当时秦国为了面对东面诸侯各国,非常重视西垂大后方的经营,其中交通的畅通是极为重要的方面,所以,在具有几百年经营基础的西垂老根据地,始皇能首先西巡祭祖,肯定有非常便捷的道路可走。

又据史书记载,西和“鸡头道”,直到宋代都很重要。嘉定元年(1208年),宋金议和,安丙上书,西和境内“又增鸡头山,咸以民卒守之”。1218年,金兵取道“鸡头山”,拔西和州。

第五,秦始皇西巡所登临的“鸡头山”在西和(古成州)境内,早在唐代就已确认,而且,中华书局《史记》注也无异说。

唐代李泰《括地志》记述,“鸡头山在成州上禄县东北二十里”,“回中宫在岐州雍县西四十里。”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1985年印刷的《史记》所附张守节《正义》引述《括地志》这段话,肯定了鸡头山在上禄县东北二十里。而且,《正义》还引《后汉书·隗嚣传》说:“‘王莽塞鸡头’即此也。”《正义》“按”说:“原州平高县西百里,亦有笄头山,在京西北八百里,黄帝鸡山之所。”此外,唐代《元和郡县志》也记载:“鸡头山在上禄县东北二十里。”古代陇南有几个“上禄县”,不同时期位置不同。唐代“上禄县”,治地在今西和县城。《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志》所载,“鸡头山”在成州上禄县东北二十里,正好就是今西和县东北二十里的云华山。因为,唐代前期,“成州”治地在“上禄县”,即今甘肃陇南西和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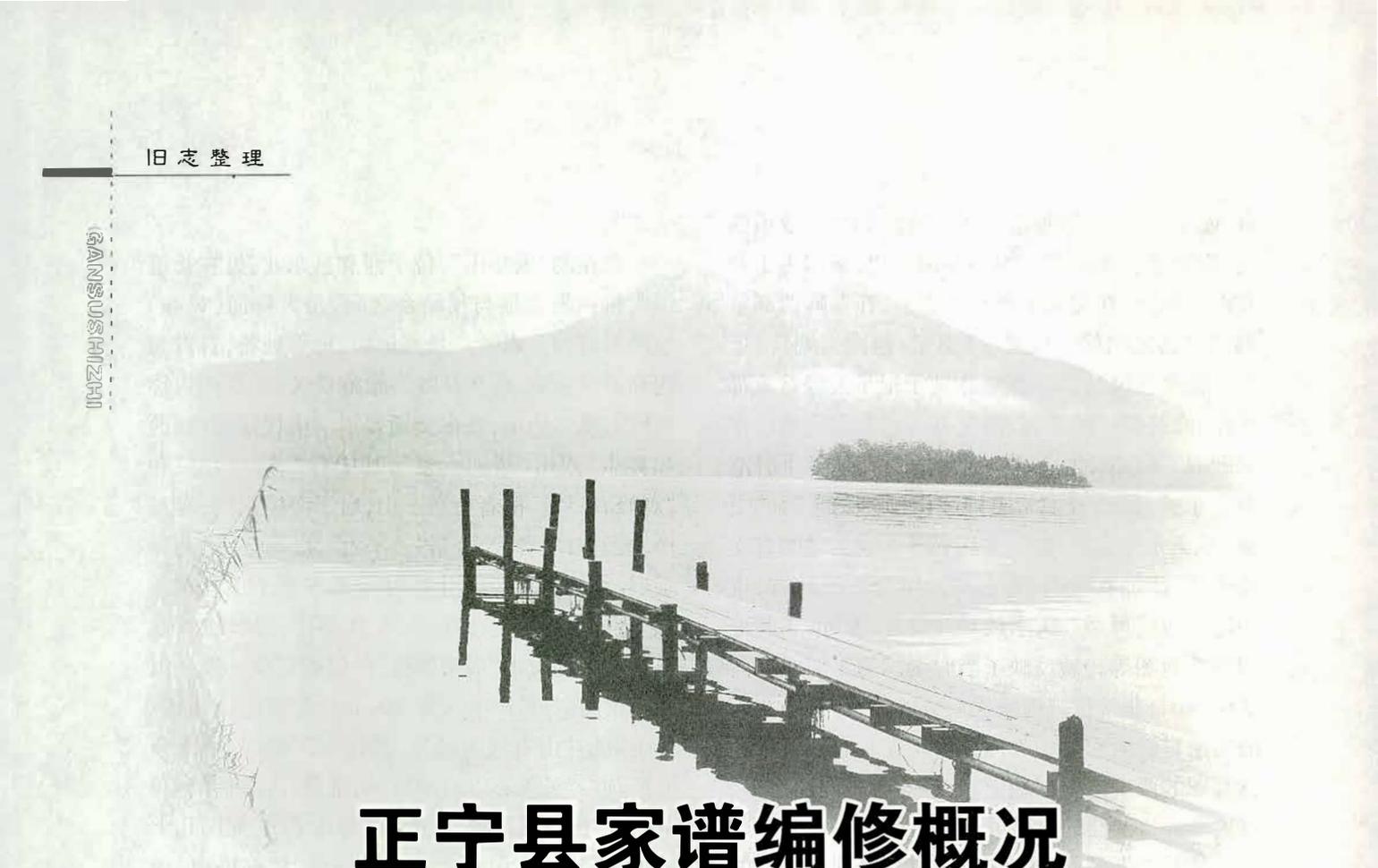
第六,云华山为古鸡头山,所处位置正是“鸡

头道”。

现在的“云华山”,位于西和县东北,处在长道镇大柳河发源地与稍峪乡之间,是大柳河(鸡谷)与稍峪河的分水岭。丹霞地貌,地形独特,自古为西和名胜之地,现在开辟为旅游景区。云华山古称鸡峰山或鸡头山,处在交通要道。清代康熙版《西和县志》列出“西和八景”,其中有“塔山烟雨”和“鸡峰春日”。前者指塔子山,由于海拔很高,容易产生云雾;后者,是否指“云华山”,没有交代。乾隆版《西和县志》在“山川考”中记载:“塔子山县东北二十里,孤峰插天,四远共见,天将雨,云出岫。”这与康熙版县志中“塔山烟雨”的记载完全一致。由于山很高,容易产生云雾。岫,指山洞或山。《尔雅·释山》说:“山有穴为岫”。晋代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写道:“云无心以出岫”。谢眺《郡内高斋闲望》诗中有“窗中列远岫”句子。西和塔子山,周围几十里都可望见,真像一个高高的塔标,故称塔山,现在叫塔子山。乾隆版县志除了记载塔山,另外还记载了鸡峰山,也在“县东北二十里,相连塔山,其形如圭,古为圭峰,名山也。”由此可以肯定,鸡峰山,就是云华山。云华山何时得名,暂不可知。民国版朱绣梓《西和县志》中,对这两座山的记载与清代县志非常接近:“塔山,在县东北二十里,双峰插天,如高塔并峙,故名。天将云雨,先出岫,故有塔山祥云之称。”“鸡峰山,在县东北二十里,与塔山相连,其形如圭,又名圭峰山,旧志八景中,‘圭峰秋月’即此。”云华山,又称“圭峰山”,其形如圭。圭,是古代一种玉器,上圆下方。云华山形状,与此非常相似。云华山,既像玉圭,又像鸡头,如此独特,很早就为人们所关注,因而,鸡头古道,以此命名。

弄清“鸡头道”问题,“鸡头山”就容易理解。秦始皇西巡时是“出鸡头山”,不是“登鸡头山”,一字之差。“出”是由内向外,出去,即始皇从关中西,经鸡头道,来到陇右西垂,“出”,为旅途必经。“登”,是有意登临,有游玩之意。始皇“出鸡头山”与“登泰山封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活动。《史记》记载也是“出鸡头”,不是“登鸡头”。

(作者单位: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志办公室)



正宁县家谱编修概况

关润鸿

谱牒兴自周代,后渐盛行,成为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家有谱,如一国有史,地方有志。一国有史,以载历代盛衰兴替;地方有志,以记地方风土胜迹;一家有谱,以追宗溯源,光先诫后。家谱是家族生命史的忠实记录,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过去有“三代不修谱,君子谓之不孝”的说法。因此,修谱历来被人们所推崇。

正宁县家谱文化由来已久,始年不详,盛行于明、清时期。县内发现最早的家谱为清代创修的永和花园村《巩氏家谱》。“文革”期间,部分家谱被迫烧毁。但也有少数有胆有识之士,不顾自身安危,想方设法把家谱保存下来,既使本家族的历史记载得以延续,也为县域今后的修谱提供了必要的借鉴。“盛世修史志,贤孙续家谱。”20世纪90年代中期,家谱文化再度兴起。家谱编竣后,同宗族

人聚集一堂,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据粗略统计,正宁县新修有永和镇花园村《巩氏家谱》、于家庄《赵氏家谱》、寺村《王氏家谱》;永正乡路里村《李氏家谱》、西堡住村《王氏家谱》、南住村《杨氏家谱》;宫河镇宫河村《王氏家谱》、宫河村《张氏家谱》、纪村堡西园子《姚氏家谱》、南庄村《曹氏家谱》;周家乡下冯村《李氏家谱》、西庄村《王氏家谱》、核桃峪村《杨氏家谱》、官家川村《宫氏家谱》、燕家村《燕氏家谱》、西坡乡杨畔村《杨氏家谱》、高渠村《白氏家谱》、高渠村《樊氏家谱》;湫头乡西沟村《袁氏家谱》等20余姓家谱。其他姓氏有无编纂则不得而知,但仅此20余姓家谱即可管窥正宁县家谱的编纂盛况。

一、巩、赵、王、姚、高、樊、杜七姓家谱简介
《巩氏家谱》为永和镇花园村巩氏保存。该谱

自清康熙年间(1662—1722)至今共编修4次。第一次是康熙三十七年(1698),第二次是乾隆三年(1738),第三次是嘉庆十二年(1807),第四次是1985年。该谱奉巩祚(生年、卒年并缺)为始祖。前3次所修家谱分上、下两卷计三册(“文革”中遗失一册)。前置序8篇,上卷分例义、世系、家传、外传,下卷分墓志墓表(内附碑文行状)、寿文谏词(内附寿诗挽诗)、救命奏疏(内附赠诗呈文)、遗文家训(内附茔址遗事)、续卷。新修家谱为1册,前置序1篇,分家传、外传、巩崇文传、烟村巩氏惨痛家史记、先考事略。

《赵氏家谱》为永河镇于家庄村赵氏族人保存。该谱自明万历三十年(1602)左右启工创谱。尔后,清康熙年间(1662—1722)和乾隆年间(1736—1795)又续修两次。继后,又分门别系多次修纂。2004年,赵文卿执笔续修《赵氏族谱》,2006年底内部出版。该谱从明万历年间(1573—1620)记至2006年,记载时限长,内容繁多,约36万字。内容分四大部分:一是谱宗,即一般家谱前面的论述部分,包括族源、考系、先谱遗珠、历代修谱序、跋等,同时绘制了赵氏宗族世系总图及各门、各系、各支的世系表,共18幅,全面、系统地罗列了在于家庄族系的古今人物名讳。二是族鉴,内容包括“宗室故遗”、“赵氏家园”、“文化教育”、“隶属沿革及体制变革”、“轶闻故事”、“民生”、“民俗”、“灾眚”八项。三是人物谱,包括古今族贤录、人物传记、新秀简介等项内容,特别开辟“三太爷”(赵邦清)专辑,对“一代廉吏”赵邦清的生平事迹作了详细介绍。四是文化谱,包括《赵氏德政褒封卷》(诗画图)、《鹤唳草》(诗集)及明代文人为赵邦清所写的记、序、诗文,并有赵邦清遗作,最后附后昆诗文等。

《王氏家谱》(宫河)为宫河镇宫河村王族北分支保存。主编王际善。该谱从1993年编纂,1998年元月内部出版。分繁、简两个版本。繁本为三卷,内容淹博,共666页;简本只一册,仅收录文字部分,约5万余字。该谱从王氏第十六代写至第二十三代(1825—1997),以王氏北分支先祖影图14位先祖(第16代)为依据,记载了王氏家族之渊源、族规、“会宁寺”的变迁、王族习俗、历年大事记、本

族人物篇等。其中“本族人物篇”扩大收录范围,将王氏家族四大分支中的建树者,均予立传评述,且男女都录,体现了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族谱”篇按门垂直排列,前置序1篇,列有目录、凡例、世系图等。

《姚氏家谱》为宫河镇纪村堡西园子姚氏族人保存。该谱先由姚世杰执笔修编,姚世杰去世后,又选姚世贤、姚正存、姚扣印、姚选印、姚正海、姚牛等人于2001年组成班子,由姚世俊执笔,姚树美(姚牛)总负责续编。上限是明洪武九年(1376),下限是2001年8月,从姚氏第十五代写到第二十代,主要记载了姚姓的由来、演变、分布、郡望、堂号、堂联、宗祠、家庙、家祭、家训、家规、迁徙、遗志、轶事、先贤诗文等。由文字、绘画、表格三部分组成,约3.2万字,2003年底内部出版。

《高氏家谱》为永河镇新庄子村高氏族人保存,主编赵文耕。该谱从高氏第九代写到第十五代,记载了高姓考源、大事纪略、历代天灾、族贤记传、家规家训、世系表册、奉祀簿等,分为三卷。其中自然灾害、大事要事纪略从明初记起到2006年止,世系表册从清后叶的五世祖记起到十一世现有成员止;族中贤杰从八世祖记起至第十世。八世以前各代事迹无法稽考。有的另在世系表册中作了简要记载。此家谱附列《直系亲从高祖到玄孙表》、《图示式家谱(家影)描绘提示》等常识性内容。约12.4万字,2006年底内部出版。

《樊氏家谱》为西坡乡瓦窑沟圈村樊氏族人所存,上限为明洪武五年(1372),下限为2006年。该谱记人叙事始于明末,记载了樊姓的来源、樊氏历史名人荟萃、移民史话、樊家湾子八老户及分支考证、族规、樊氏人物集贤等,樊氏人物集贤又分为历史人物、现代人物等篇目。迄今续修两次:第一次是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是1998年,传人15代,后裔分支四门,四门后嗣断代,留有长门、二门、三门3个分支。该谱分奉祀谱和底册谱两种版本。奉祀谱只印1套(5册)、底册谱1套(4册),约6万字。凡十世以前的已故人员一律填入奉祀谱,从十一世起,一律填入底册谱,已故人员也填入奉祀谱。填写底册谱时,以辈分为序,已婚男子

方可立户。

《杜氏家谱》榆林子镇王堡子村《杜氏家谱》，主编高桂仙，于2007年8月修纂，共设置5卷，首卷为总情，主要为文字记述和重要的记事表册；二卷为本宗祭祀神主谱（也称祭祀谱），以记述亡故之列宗列祖；第三卷为现有人口谱；第四卷为出嫁女儿流向谱；第五卷为墨谱（即每年登记宗族有关事情的书写谱记）。该谱前置凡例、序言、修编感言、旧谱略序、谱论等，它记载着杜氏家族的血统渊源，分衍迁居，世故维护伦理，记祖孝亲，报本追恩，从清光绪十八年（1892）开始写起，内容博大，结构严谨，图片丰富，由记、传、图、表、录、照片等部分组成，约20余万字，2008年底出版，采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家谱范本版式，属内部出版。

《王氏家谱》（周家）系周家乡西庄村王氏家族第十九代传人王万宝修编。该谱采用文字叙述，名录和图表相结合的叙述方法，上限为明洪武年间（1368—1398），下限为2005年。地域涉及本家族所居住的4个村庄和邻村，远到外省市，收录传人23代、1000余户、4000多人。记载了王姓的渊源、移民史话、大事记、族规、行业小记、王氏家族习俗、婚嫁丧祭主要礼仪、王氏人物集贤栏目等。王氏人物集贤栏目又分为典型人物小传、优秀人物简述、历史人物、现代人物等篇目。该谱分底册谱和奉祀谱两种。底册谱主要系统收录本族的人和事；奉祀谱主要按辈分横向收录本族各分支已过世的人，供年头时节后嗣之辈奉祀。奉祀谱1本，底册谱5本，共约48万字，2005年底内部出版。

二、正宁县编纂的各姓家谱的特点

家谱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沉淀，是悠久历史文化的见证，事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物古迹、民风民俗等诸多方面。纵观正宁各姓家谱，其主要特点：

1、家谱中介绍族源、人口迁移分布的内容，可以研究一方地域人口的迁徙和分布。据对正宁各姓氏家谱的研究发现，正宁县绝少土著居民，各姓氏人口绝大多数从明洪武年间（1368—1398）由山西省迁移而来。

2、家谱中保留了清代回民反清武装的稀见史料。如永和镇于家庄《赵氏家谱》中有一篇赵重华清同治九年（1870）正月撰写的文字：“清同治元年，陕西回乱。杀人放火，甘肃尤重。至五年，于宁州北董志源扰乱人民。六年、七年，麦子俱被收割，牲畜、财物俱被掳掠。庆阳府麦子每斗三千文，正宁麦子每斗七千文，地一亩五百文。人食草根度日，以致人犬相食。东村人不敢西村行，饿死者遍野。破城火洞，杀人积骨如山。人死八九，而生存者只留一二。于家庄一百三十余家，饿死者大半，被伤者无计。父子不相顾，兄弟各离散。逃者众而守者寡。在此时，《赵氏家谱》藏入洞中。在七年、八年，则来打粮草，日夜不离村中。人只留一十三家，于各路口压枣棘，树上挂铜铃，以防贼来。闻讯一呼，与贼相敌。居洞者时多，在野外时少。加之阴雨连绵，连月不开，人民所受艰苦，书难尽言。八年二月间，贼人远去，遍地生蒿，满路草塞。无牛耕种，人为牛马之苦。豺狼凶恶，妇女小孩被狼所害，十村九无人烟，一二人不敢上地耕耘。但大章祖后人一十一家，子孙无伤，实赖祖德之深厚，防守之谨严。为此家谱为水渗湿，仅录草簿记存。”

周家乡《王氏家谱》还收录描写“同治兵燹”后正宁县境的一首诗：“同治年间兵祸起，直道中断林木毁。路断人稀无炊烟，牛羊鸡犬声不闻。”此外，周家乡《宫氏家谱》也有类似的记载。这些，对于研究清同治年间（1862—1874）回民反清武装在正宁县的活动，提供了翔实、珍贵的历史依据。

3、家谱中可以发现一地古代名人的稀见文献资料。如永和镇花园村巩氏保存的《巩氏家谱》，收录了正宁“三清”之一的巩焞所作的《燕贻篇选古序》《选诸子跋说》《重修文昌祠珉记》《重修关圣庙碑》4篇文章。还有《赐进士大中大夫河南督学参政巩府君行实》，成为研究巩焞生平事迹的最新资料。

如永和镇于家庄《赵氏家谱》中发现了“一代廉吏”、正宁“三清”之一赵邦清著作的《游艺海纳集》《神柏记》《吏部堂署碑铭》《秀才》《门上石额训后要语》《赵氏行述》，纠正了《庆阳地区志·赵邦清传》中“赵邦清多有著述，但仅存一篇《神柏记》传

世”的不正确说法。另外,该谱还有张天受、王建中、尚问创作的诗配画赵邦清《治滕行乐图》,是研究赵邦清任职滕县,为民造福的翔实、生动材料。

4、家谱中可以发现当代县籍在外地名人的资料。如周家乡西庄村《王氏家谱》中收录在外地工作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王振海、王建基、王志严、王立荣、王忠权、王新玲及全国劳动模范王印明、在日本经营饺子馆生意兴隆被东京电视台多次报道的王民权的资料。这些都是编纂《正宁县综合年鉴》乃至续修《正宁县志》的必选内容。

5、家谱中可以发现文物古迹的资料。如宫河镇宫河村《王氏家谱》中收录有《宫河村会宁寺的变迁》一文,介绍了史所未载的会宁寺建筑时间、主持工匠、建筑分布等史料。

6、家谱中可以发现契约、圣旨之类资料。如宫河镇纪村堡西园子《姚氏家谱》收录清光绪十五年(1889)四月廿九日所立《分家约书》一份,文曰:“立写分书文字人姚中(兄)、姚礼(弟)。二人心事不合,姚中应分庄基西边窑四只、厦一座、村边场。石元地东边一段廿三亩、岳斜口地南边地八亩、页畛地南边地一段八亩、长畛地南边地一段十一亩、李家凹地东边地五亩、田家崖地南边地一段三亩、庙门东边地一段三亩、冢之地一段三亩、又一段三亩、□□地二亩,同中言明,两家共分。恐后无凭,立分约为证。说合人:任可中、田治学。光绪十五年四月廿九日立。代书人焦书。”这份资料,对于研究清末经济、民俗有重要参考价值。

如宫河镇纪村堡西园子《姚氏家谱》收录明天启六年(1626)三月吉日明熹宗为鸿胪寺序班姚俊秀之父所赐“圣旨”一道。永和镇丰集村《范氏家谱》收录乾隆皇帝“圣旨”二道:一是清乾隆二年(1737)三月初六日为国子监助教加一级范锡篆及妻子所赐。全文为:“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三雍实育英才,六馆专资乎董率,尔国子监助教加一级范锡篆,学通儒行,身范士林,服官已列于东胶,敷教克襄乎西序。兹以覃恩,授尔文林郎,锡之救命。於戏!锡宠之纶音,尚益弘其经术。诏曰:丕绩奏于中朝,端救嫻家之助,龙章颁乎庆典,宜分齐体之荣,尔国子监助教加一级范锡篆之妻王氏,早习女仪,

克修妇织,鸡鸣交傲,既砥节于素巾蚕绩,执劳用邀思于紫竹。兹以覃恩封尔为孺人。於戏!巾褂和顺之凤鸾,书诞贲廷陞焕褒嘉之,命象服茂膺。”二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正月初一日为陕西凤翔府陇州训导范拜宸之父母所赐。对于研究正宁人文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7、家谱中的族规有教化功能。族规、家法、家训是家谱的组成部分,其用意在于教育后代学会怎样治家、为人。如西坡乡高渠村《樊氏家谱》的族规为:“一、本族后嗣之辈都要崇尚祖先,感恩报本,年节奉祀,永铭不忘。二、要继承和发扬先辈尊长爱幼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孝敬父母,关照弟妹,严教子女。三、不论男女老幼都要遵纪守法,严于律己,树立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坚定信念,始终保持优良传统。四、要勤学力耕,继承和发扬先辈不畏艰难,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创业精神。五、凡在外工作者,不论职务高低,均要勤奋敬业,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凡在家务农者,都要勤耕苦种,自食其力,积极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勤劳致富,树立不甘于人后的雄心壮志。六、要团结友爱,睦处间邻;以善为本,谦诚待人,恪守信用,公平处世;不妒富欺贫,不凌弱辱小;扶困济贫,助人为乐。七、要教育子女努力读书,奋发上进,学有所成,报效国家,服务社会。八、要重视和关心公益事业,积极主动,争先恐后。九、凡本族长辈都要注重自身修养,为后嗣之辈做出表率。”

有的家谱族规虽不乏封建糟粕,但更有值得借鉴的优秀传统内容,对于传播中华“孝道”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志谱同性,诚如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所说:“将史志比作日月,那么家谱则犹如遍撒九州环球,密如繁星的灯火。灯者,补日月之不足也。”正宁家谱的编纂,与方志、正史相互参证,甚至可补史志之阙,往往方志、正史未备、未详,或者记叙有误,恰恰详备于姓氏家谱之中。它为研究宗族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民族史、迁徙史、人口史乃至地方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

(作者单位:正宁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明清以来《庆阳府志》的 修纂整理出版与简要评价

高恒祥

庆阳乃华夏故土，古为禹贡雍州之域，系周祖发祥地，历史悠久，民风淳厚，人才辈出，修志资政，代代不穷。据明成化十七年（1481）修纂的《重修庆阳府志》李萼所作的《重修庆阳府志序》载：“庆阳，古北豳之地，山川、人物、土产、贡赋、政治、风俗，旧有志焉。但详或冗复，简或脱略，甚至得此失彼，且所属州县各为一集，散涣不一，讹舛杂乱。”说明至少在明成化十七年（1481）前，就有《庆阳府志》编成，惜未传世，不得了解其详。而自明成化《重修庆阳府志》至新中国建立后的《庆阳府志续稿》，先后修纂《庆阳府志》部，留存下来的仅4部。依据现有史料，谨将明代后《庆阳府志》的修纂、整理出版与简要评价撰文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明清以来《庆阳府志》修纂情况

1、明成化《重修庆阳府志》明成化辛丑，即成化十七年（1481）手写本，王福（庆阳卫左所人，成化丁酉科即1477年举人，曾任河南河内尹）、陈震（庆阳卫人，成化丁未即1487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兵部侍郎）修纂。今散佚不存，卷数不详。为史料所载现知最早修纂的《庆阳府志》。

2、明正德《庆阳府新志》明正德五年（1510）手写本，韩鼎（庆阳府合水县人，成化十八年即1482年进士，历任礼部给事中、江西按察司佥事、光禄寺太常卿、兵部右侍郎）修纂。今散佚不存，卷数不详。

3、明嘉靖《北地纪》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手写本，汪来（直隶天津人，嘉靖三十三年进士，历任刑部郎中、庆阳府知府、山西潞安府兵备副使）修纂，共4卷。今散佚不存。

4、明嘉靖《重修庆阳府志》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刊本，梁明翰（山西孝义人，嘉靖三十四年进士，历任刑部郎中、庆阳府知府、陕西按察司副使）修，傅学礼（庆阳府安化县彭原人，嘉靖丙戌即1526年进士，历任刑部给事中、湖广按察司副使）主纂，共20卷，约30万字。原本散佚，影印胶卷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该志清光绪二年（1876）前流入日本，由日本文部省交付日本上野图书馆收藏，后转存日本国会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曾将该志摄成微缩胶卷，甘肃省图书馆收藏有复制微缩胶卷。

5、清顺治《庆阳府志》清顺治十七年（1660）手写本，杨藻凤（山西宁乡人，顺治十四年进士，历任庆阳府知府、湖广提学副使）修纂《庆阳府志》，共14卷，约20万字。原书现藏北京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收藏有微缩胶卷。

6、清乾隆《庆阳府志》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刊本，赵本植（浙江上虞人，附贡时任庆阳府知府）修纂《庆阳府志》，共42卷。

7、《庆阳府志续稿》1963年9月油印稿，杨景修（庆阳县人）编纂《庆阳府志续稿》。共14卷，10万字。上限为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下限止

于民国3年(1914)庆阳府裁撤。

二、现存4种《庆阳府志》的整理出版情况和内容简介

明嘉靖《重修庆阳府志》刊本、清顺治《庆阳府志》手写本，由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标点，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清乾隆《庆阳府志》刻本，今庆阳市未见全套原本，1979年10月，由《华池县志》编写组在省内外四方搜罗，辑录整理补齐，影印成8册装函出版。《庆阳府志续稿》油印本，甘肃省图书馆存，2007年8月《正宁县志》主编王立明查阅资料时发现，2009年12月复印，2010年5月，正宁县地方史志办公室整理标点，目前已打印成稿，待正式出版。

明嘉靖《重修庆阳府志》共20卷：卷一图考、建制沿革、星野、疆域(道路附)、地名。卷二形胜、风俗、城池、山川。卷三里甲、户口、诸赋、诸役、物产。卷四公署、台榭、坊市、桥梁、铺舍。卷五学校。卷六兵防(一)，下设将领、卫伍、额官、额军。卷七兵防(二)，下设粮饷、征办、屯田。卷八兵防(三)，下设关隘、烽堠、民兵。卷九设祀典。卷十官师。卷十一宦迹。卷十二仕籍(一)，下设科目、岁贡。卷十三仕籍(二)，下设例贡、武科、人才、武功、辟掾、卷十四乡贤、将选(将材附)。卷十五忠义、孝友、贞烈、隐逸。卷十六赠官(儒官附)、流寓、方技(力士附)、仙释(寺观附)。卷十七古迹、陵墓、景致。卷十八纪事、纪异。卷十九艺文(一)，卷二十艺文(二)。

明嘉靖《北地纪》虽未传世，但根据明嘉靖《重修庆阳府志》中陈凤元所作的序中“至汪守北津，则直取古今贤哲与其议论文辞，以为《北地纪》，非志体矣”的文字，以及张维在《陇右方志录》对其所作的评点(见后文)，约略可知其4卷篇目为：卷一故实，卷二人物，卷三名宦，卷四艺文。

清顺治《庆阳府志》共14卷：卷一图考、建制沿革、星野、疆域(道路附)、地名。卷二形胜、风俗、城池、山川、物产。卷三里甲、户口、田赋、经费、驿传。卷四公署、台榭、坊市、桥梁、铺舍。卷五学校、祀典(坊祠、庙宇附)、兵防、关隘、烽堠、民兵。卷六官师。卷七宦迹。卷八仕籍，下设进士、举人、岁贡、例贡、武科、人才、武功、辟掾。卷九乡贤、将选(将

才附)。卷十忠义、死事、孝友、贞烈、赠官(儒官、儒行附)、隐逸。卷十一流寓、方技(力士附)、仙释(寺观附)、古迹、陵墓。卷十二景致、纪事、纪异。卷十三艺文(一)，卷十四艺文(二)。

清乾隆《庆阳府志》共42卷：卷一图考，卷二星野，卷三建制(有图)，卷四疆域，卷五城池(市集附)、卷六形胜，卷七山川，卷八关渠，卷九里甲(户口附)，卷十胜景(图附)，卷十一古迹，卷十二风俗，卷十三物产，卷十四田赋，卷十五经费，卷十六兵防制(兵制附)，卷十七邮传，卷十八学校，卷十九坛壝(寺观院庙附)，卷二十廨署，卷二十一职官(官制附)，卷二十二宦迹，卷二十三科第(进士、举人、副榜、恩拔岁贡、例监)，卷二十四乡哲，卷二十五忠节，卷二十六孝义，卷二十七人物，卷二十八荐辟，卷二十九封恤，卷三十隐逸，卷三十一流寓，卷三十二仙释，卷三十三方技(力士附)，卷三十四列女，卷三十五陵墓(坊表附)，卷三十六纪事，卷三十七祥眚，卷三十八拾遗，卷三十九艺文(疏、赋、颂、议、铭、赞、传)，卷四十艺文(传)，卷四十一艺文(书、序、墓志、补序、书、铭、赞)，卷四十二上艺文(记、杂著)，卷四十二下艺文(诗、诗余)。

《庆阳府志续稿》共14卷：卷一舆地，下设沿革、疆域、山水、气候、物产、古迹。卷二建置，下设城镇、廨署、仓库、坊表、祠庙、寺观。卷三民政，下设户口、风俗、宗教、议会、警察。卷四财赋，下设贡赋、税捐、仓储、市籴、差徭、货币、经费。卷五教育，下设学制、书院、义学、学堂。卷六实业，下设农业、水利、工业、商业、林业、牧业。卷七交通，下设道路、关梁、驿递、邮政。卷八祥异。卷九职官，下设官制、职官、封爵。卷十选举，下设孝廉方正、进士、举人、贡生、议员。卷十一人物，下设人物、烈女。卷十二兵防，下设兵制、马政、兵事。卷十三艺文，下设著书目录、文艺、艺术、文物。卷十四拾遗，下设轶事。2010年5月，由正宁县地方史志办公室负责整理标点，目前已打印成稿。

三、对《庆阳府志》的简要评价

《庆阳府志》是庆阳历史上纲目俱全、体例完备、记述全面的史籍，这不仅表明了地方和朝廷对修志的重视，修志已成为代代相沿的优良传统。同

时,也表明了庆阳历史地位的重要。

从这几部《庆阳府志》中可以发现,庆阳从明到清都重视修志,从有文字记载的庆阳历史到建国时期庆阳的社会概貌都有详略得当的记述。它们涉及广泛,资料翔实,内容宏丰,言简意赅,保存了许多宝贵的史料,这些弥足珍贵的史实至今仍具有重要地参考、借鉴、研究价值。我们可以从中“察天道之盛衰、地道之丰薄、人道之得失”,也可深究庆阳历史之渊源,观兴衰,明得失,审时度势,为政资治。这几部志书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庆阳历史上保存完好的史书、官书、政书,为我们今后建设和谐庆阳、人文庆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上述志书在编修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志书多数受当时社会制度的影响,共同的缺点是“重人文,轻经济”,而且用大量的篇幅记述烈女节妇,封建色彩非常浓,在当今看来已是一大缺陷。对明代农民起义军、清同治年间回民反清武装及其活动,志书站在封建正统立场,以污蔑性口吻称其为“北寇”、“闯贼”、“贼乱”、“回逆”、“回乱”等,是其历史局限。有的志书在篇目设计上存在严重缺点。对明嘉靖《北地纪》,明嘉靖《重修庆阳府志》中陈凤元序指斥其“直取古今

贤哲与其议论文辞”,“非志体矣”。民国时期甘肃著名方志学家张维在《陇右方志录》也作如下评点:“不分门目,惟以时代先后为序,采事迹、诗文之有关庆阳得八十一人,以后稷居首,次以淳维,而自附其名于末,《故实》、《艺文》错乱互编,《人物》、《名宦》混淆并列,为从来志乘所未有。其前三卷题来名,而四卷独标北地举人孙信撰,盖卷皆来之文章,嫌于自炫,故托之信云。”对清乾隆《庆阳府志》,张维在《陇右方志录》作如下评点:“乾隆《庆阳府志》,词义严谨,亦佳志也。惟《胜景》一目,汇列各属县八景,附会称道之不足,果其真为名胜?抑扬风雅,未始不可,然各县所标榜大抵培塿之山、涧溪之水、风月云树,何地不有?而少者不减为七,多者亦不增为九,辗转袭取,最为志乘痼习。甚惜本植此志以复未能免俗也。志既有《乡哲》、《孝义》等目,复有《人物》,去取之间,奚所取裁?此又类目失当,宜加改正者矣。”《庆阳府志续稿》存在的问题,正如作序者陆为公所言:“惟对原府属安化以外各县纪载欠详。”

学者提出的以上志书存在的问题,可谓一语中的,是修志经验的宝贵总结,对修志者今后如何更好地编修志书提供了鉴戒。

(作者单位:正宁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祁山,由于《三国演义》小说和电影、电视剧的传播,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故事,家喻户晓,它的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呢?本文要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

一、古籍和新编志书辞典的记述

《水经注·漾水》记载:

祁山在幡冢之西七十许里,山上有城,极为严固。昔诸葛亮攻祁山,即斯城也。汉水经其南,城南三里有亮故垒,叠之左右犹丰茂宿草,盖亮所植也,在上邽西南二百四十里。《开山图》曰:汉阳西南有祁山,蹊径逶迤,山高严峻,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

《元和郡县图志》长道县下记:

祁山,在县东十里,蜀后主建兴六年,诸葛亮率军攻祁山,即此是也。汉水经其南,有诸葛亮垒,叠之左右犹有丰草,盖亮所植也。

按:隋唐长道县,由北魏水南县改名,即今西和县县长道镇。

《读史方輿纪要》陕西水南城下记:

祁山,在县北七里,后汉末置城山上,为戍守处。城极严固,建安十八年,马超据冀,郡将赵昂等据祁山以击超,超奔张鲁,引兵还围姜叙于祁山,夏侯渊驰援,超败走。其后诸葛武侯六出祁山,皆攻此城。魏明帝所云“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也。城南三里有武侯垒,西汉水经其南,……县北四十里有屏风峡,宋郭中正以此为祁山之正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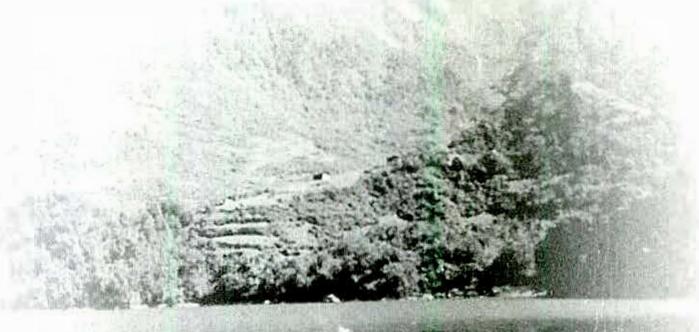
按:屏风峡,东汉魏晋称塞峡,唐为寒峡,宋代叫屏风峡,今俗称大湾峡,郭氏以为在水南县(今西和县县长道镇)“北四十里”之说误。

新编《礼县志》依据《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之说,认为祁山在今祁山堡及以北三华里的山上,“东距礼县 25 公里”。^①

新编《西和县志》第五编第三章文化中记:

屏风峡,古作塞峡(杜甫诗作寒峡)今县北大湾峡。峡谷两侧屏列大小祁山,奇峰对插,峰屏互峙,山谷交合,状若屏风,故名。峡长 12 公里。^②

诸葛亮出祁山,姜维出石营,杨难当出塞峡



祁山位置考

薛方昱

……都曾经此地。宋代大观年间(1107—1110)秦凤路经略安抚使郭思作《祁山神庙碑记》于屏风峡。

新编《甘肃省志》分卷《军事志》记述:“祁山,在礼县东”。^③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记述:“祁山,今甘肃西和县东北,蜀军攻魏,途出于此”。^④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魏·雍州 15-16,依将祁山标示在今礼县东北。^⑤

二、祁山在今甘肃西和县北的石堡

1、从山川地形上看。在今甘肃礼县以东、西汉水及祁山堡以北之地,系黄土丘陵,山势较为平缓,不具备“山高险峻”的地貌特点。今祁山堡,本名诸葛亮垒,上有诸葛亮祠,地方很小,只能说是蜀军祁山大寨的一个前哨营垒,其北 3 华里山上,三国时可能有城,由于长期农耕已毁,不见遗迹,询问当地群众,均言不晓的。这里由于无险可据,故作为“九州之名阻,天下的奇秀”的祁山,不可能在此。

那么祁山究竟在何处呢？还得先从地形地貌上说起：从甘肃徽县北界到西和县石堡以西至礼县界，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横岭山脉，海拔2100—2300米，系石质山地，请参看《甘肃省地图集》44—45页。^⑥由于这条横岭山脉的阻碍，源出幡冢山的西汉水，向西南流去。而源出于西和县中部诸山的建安水，即今西和河，也叫漾水，像一把利剑，斩断西和县北的横岭山脉，向北流去，汇入西汉水，期间有一段长约12公里的峡谷，古称塞峡、屏风峡，今俗称大湾峡。峡中两岸石山东西并列对峙，高峻入云。峡东之山，称小祁山，最高的塔子山海拔2121米。峡西之山，叫大祁山，最高处的尖山海拔2312米。完全符合《水经注》中“罗峰竞峙”的描述。另外，在石堡以南，有一条由东向西汇入建安水的小河，《水经注》记为小祁山水，也可旁证祁山就在这里。

2、从古代交通上看。祁山是秦汉、三国陇右天水郡通向汉中、巴蜀的交通咽喉，通称祁山道。在祁山以北，有四条古道：

一是沿西汉水支流今红河（杨廉川）北行，经秦汉西县，（今礼县红河附近）^⑦至天水藉口，北去东汉天水郡治冀县^⑧，东到上邽^⑨。该道开辟于西周、春秋时期。

二是沿西水支流今稠泥河北行经木门^⑩，沿木门谷水至今天水市西的三十甸子，北去冀县，东达上邽。蜀汉建兴九年，魏将张郃追击蜀军，被诸葛亮设伏中箭而卒的木门，就在今天水市秦城区牡丹乡南的王家铺^⑪。该支道故称木门道。

三是沿西汉水东北行，经秦城区的店镇（北魏黄瓜县）又沿南沟河北行经赤谷至上邽。

四是今礼县燕子河（夷水）西北行，经木门关或今岷县的马坞，到东汉、三国时的南安郡治獠道（治今甘肃武山县城附近）^⑫，该道开辟较晚于上述三道，但不会晚于三国之时。三国魏甘露元年，蜀将姜维出祁山，闻邓艾有备，乃回从董亭趋南安，走的就是此道。

上述北行的四道，集合于今西和县的长道镇，经祁山脚下的塞峡，然后才能南下。

从祁山往南有三条支道：

其一是从祁山南下经西和县东的草关，沿六巷河南下，经西汉上禄县（今西和县六巷河上六巷）过今成县的纸坊、西峡到下辨（今成县西抛沙乡北蒋家坪），又往东沿徽成盆地东南行至今徽县南的大河店，南到略阳（东汉武兴郡治）又东南经勉县至汉中。此道大都经河川农耕区，供应充足，道路较好走，适合大军行动，为秦汉、三国时天水通向汉中的主道。诸葛亮出祁山走的就是此道。

其二是从祁山南下，经今西和县的草关、六巷河或沿石峡河东南行，经成县的纸房、小川、越天寿山，西南到西汉的循道县（今成县南潭河乡西3公里处），南经云台（白马关）康县城、岸门口，又沿岸门河南下至铜钱，又顺燕河南下到陕西宁强县的老关，与秦故道汇合，经四川广元、剑门至成都，这是古代天水通向成都的一条主道。

其三是从祁山南下经西和县城，南下洛峪，到西汉武都郡治（今西和县南喜集村的羊马城）和仇池山。又东行与上述两道汇合，或南下平洛（西汉平洛县治）经武都至文县（阴平），南下四川。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天水市南经皂郊、娘娘坝、徽县麻沿河，东南至徽县、两当的这条公路大道，由于秦岭所阻，古代不通，据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交通部派工程技术人员勘测华双公路线路时，曾在天水市与徽县交界的娘娘坝乡境内发现了野人。究竟是野人还是猩猩，我们不得而知。但这里当时山大林密，人烟稀少，交通阻塞，这是真实的。修建双华公路（从陕西凤县双十铺至甘肃通渭县华家岭），才变为通衢大道，祁山道从此被取而代之。另外，还有一条从今成县黄渚关、汪川、小天水至秦州的小道，开辟于明清之时，民国时随着华双公路的开通，也被冷落。

3.从军事攻防战略战术上看，由于西和县北石堡一带地形地貌又是南来北往的交通咽喉，进可攻、退可守，为古代军事要塞，兵家必争之地。现在让我们再看看《水经注·漾水》关于西和县北石堡的记载：

建安水又东北，有太谷水；又北，有小祁山水，并出东溪，扬波西注。又北，左会胡谷水，水西出胡谷，东经金盘、历城二军北，军在水南层山上，其水

又东注建安水。建安水又北经塞峡……，左山侧有穴洞，人言潜通下辨。所未详也。

按：水南，县名，魏置，即今西和县长道镇。又《读史方輿纪要》西和县水南城下记：

县南十八里有石堡城，高百丈，上有石城，城中有石井，深一丈，水色湛然。

按：“高百丈”是指山，而非城。因城不可能筑百丈之高，原意是山高百丈，上有石城。

从上述文献中，我们看出，今西和县北的堡乡境内，山上有城，城中有井，山侧有藏军民的石洞。所处的塞峡，除上述文献记载的石堡城外，还有今存未被文献收入的张关、刘城这些与古代军事有关的地名。在石堡城之南，《水经注》记有金盘、历城二军。这样，在祁山要塞之前，有诸葛亮垒，作为前哨阵地，后有金盘、历城二军，构成了祁山前后左右，山上山下，“极为严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笔者曾数次到此调查了解，由于年代久远，河水冲刷，峡中的石壁城已毁，询问当地长者，说儿时曾见残部城墙根基。在峡中的个别地段，石壁上留有栈道的痕迹。两边山上的石城，已毁坏，遗址今存。

笔者认为新编《西和县志》关于祁山位置的记述是正确的，提供的资料是宝贵的。该志主编杜万鼎同志是兰州榆中人，长期在西和县从事文化工作，对西和县的历史地理深有研究，其功绩是可以肯定的。

综上所述，我们初步认为东汉、三国时的祁山，在西汉水之南，今甘肃陇南市西和县城北的石壁乡境内。

本文经《甘肃省志》副

主编孙奇明先生审阅，在此表示谢意。

注释：

①新编《礼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②新编《西和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③《甘肃省志》分卷《军事志》。

④《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

⑤《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

⑥《甘肃省地图集》甘肃省地图集编纂办公室1975年内部发行。

⑦《读书方輿纪要》：西县城，州西南百二十里。新编《西和县志》何德末：《漾水今考》一文中认为秦汉西县“故城在今礼县红河乡岳家庄一带”。

⑧冀县，春秋时秦置，故城在今甘肃甘谷县城西五里铺，大象山西一华里处，详见《元和郡县图志》及薛方昱《中国最早设置的邽冀二县考》载《西北史志》1998.1

⑨上邽，今天水市秦城，详见上注⑧

⑩木门谷，《读书方輿纪要》在州西南九十里。

⑪獠道，西汉魏晋故城，在今武山县城东1公里处，十六国时西秦在后赵的进攻下，乔迁今陇西县东南25华里处。详见薛方昱《獠戎獠国獠道探讨》（待出版）

⑫《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六年春，杨声由斜谷道取蜀，使赵云、邓艾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

（作者系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原副编审）



石羊河流域生态变迁史略

程对山

2010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干涸沙化半个多世纪的甘肃省民勤县青土湖重现碧波,出现约3平方公里的水面,标志着经过三年的生态治理,中国三大沙尘策源地之一的甘肃省民勤县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2011年7月,正是石羊河流域农作物用水高峰时期,也正是地下水位的下降时期,而民勤县夹河乡于2008年关闭的7眼机井,却井水倒流自成涌泉,近10万亩芦苇蓬勃丛生。关闭的机井自流成涌泉,说明流域地下水位大面积回升,民勤生态恶化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取得重大成果。

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是事关长远的民生工程 and 德政工程,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生态安全,更与人民的生存、生产和生活发展息息相关。回顾和汇总石羊河流域生态变迁历史,有助于对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取得成效的智慧及经验进行客观的总结,从而更好地巩固重点治理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有助于在经济社会建设中如何保持生态环境的完好与全面协调发展的反思与探索,有助于以重点治理工作成效为资证镜鉴,鼓舞流域人民以百折不挠的意志,坚持不懈地做好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落实重点治理远期目标任务,



干涸沙化半个多世纪的民勤县青土湖重现碧波,出现约3平方公里的水面



民勤县黄岸滩自流井成涌泉溪流,周围芦苇蓬勃丛生,一片生机

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

一、流域历代生态利用和开发演变状况

自古以来,石羊河流域优越的自然条件,润泽抚育着古凉州人民。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祁连山冰川雪水经渗流形成涌出地面的泉源河流,自东向西大靖河、古浪河、黄羊河、杂木河、金塔河、西营河、东大河和西大河八条河流,各河逶迤漫流引灌农田,在流域中部形成肥沃的绿洲农田,最终合流汇集至流域下游民勤盆地的青土湖,成为河西走廊的精华地带。

据《尚书·禹贡》及《史记》所载,“原隰底绩,至于潏野”。早在4000多年前,大禹开始疏导九川,石羊河流域就有了原始农田灌溉;迨至秦汉时期,先民们就辛勤地经营和改造着这块绿洲。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夺取“河西之役”全胜,驱匈奴于漠北,后设武威郡,为了加强边防和发展生产,开始大规模移民实边。设置官田,驻军屯防。西晋后期(公元前301年),凉州刺史张轨设置武兴郡,安置流民浚河开渠、引水灌田,发展农业生产。隋唐时期十分注意充实边疆和发展农业生产,在河西走廊地区筑堡营田,把荒地分给移民垦殖。《唐史》记载,郭元振为凉州都督时,注重移民实边,北到民勤设白亭军,南在永登、古浪驻军屯垦,西到永昌设卫管理农牧生产。郭元振鼓励人民兴修水利,引水灌田,旱地改为水浇田后产量提高约3倍。“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其地”。此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均有地方官吏教民治水的记载,散见于历代典籍著作中。明清两代已形成众多灌区。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河西十五卫,东起庄浪(今永登),西抵肃州,绵亘近两千里,所资水利,多夺于势豪,宜设官专理,治屯田金事兼之。”说明当时水资源被有权势的豪门所把持。明朝时期把水资源从豪强的手里夺回,设立专门机构,纳入屯田,统一管理,促进了水利事业的发展。直至明洪武年间,流域下游民勤县境内还是一片上耕下渔的富庶景象,白亭海、昌宁湖、青土湖等湖泊处处,湿地遍布。

清咸丰年间,甘肃河西一带就开始了旱地铺压砂田以保墒抗旱的治沙措施。据《甘宁青史略》记载,当时永登、古浪和景泰等地一些旱滩地的人们开始用细沙土铺压盐卤地,大多砂卤滩涂多变

为膏腴之地。砂之种类不一,以石子砂为最上,石片砂次之,细绵沙又其次。砂之功力仅耐三十年左右,每逾三十余年,则要清除旧砂以更换新砂,劳费甚巨。但从此开始了铺压砂田以利用雨水保墒务农的先河,直至现在,铺压砂田仍是干旱地区所特有的利用雨水保墒务农的措施之一。

民国初年,内战繁多,灾害频仍,水利设施损害严重,人民生计,濒临绝境。抗日战争时期,处于大后方的甘肃武威地区资源丰富,发展水利促进粮食增产以支援抗日前线遂成当务之急。民国30年(1941年),组建成立了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以办理农田水利为主要业务,森林畜牧为辅助事业。宋子文为董事长,沈怡为总经理,利用抗战内迁的机遇,石羊河流域汇集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对流域水利业务的研究建造做出了一定的成效。民国32年(1943年)秋,制定了《甘肃开发河西水利十年实施计划纲要》,提出“古浪、武威两县祁连山勘察报告”,并组建了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河西水利总队,下设张掖、酒泉、武威水利分队,做了一些前期具体准备工作。1942年至1947年,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和国民政府水利部河西水利工程总队,对西营河、黄羊河、金塔河、杂木河、东大河、庄浪河、古浪河进行初步勘察,编制了一些修渠建库的建设计划,由于战争的关系,均未实施。仅在1948年和1949年,对古浪县柳条河的古丰渠和山丹县山丹河的头坝截引地下水工程进行开工兴建,但最终未能建成。

流域水资源开发及演变历史表明,在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下,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保障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流域属区内历代人民为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付出了艰巨的辛勤的劳动,特别是在“非灌不殖”的自然条件下,付出的财力和物力也更多。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出现的水事纠纷则直接反映出社会现实里人与水的纷争矛盾,又与当时社会的安定与动乱互为因果,共同影响着流域生态环境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漫长曲折进程。

二、流域内冰川退缩、林线上移、植被破坏,水源涵养能力下降

石羊河流域由祁连山的冰川融化及山区降水补给而形成的八条支流汇集而成,祁连山冰川融水是河西走廊的生命之源。上世纪60年代初,流域内大量川区人口向山区盲流,大片的湿地和草场尽被开垦,山区耕地面积猛增至268万多亩。新中国成立初的原始森林保有量由385万亩锐减至311.5万亩。林线退缩至海拔2800米,山区草原和湿地又减少150多万亩。仅古浪县柳条河上游南山林线就上移7.5公里,盘路滩李家坟地原有4亩耕地,到90年代时猛增至3680亩。开荒种地及垦挖草场烧山灰等陋习,致使整个祁连山水源涵养区生态急剧恶化,森林覆盖率降低,有限的水资源受到极大破坏。

1981年以来,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破坏原始植被为代价,人们开始在祁连山水源涵养区开矿掏金。仅黄羊河上游哈溪一带的河床上,就涌进9省27县(区)的近四万人,最高峰时达七万多人,30多公里的数条河谷、台地两岸的草地、乔灌木毁坏殆尽。开矿掏金初期还由人工土法开采,到1989年后,150多台机械进行大规模开采,河段遍布10—30米的深坑、深道,开挖口2000多个,宽度200多米,两侧河道堆积的砂石最大高度达40多米,堆积量约420多万立方米,回填量近700万立方米,直接造成黄羊河河床淤积堵塞,径流阻隔漫溢,河床损毁,水质污染,下泄水量锐减的恶果。经测算,当时上游河水流量减为每秒钟4.01立方米,出山口流量减少为每秒钟1.9立方米,渗漏损失达52.6%,年损失水量3700万立方米。河水含沙量增大,混浊度提高6%,细菌密度大量增加,大肠菌超过饮用水卫生标准7倍以上,造成黄羊河水库严重淤积。1985年至1991年,年新增淤积高于开采前1倍,1992年至1997年,年新增淤积为开采前的2.5倍。天祝县境内的双龙沟、直沟河、黄花滩至青峰岭一带连绵成片的草甸、草场、次生灌木丛、松柏及红柳等野生植物荡然无存,昔日草甸植被成为岩卵石裸露的荒漠地带。

由于流域上游人为砍伐森林,开矿挖药,过度放牧和开荒垦种,植被破坏现象严重,水源涵养能力大幅降低。特别是开矿挖药和开荒垦种的原因

导致近1500平方公里的林草地被垦殖破坏,水源林仅存不足550平方公里。现有乔木林644平方公里、灌木林1832平方公里,山区的植被覆盖率只有40%左右。祁连山灌木林线的上移和灌木林的草原化、荒漠化,造成植被保水能力减弱,生态调节功能降低,水土流失面积增大,大量泥沙及漂砾随水而下,河床淤积、水库及渠道填淤堵塞。整个流域上游山区的十多座水库均有程度不同地淤积现象,所有水库的库容量减少到有效库容的五分之一到八分之一之间。

三、流域中下游水资源开发过度、地下水位下降,河道污染严重

石羊河流域深居大陆腹地,属大陆性温带干旱气候,降水量不足,水资源匮乏。平原区年降水量仅150—300毫米,下游地区更小于150毫米,而年蒸发量却高达1300—2600毫米,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干旱指数最高达52以上。近20年来,全流域人口增加了33%,农田灌溉面积增加了30%,粮食产量增加了45%,GDP翻了约6倍,而水资源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约1%,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尖锐。人们为了发展经济,过度开发水资源,年超采地下水量达4.32亿立方米,其中民勤盆地超采2.96亿立方米,导致流域地下水位下降。

在石羊河中游绿洲区,凉州区的金羊、永昌、清源灌区,永昌县的四坝、清河灌区,民勤县的环沙灌区,历史上曾是水草茂盛、涌泉、湖泊、沼泽、湿地遍布。武威有名的十二大湖和四大名滩以及永昌城北的北海子,民勤县环河灌区的月牙湖、西麻湖、苇湖、柴湖等及一些小湖,都已名存实亡,大部分被开垦种植。水利工程的修建,农田的扩展,水资源的超限利用,输往下游的自然水资源量大幅减少,加之石羊大河两岸和泉湖挖草皮、毁林地、开荒扩种,破坏水源涵养,造成泉水干涸、地下水位持续下降,使流域下游土地荒漠化盐渍化现象日趋严重。至2000年12月,石羊河年汇入红崖山水库总水量仅有1亿立方米左右。民勤盆地绿洲面积约1313平方公里,比50年代减少了289平方公里。现状全流域年超采地下水量达4.32亿

立方米,其中民勤盆地超采 2.96 亿立方米,其北部湖区生态已濒于崩溃,“罗布泊”景象已经局部显现。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趋势的加大,流域中游地区城市废污水排放明显增加,现状为金昌属区废污水排放量约为 3364.42 万吨,武威属区约为 2471.47 万吨。石羊河干流河流地表流量小,流程短,河道自净能力弱,环境容量小,纳污量十分有限,造成进入下游地表水水质严重污染。水质恶化又进一步加重下游水资源危机和日趋恶化的生态问题。因为民勤盆地位于流域尾间,本身就是整个流域的盐分容泄区,加上民勤盆地长期大量提取地下水灌溉,反复蒸发浓缩,致使下游地下水盐分浓度不断升高,这是内陆河尾间水质演变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民勤盆地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全县灌溉面积 60 多万亩,进入 90 年代在“瓜籽热”的经济利益驱动下,耕地开荒处于无序状态,灌溉面积最高峰时期曾达 120 万亩至 130 万亩之间。随着瓜籽行情的回落,大量初垦的瓜田又被撂荒和弃耕,民勤县至 2006 年灌溉面积维持在 100 万亩左右。现状超采地下水量维持在 4.0 亿立方米以上。地表水的供给严重不足、地下水的掠夺性开采、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和地下水水质的恶化,导致新一轮的土地又被撂荒。如此恶性循

环,将形成积重难返的僵化局面,民勤绿洲已经面临十分严重的水资源危机和生存危机。

根据甘肃省地勘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多年对民勤盆地地下水动态观察资料显示,民勤绿洲地下水位均处于持续下降过程,下降幅度自南向北增加。22 年来环河灌区累计下降 6—7 米,年均下降速度 0.3—0.35 米;泉山坝灌区累计下降 11—15 米,年均下降速度 0.5—0.7 米;湖区累计下降 18—22 米,年下降速度 0.8—1.2 米。地下水位下降导致生态发生全方位退化,20 世纪初期,青土湖水域面积大约 120 平方千米,当时芦苇丛生,碧波荡漾,环境优美。随着流域人口的增长和灌溉农业的发展,青土湖水域面积逐渐萎缩。上世纪 40 年代末,水域面积尚有约 70 平方公里,50 年代中后期,水域面积快速缩小,1959 年青土湖完全干涸。70 年代,国家出版的五万分之一地图上已无青土湖一名。昔日“碧波荡漾,芦苇丛生,野鸭成群,游鱼无数”的青土湖,已成了沙漠大举入侵绿洲的通途。同时,地下水位下降,导致水质恶化,矿化度(TDS)增加。特别是流域尾间区的湖区和北部沙漠边沿的乡村,地下水的矿化度普遍升高超标,致使北部一些居民因饮水困难无法生存,不得不举家外迁。2006 年,进入下游民勤的地表水由 50 年代的 5.9 亿立方米减少到不足 1 亿立

立方米;民勤盆地地下水开采量达 5.2 亿立方米,超采达 3 亿立方米;民勤盆地绿洲面积减少 289 平方公里,其北部湖区生态已经十分脆弱,绿洲濒临消亡,居民生存已呈艰难困苦之状。

四、流域下游民勤盆地土地沙漠化扩展迅速,危害严重

民勤盆地原本是我国典型的荒漠绿洲之一,在清康熙年间就有生态恶化现象。19 世纪初期以来的 200 多年间,沙漠已侵吞农田 26 万亩,村庄 6000 多个,汉代的三角城遗址和唐代的连城遗址已深居沙漠达 6 公里之远。盆地生态恶化的主要表现为



1972 年 7 月,拉着麦捆的畜力车行走在干涸的青土湖上。昔日碧波荡漾的青土湖已成沙漠入侵绿洲的通途

湖泊萎缩干涸,天然植被枯萎死亡,土地沙漠化盐渍化进程加快,地下水位下降,矿化度上升。2004年6月28日至7月24日,亚洲最大的沙漠水库,武威市民勤县红崖山水库出现了自1958年建库以来的首次干涸,干涸时间长达27天。盆地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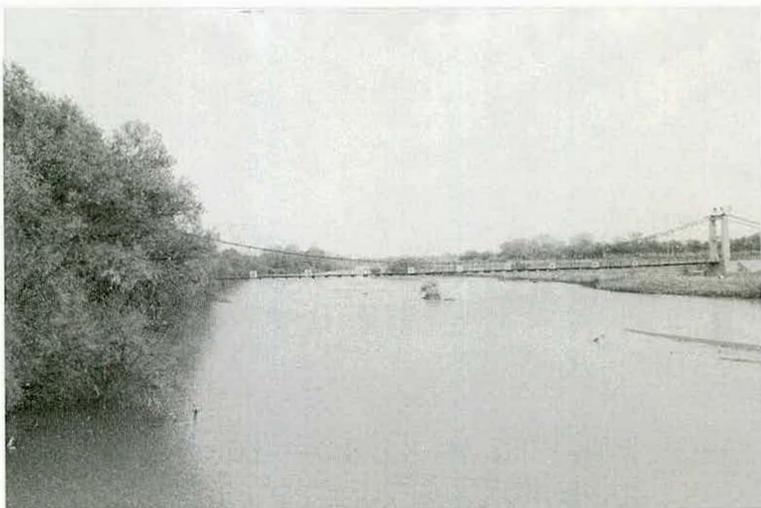
2004年6月,民勤县红崖山水库出现了建库以来的首次干涸,干涸时间长达27天

生态恶化现象已呈极为严酷的局势,生态恶化范围且有逐步向南延伸,速度又呈加快之势。部分群众无法生存,只好撂荒土地,背井离乡,沦为“生态难民”,“罗布泊”现象已经局部显现。据统计,2005年,民勤流动沙地达44.52万平方公里,半固定沙地达13.69万平方公里,固定沙地达37.80万平方公里。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盐渍化土地面积由1.71万平方公里扩大到12.57万平方公里,增加了7.4倍;耕地沙化面积由0.67万平方公里增加到2.23万平方公里;26.33万平方公里草场由于风沙而退化,3.87万平方公里林地沙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沙漠化速度呈加快之势,其北部沙漠推进了50—70米,侵吞耕地400多平方公里;西部沙漠东移30米—60米,使近466.7平方公里耕地失去耕种能力;另外还有0.53万平方公里以上耕地产生了不同程度地沙化。

沙化加剧生态的恶化,灾害性天

气频繁发生,使全流域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据气象记载,流域内武威县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沙尘暴天气造成流域内3.64万平方公里农田受灾,刮倒树木2000多棵,90年代发生的沙尘暴使8.5万平方公里农田和0.21万平方公里果园受灾,埋压固沙林0.11万平方公里;1993年5月5日和2000年4月12日具有代表性的两次强沙尘暴天气造成民勤、凉州、古浪三县区人员死亡达20余人,经济损失达1.464亿元。1993年以来,多次源于流域境内腾格里沙漠的强沙尘暴天气对整个华北地区的大中城市都造成严重的环境影响。沙化导致干旱缺水,引起林草植被衰败,防护效益减弱。由于土地荒漠化、沙化,加之连年持续干旱及暖冬效应使流域内人工营造的沙枣林和天然灌草植被失去生存条件而大面积残败或枯死。民勤县境内已有0.9万平方千米的沙枣人工林

枯死,有2.33万平方千米的天然白刺、梭梭等沙生植被残败枯梢生长不良,天然成片的胡杨林在沙区已很难寻觅。由于干旱缺水、超载过牧,荒漠化草原牧草生长由上世纪60年代的12厘米下降到现在的7厘米,盖度由65%下降到50%,鲜草亩产量由105千克下降到72千克。流域内风沙及沙



2010年10月23日,蔡旗断面过水量已达2.505亿立方米

尘暴危害日益加剧,民勤县年均风沙日数达139天,最多时达150天;8级以上大风日数70多天,年均强沙尘暴日数多达29天。由于受大风、沙尘暴的影响,农作物大面积受害,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困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水资源的刚性需求与约束不可逆转,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也将愈加尖锐。民勤盆地东北被腾格里沙漠包围,西北为巴丹吉林沙漠所环绕,沙化现象的加剧,终将招致两大沙漠的合拢及民勤绿洲的消亡,从而会危及中游绿洲甚至整个河西走廊大通道的安全,绿色走廊有可能被沙漠阻隔,这必然会影响到整个西部地区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稳定,关系着未来国家发展的生态安全战略问题。温家宝总理曾敏锐地指出,“(抢救民勤)不仅是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关系国家发展和民族生存的长远大计。”因此,抢救民勤不仅具有维持绿洲人民生活状况的急迫性和现实性,同时也具有关乎国家西部的稳定与发展的深远历史意义。可以说,对石羊河流域进行以抢救民勤盆地绿洲为核心的重点治理措施不仅非常必要,而且迫在眉睫。

五、流域生态重点治理工作启动,民勤绿洲绝处逢生,重现生机

从2001年7月至2010年3月,温家宝总理先后十五次对石羊河流域的生态治理做出批示,

并亲临石羊河视察指导,强调“决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温家宝总理的指示明确了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过程中“统筹规划,落实措施,科学治理,务求实效”的治理思路,提出了三套“组合拳”的治理措施,表达了国家改善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决心和意志。

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呈现之后,甘肃省人民政府就开始了石羊河流域生态问题的研究和治理工作。2007年12月,国家发改委、水利部报请国务院同意后,以发改农经〔2007〕3378号文件联合印发《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下称《重点治理规划》),标志着《重点治理规划》得到国家批准。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工程建设项目总投资47.49亿元,其中武威属区40.55亿元,金昌属区6.94亿元,规划要求工程建设由行政领导负责制进行建设。工程建设期3年,从2008年初开始到2010年10月完成。以综合治理方式全范围进行建设。主要建设包括骨干工程、田间节水改造、主干及支渠道改建、大田滴灌喷灌、关井压田、设施农业建设、日光温室滴灌、生态移民、生态保护及沙漠化建设等内容。工程建设期间,凉州区西营河向民勤专用输水渠工程建设年调水1.1亿方,工程改建等节约的水全部用以恢复石羊河生态用水方面,形成民勤北部青土湖浅埋区湿地。为抢救



青土湖地下水位上升到3.7米,植被恢复良好

民勤绿洲,改善石羊河流域生存和生态环境状况,保障西北地区乃至更大范围的生态安全重点治理工程开始进入了全面建设实施阶段。

2010年5月5日,在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目标责任书签订会上,中共武威市委书记火荣贵立下军令状,郑重表态“如果今年完不成民勤蔡旗断面下泄水量达到2.5亿立方米的目标任务,我将引咎辞职!”强调要按《规划》设计完成向下游民勤下泄水量,并全力推进实施。至2010年10月23日,石羊河流人民勤蔡旗断面水量已达到2.505亿立方米,提前超额完成了《规划》规定的今年过水量不小于2.5亿立方米的近期目标。至2011年7月,流域内武威属区地下水开采量削减到4.94亿立方米,民勤盆地地下水开采量控制为1.05亿立方米,地下水控采任务基本完成,青土湖地下水位上升到3.7米。重点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近期目标基本实现,各项指标达到了预期目标。

2010年12月,石羊河流域林地总面积达到172.52万公顷,其中有林地13.00万公顷,疏林地0.76万公顷,灌木林地87.57万公顷,未成林造林地2.97万公顷,苗圃地0.05万公顷,宜林地68.16万公顷。林木覆盖率12.06%。通过采用人工造林和封山育林等措施,共恢复和扩大森林面积2.67万公顷,保护天然林22.88万公顷。森林蓄积量达到996万立方米,年蓄积增长量稳定在20万立方米以上,有效地保护了哺育武威人民的“绿色水库”。

结合国家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和防沙治沙工程,在绿洲的边缘地区实施退耕造林,建立起绿色屏障,遏制沙化,实现了沙退人进。石羊河流域北部风沙沿线已营造防风固沙林11.33万公顷,封沙育林草8.47万公顷。沿风沙线建成防风固沙林带380多公里,治理重点危害风沙口240多个,控制流动沙丘13.3万公顷以上,北部风沙沿线治沙造林成效显著。民勤西沙窝、凉州东沙窝和古浪冰草湾至永丰滩一线多处重点流沙地段和大部分侵入绿洲的零星沙丘得到了控制,一些沙漠边缘地区已经出现了人进沙退的可喜局面。防沙治沙直接保护农田16.0万公顷,受保护农田产量平均增

产按每亩40公斤计算,增收13440万元,农民人均增收83.5元;治沙造田和低产田改造2.6万公顷,亩纯收入按300元算,增收11700万元,农民人均增收72.6元。

经过近五年重点治理,石羊河流域水资源管理秩序进一步规范,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改善了生态环境,《重点治理规划》近期主要目标基本实现。到2011年底,累积关闭灌溉机井3318眼,压减灌溉配水面积66.33万亩,生态移民1.05万人,建成设施农业31万亩,完成骨干水利工程824.67公里,完成投资30.85亿元,向石羊河尾间青土湖下泄水量3090万立方米,民勤区域沙尘暴次数由“十五”时期的年均12.8次减少到“十一五”时期的年均8次,使干涸51年之久的青土湖形成10平方公里的人工季节性水面,部分关闭机井成自流源泉,部分低洼封育区地下水位出现大面积回升,沙生灌草植被蓬勃丛生,生态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温家宝总理称赞“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2011年8月5日,水利部部长陈雷在武威调研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工作时非常感慨地说:“没想到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的成效这样好,没想到武威市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力度这么大,没想到基层干部工作抓得这样实,没想到武威的群众对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这样支持”。四个“没想到”既是对石羊河治理的高度概括,又是对石羊河治理的充分肯定。

拯救民勤,治理石羊河,建设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既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对甘肃人民的亲切关怀,也寄托着流域属区人民创建美好生存环境的殷切期盼。实现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目标,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我们坚信,石羊河流域人民一定会把自己的思想行动和国家的总体决策部署保持一致,以全力以赴,团结协作,奋力拼搏,扎实工作的奋斗精神,坚决打赢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攻坚战,全面实现流域内生态恢复的目标环境,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注:本文所采用图片均由民勤县志办提供。

(作者单位:武威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

甘肃新编地方志

车安宁

甘肃建国初修志始于县志，发端于永登县。1953年至1966年间，先后又有通渭、敦煌、永昌、陇西、岷县、甘谷、酒泉、张掖等市县陆续修志，但至“文革”前，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成果见微，价值不大。此间，全省有51个市、地、县参与编修部门专志《土壤志》。1959年，启动《甘肃新志》的纂修，两年多后，完成《甘肃新志》中的《工业志》《文化艺术志》《交通志》《机械工业志》《教育志》《民族志》《铁路科学技术志》(上)《甘肃省近百年大事年表》等；另有陆为公和杨生华组织编辑的《甘肃解放前五十年大事记》(1898年戊戌变法—1949年)，记述事件1631条，约16万字；1965年甘肃省气象局编辑出版《甘肃气候志》。总体看《甘肃新志》共16部，100万字以上，大部分为未定稿，且内容粗糙，政治倾向偏颇，但资料较为丰富。

甘肃新编地方志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1983年甘肃省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重视编修甘肃省地方史志的决议案》为标志。1984年开始编修甘肃历史上第五次《甘肃省志》。各市(州、地)县(区、市)的志书编修也相继展开。至2005年底，83部县区志，基本告罄。至2011年，《甘肃省志》共73卷，基本完成。2006年开始第二轮县级志书的编纂。目前，大部分进入二轮修志，少部分县(区、市)已完成二轮修志。

《甘肃省志》第一轮始编于1984年，至2011年基本完成。全志共设73个分卷，由概述、大事记及各专志和人物志、附录组成，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全文以志为主，约4000万字，2000幅图片。其中《档案志》《文化志》《人物志》正在出版中。王秉祥、陈绮玲、陆浩、徐守盛、

刘伟平先后担任编委会主任，徐宗望(兼)、韩志德(兼)、杨若愚、夏荣生、王在鹏、金庆礼、李虎先后担任主编。曾有八部省志分卷获全国志书优秀成果奖。

《甘肃省志·概述》排序在一轮省志之首。主编孙民，副主编牛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12.8万字。卷首有领导人题词10幅，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甘肃照片12幅。置甘肃省政区图、地势图、交通图、红军长征及解放战争路线示意图。总序1篇，凡例13则，并《甘肃省志》各卷卷目。章节体结构，设7章25节88目。篇目依次为：自然概况与行政区划；悠久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开拓建设甘肃；民主革命时期的甘肃；陇原人民的新生；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前进时期；历史性的转变。《概述》以时为序，按事分章，宏观记述了甘肃自然地理之概要，历史发展之脉络，内容还涉及陇右兴盛与丝绸之路；甘肃古代民族及历史上曾建立过的国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甘肃及红西路军的悲壮征程等。1993年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书优秀成果一等奖。

《甘肃省志·地震志》排序12卷。主编郭增建，副主编刘万忠、石特临、刘多斌、刘庆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约44万字。序1篇，凡例6则，照片30幅。其中包括1927年古浪地震破坏现场，1920年海原地震断裂带考察，1990年天祝、景泰地震震中破坏现场的照片。上限为公元前193年有据可考的甘肃第一次地震的历史记载。地震事业始于1953年，下限止1990年。设概述，总括甘肃两千年来历史记载6级以上地震37次，其中7级以上大地震15次，8级以上特大地震3次(1654年天水地震、1879年武都地震、1927年

古浪地震)。主体内容横列地震事业有关门类,纵述地震活动及地震事业发展过程。设7篇22章71节。篇目依次为:地震活动;地震地质;地震监测;地震预报;地震研究;地震考察;地震机构。附录收重要文件摘要辑存7份,附表4份。该志记有1953年原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在甘肃建立4个地震台站和1954年1月22日甘肃省第一张地震记录图在兰州诞生等大事。并特设地震考察篇,记录广泛调查的地震前各种异常现象,为探索地震前兆积累了大量资料。全志以“编纂始末”收卷。憾缺地震工作大事记。1993年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书优秀成果二等奖。

《甘肃省志·气象志》排序13卷。李之华任编纂领导小组组长,缪培俊、白肇焯任副组长,冯景成、蔡增新、杨文义、郭富荣等撰稿。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出版。约25万字。序1篇,凡例8则。从1932年兰州有气象测候起始,下限止1985年。设8篇31章102节。篇目依次为:历史沿革;大气探测;气象通讯;天气预报;甘肃气候;气象科技档案;农业气象;气象科技与教育。附录:1952年西北军区司令部气象机构设置示意图;1985年甘肃省气象机构设置示意图及机构设置沿革;主要气象灾害年表(前193-1985年)。后记收卷。该志全面记载了甘肃气象事业的历史沿革,主要工作内容及方法、手段,其中的资料记述对揭示甘肃气候特征、变化规律等尤有价值。1993年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书优秀成果三等奖。

《甘肃省志·农业志》排序18卷。总编崔荣芳、李长成。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约146万字。序1篇,凡例10则,40多幅图片。全志上限追溯至约公元前5800年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时期,下限止1985年。个别方面因全省土壤普查延至1991年。志前由概述引导,以篇为结构主体,分上下两卷,共8篇50章187节,上卷篇目依次为:生产条件;生产关系;作物;技术措施。下卷依次为:科学研究;科技交流;教育;机构。全志以时序分清代之前、民国时期、陕甘宁边区陇东革命根据地及新中国成立后四个时期的农业生产状况,梗概甘肃由古至今农业的发展历史。尤以种植

业为主体内容,对农作物和技术措施、科学研究等记载详备。附录收1949至1985年农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名录、农业基本情况统计表、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章程、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资料和社员生活资料等问题的意见与规定、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等不同时期有关十个大类的文献资料。编后记收卷。1997年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书优秀成果一等奖。

《甘肃省志·财税志》排序37卷。总编庞一敏、银少峰、陈兆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42.8万字。序1篇,凡例8则,38幅图片中有20余幅是清代甘肃宝巩局、官钱局铸造的铜钱、印制的司钞、官银号发行的兑换币、纸币及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币、布钞等。上限自1840年,下限止1985年。除概述外,设5篇25章105节。篇目依次为: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机构人员;陇东革命根据地财政。该志是甘肃省第一部财税专业志,纵述甘肃财税的历史发展轨迹,横陈不同时期的经济结构、分配关系及收支管理。尤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创建和领导的陇东革命根据地军民克服各种困难,创造财政收入,自力更生,艰苦朴素的行政费用支出详有记述。憾缺大事记、附录、后记等。1993年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书优秀成果二等奖;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甘肃省志·金融志》排序44卷。主编丁文翔。由省级五行一司共同编写。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145万字。序1篇,凡例13则。反映金融系统工作照99幅,按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保险事业和修志辑要排序。全志上限追溯至有史可考始,下限止1985年。对有些发展较快的新开办业务写至1990年。设8篇56章243节。篇目依次为:甘肃历史货币与金融;甘肃人民金融事业的创立与发展;金融管理;城市工商信贷;城市储蓄;农村金融;国际金融。该志在系统记述不同时期货币、信用的产生与发展,机构沿革、体制变化的同时,特别在第一章对甘肃历史货币与金融,溯古及今,对先秦时期的海贝有所记载,还对陕甘宁边区陇东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机构和货币发行及流通有所记述,看出在

当时的 20 年内, 不仅对支持人民战争作出贡献, 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金融事业, 进行了理论、组织和实践上的准备。附录收大事记、后记、历史货币拓片图 44 幅及英文目录。1997 年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书优秀成果二等奖。

《甘肃省志·计量志》排序 46 卷。主编杨新彪。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9 月出版。34 万字。序 1 篇, 凡例 11 则, 设前言。60 多幅图片中有秦铜权、铜诏版, 东汉彩绘骨尺、铜斛、新莽铜环权等珍贵历史文物。上限追溯远古, 下限 1987 年。章节体结构。设 15 章 56 节 168 目, 篇目依次为: 历代度量衡的演变; 度量衡单位制; 度量衡标准器; 度量衡管理; 计量单位制; 计量标准; 计量测定与测试; 计量科学研究; 计量法律法规; 计量技术管理; 民生计量管理; 工业企业计量管理; 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监督管理; 计量机构; 计量技术培训与学术活动。该志系统地记述了先秦至当今历代度量衡单位及量值的演变, 突出了计量制度的统一和计量技术、计量管理水平的提高。憾缺概述与大事记。1993 年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书优秀成果二等奖。

《甘肃省志·教育志》排序 59 卷。主编邓品珊, 副主编韩嘉穗。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出版。80 万字。序 1 篇, 凡例 7 则, 照片 52 幅。上限起自公元 3 年西汉在甘始置学官, 下限 1986 年。章节体结构, 设 18 章 76 节, 冠以概述。篇目依次为: 教育制度; 教育行政管理; 教育法规; 教育经费; 兴学堂以前的学校教育; 陇东解放区教育; 幼儿教育; 小学教育; 普通中学教育; 特殊教育; 中等职业技术教育; 中等师范教育; 普通高等教育; 成人教育; 少数民族教育; 电化教育; 教师队伍; 教育科学研究。该志记述了甘肃教育的发展演变, 重点记述从 1902 年兴办近代学堂到 1986 年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历程, 尤对历代官学、私学、义学、社学的发展, 书院、儒学与科举, 详有备述。附录专列教育人物部分, 收录省级教育人物 30 人, 高等学校人物 440 人, 初等和中等学校人物 237 人。编后记收卷。1993 年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

《甘肃省志·民族志》排序 70 卷。主编王梓杞、马通。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3 月出版。凡例 9

则, 正文 14 篇, 63 章, 229 节, 大事记收篇, 后记终卷。108 万字。分序置前。接置全省少数民族图、民族州县基本情况表。有题词 9 幅, 160 幅照片按关怀与支持、民族风貌、民族区域自治、经济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民族文化类相继排列。全志上起唐尧, 下迄 1990 年。甘肃自古以来系多民族聚居地区, 先后有数十个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依照略古详今原则, 对元代以前在甘肃活动过的少数民族, 纳入“古代民族”篇记述; 对现有民族中人口较多(3000 人以上), 且有大小不等聚居地区的回、藏、东乡、裕固、保安、蒙古、哈萨克、撒拉、土、满等 10 个少数民族, 均各设篇详述; 对汉族和 34 个人口较少的散居少数民族成分, 则在“概述”篇中简述。以篇、章、节、目四个层次结构全志内容, 上编远古至民国时期(约公元前 26 世纪—1949 年 9 月); 下编新中国成立后(1949 年—1990 年)。附录收甘肃省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甘南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该志由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组织 10 余位民族学专家编纂, 全面系统记述了甘肃少数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 纵贯古今, 包括各民族的起源、变迁, 人口变化, 文化习俗, 宗教信仰, 生活禁忌, 受教育状况, 通婚等, 同时也记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各族人民生生不息, 开拓建设家乡, 各民族间和睦共处, 友好往来, 维护统一, 争取民族振兴繁荣的精神风貌。尤设人物专篇, 主要收录明代以来的少数民族人物, 按其影响大小, 传记 44 人; 简介 119 人; 名录 357 人。2004 年获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2005 年获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甘肃省志·宗教志》排序第 71 卷。主编妥进荣, 副主编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杨森、赵经农、王至全、巩光明。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1 月出版。55 万字。分序 2 篇, 题词 4 幅, 照片 2 幅, 凡例 10 则。由概述开篇, 总揽全志。内容详今略古, 重在当代, 下限统一断至 1995 年。主体结构以甘肃五大宗教设篇, 凡 6 篇, 23 章, 72 节。具体为: 第一篇道教, 辖 4 章 12 节; 第二篇佛教, 辖 4 章 14 节; 第三篇伊斯兰教, 辖 5 章 16 节;

第四篇天主教,辖5章16节;第五篇基督教,辖5章14节;第六篇宗教人物。后缀甘肃宗教大事记(远古时期—1995年)。附录收载伊斯兰教教派门宦、西道堂传教世系概况(含教派门宦情况表、花寺门宦传教世系、毕家场门宦传教世系、穆夫提门宦传教世系、北庄门宦传教世系、胡门门宦传教世系、哲赫忍耶门宦传教世系、库布忍耶门宦传教世系、嘎的忍耶门宦传教世系表、嘎的忍耶门宦的拱北和静修地、西道堂家族——马启西家族、敏南瑞家族、丁姓家族、马明仁家族、丁全功家族、敏海峰家族概况表);道教历史文献(4通碑记)、道教历史文献和碑刻目录(分文、史、哲理类目,经典类目、医学类目、金、石、碑刻类目共计110条);道教人物表(32人);1949年至1951年末甘肃境内外籍修士及从事职业情况一览表(计16人)、天主教传教士一览表(计58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1年末甘肃境内外籍修女及其从事职业情况一览表(计49人)、1949年至1951年9月底甘肃境内中国籍神职人员一览表(计42人);基督教碑文、对联。后记收尾。是志编写由甘肃省宗教局正式成立编纂委员会、由省民委主任兼宗教局局长李膺任主任,省民委副主任兼宗教局副局长潘年发任副主任,制定按教分篇,即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各为一篇,并将具体任务分解到下属各相应的宗教协会,各宗教协会先后成立以协会负责人为主的编写领导小组,广收资料、编写初稿,并初审。之后在终审阶段,由主编负责,落实专人组织省民族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分工对各篇进行编辑修改及补充工作,并分送省上有关领导、省直有关部门、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广泛征求意见,力争做到言之有理,论之有据。历经十多个春秋。甘肃是一个多宗教的省份,宗教发生、发展历史悠久,道教在我国的产生有1700年左右的历史,汉传佛教在甘肃也有2000年的历史,藏传佛教(喇嘛教)约在1200年前已传入甘肃,伊斯兰教有1400年的历史,只有天主教和基督教近代才传入。甘肃又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信教群众约300万人,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回、东乡、保安、撒拉、哈萨克等,信仰藏传佛教的

有藏、蒙、裕固、土等少数民族,约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96%左右。汉传佛教和道教为汉族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也主要是汉族信仰。因而,宗教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具有一定复杂性。鉴于这一基本特点,是志采取按教分篇的办法,详记五大宗教各自在甘肃的传播及发展,教派与组织管理、教义教理、宗教节日与礼仪、宗教文化与宗教活动等,一教一篇,首尾融贯,极便通览。尤对各个宗教在全省的著名寺院道观及遗迹记载为详,如记道教宫观71处;佛教石窟19处,藏传佛教著名寺院26处,汉传佛教著名寺院17处,著名佛塔及钟楼石刻25处(碑);伊斯兰教著名清真寺23处,著名拱北、道堂7处等等,囊括了“天下道教第一山”平凉崆峒山,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列居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在西北、全国和阿拉伯世界都有一定影响的兰州西关清真寺以及各宗教所创造的灿烂文化艺术,充分彰显了甘肃宗教的特色与优势。另设宗教人物篇,翔实地为各个宗教的104位著名人物立传、简介,详其生平、功绩与著述。附录中,以表格的形式收录伊斯兰教教派与门宦,西道堂传教世系概况;收录道教历史文献,碑刻目录、人物表等。

二轮《甘肃省志》已出版或正在出版的分志有《大事记》、《人事志》、《社会科学志》、《林业志》、《监察志》。

甘肃新编市、县志。甘肃全省86个县(市、区)首轮计划编修县(市、区)志83部。2005年,随着《碌曲县志》的出版发行,首轮县(市、区)志全面完成。随着首轮县(市、区)编纂工作的进行,一些市(州)开始了志书的编纂工作,确定首轮编修12部市(州)志(缺失的两个市为陇南、定西)。截至2012年底,全省列入首轮规划的12部市州志都已出版。第二轮市、县志编纂工作于2004年2月正式启动。此前,个别县区自行安排开展续修工作。全省第二轮共编修市、县志99部,其中市(州)志14部,县(市、区)志85部(漳县由于首轮下限在2006年,暂不续修)。至2011年底,全省14部市(州)志已出版4部:《白银市志》《酒泉地区志》

《武威地区志》《平凉地区志》(以上后三部为一、二轮合并出版)。列入规划的 85 个县(市、区)已出版 23 部,通过终审 7 部。

《甘南藏族自治州志》甘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主编王俊英、杨志红,总纂石为怀。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出版。全志上下两册,计 36 个分志,162 章 624 节,240 万字。序文 1 篇,凡例 12 则。上限追溯远古,下限断至 1990 年,个别卷章有所下延。上册开卷首排彩照 94 幅,编修始于 1985 年,特点有三:一是突出民族特色,单列民族志、宗教志、藏医药志、民俗方言志,集中记述藏族源流、主要部落、宗教流派、寺院、藏民俗和方言、宗教团体、宗教工作等,同时兼及对汉、回、土、蒙等民族的记述。二是在有关志文中专设章节表述民族特色,如:文化艺术志中设民间民族文学;体育志中设民族体育;教育志中设宗教教育(佛堂经堂教育、寺院办学、佛教学院);政权志行政机关章下设卫所、土司、义仓;畜牧业志中设藏兽医节等,还在司法志的司法制度中,设目记述拉卜楞寺、卓尼土司的司法制度,在人物志中设宗教人物、著名藏医、民间艺人和能工巧匠等。

《张掖地区志》张掖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总纂先后为李龙海、常征、吴雄成,副总纂张志纯、李生安、何成才。2010 年 10 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志三卷本,上卷前置三序,凡例 14 则,下卷末设后记。正文设 10 编,81 章,478 节,计 430 余万字。断限上溯远古,下至 1995 年。全志采用大编体,编下分设章、节、目,个别酌立子目。卷首附行政区划图、地势图、影像图和 10 幅不同历史时期地域图。有朱德、邓小平、江泽民、李先念、徐向前等领导人题词 20 幅。各卷首设资料照片及名人书画照 400 多幅。序文交代:张掖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中部,是古丝绸之路东段南、北、中三路的交汇重镇,历史可上溯 5000 年前,西汉元鼎六年(前 111 年),张掖郡正式树名。提及清顺治十四年修成《重刊甘州志》,乾隆四十四年修成《甘州府志》。这里山峦起伏,绿洲辽阔,河渠纵横,矿产丰富;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林木葱茏,花果争妍;民族兴旺,民风质朴,古迹遍布,典籍丰博。概述中

说:有夏禹导弱水于合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策马鏖战,北凉沮渠蒙逊征东战西,隋炀帝举行万国博览会,西夏王攻占甘州,成吉思汗戍守张掖,李先念、徐向前率红西路军血战河西,董振堂、杨克明捐躯高台,王震、许光达会师张掖城等历史遗存。篇目设计有所创新,首篇为综合编,将概述与大事记及历史沿革、市县概况、城乡建设等纳入此编,再依次设地理、经济(三编)、政治、文化、社会、人物等编,以第十编文录作为附录。文化编纳教育、科技、文物古迹、艺文、卫生医药、体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档案、地方史志等章。社会编纳民族、人口、宗教、人民生活、婚姻·家庭、社会保障、道德风尚、社会风俗、社会陋习、方言等章。在概述、大事记、军事章、人物编等部分,以不同角度记述了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5 月红军西路军两万一千余人西征,与十多万国民党马家军浴血奋战的事迹,在张掖地区历经数百次战斗,万余名将士壮烈牺牲,数千名红军溃散,有些被俘,有些流落民间,仅四五百人最后回到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当地人民政府为此建立烈士陵园和纪念碑。人物编有古代人物、红西路军阵亡团以上干部、红西路军部分将士在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主要职务名录、流落红军及掩护红军人士、抗美援朝烈士、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烈士及当代政治、文化、科技人物。文录编收古籍选录、金石镌华、历史文献、红西路军史料节选、当代文选等章。

《酒泉市志》(一、二轮合并)酒泉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方志出版社 2008 年 5 月出版发行。主编孙占鳌。该志分序、凡例、概述、大事记、正文和附录四十五编,共 476 万字。该志篇目设计结合当地实际,体例编排富有新意,尤其是在整体设计上突出了策划意识和精品意识,特设“历史沿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疏勒河建设”、“农垦”、“玉门油田”、“敦煌学”等编,充分体现了酒泉的地方特色和地域发展特色。

《天祝藏族自治县志》(1989-2005)天祝藏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主编李占忠。方志出版社 2007 年 5 月出版。天祝藏族自治县成立于 1950 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所设的全国第一个少数

民族自治县。该志是在1994年10月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天祝县志》之后的一部续修县志,也是甘肃省第二轮修志中出版的全国第一部少数民族自治县县志。其上限为上部县志的下限1989年,下限为2005年。设23编122章,约75万字。志文介绍:天祝县位于甘肃省武威市东南部,依祁连山脉东端,境内兰新铁路、312国道纵贯南北,地势险要,素有“河西走廊门户”之称。全县辖域面积7149平方公里,居住着藏、土、汉等16个民族,共23万余人。境内群山环抱,峰峦叠嶂,有郁郁葱葱的苍茫林海,终年积雪的雪山大川和碧草如茵的广阔草原及大小10多条河流。海拔最高4874米,最低2050米,属大陆性高原气候。志首有自然风光与资源、历史以及经济、政治、文化与文物、社会等方面的照片一百余幅,收录天祝县行政区划示意图和城市道路交通图。与1994年版的原《天祝县志》一样,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组成,并增加了索引。全志述、记、志、传、图、表、录、考、索引等并用。概述综述原《天祝县志》和本志之概要,概括县情,总摄全书。大事记以时为序,载大事、要事;专志分编、章、节,部分节下设目及子目,个别编只设章未设节。志文横列门类,纵述史实,记述了时限内全县自然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情况。附录收一些单项性的重要资料。该志以编后记收尾。2009年获得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史志成果一等奖。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志》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地方志编委会编,主编安耀民,副主编马国雄、李生荣、黄月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张家川1953年立县,后曾撤销建置,1961年恢复至今,史无方志。全志序文2篇,凡例11则。概述冠前,大事记接后。上限始于事物发端,下限断至1989年,个别事物适当延伸。凡31篇,158章,485节,约159万字。开卷有原国务院副总理杨静仁题签书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白寿彝和全国政协常委、原张家川地区中共地下党特派员沈遐熙的题词。有行政区划图和照片77幅,寺院瞩目,特产毕见。在篇目设计上突出重点,即升格单列政治部类,详记早期中共地下组织工作、历次党

代会、基层党组织及党务工作。逐一记述了从解放至改革开放期间的中心工作和政治运动,对他志罕有的国民经济调整、农业学大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等列一事一目,本末记述,连贯不漏。同时升格单列民族与宗教篇,并在篇首列民族宗教工作章,详述民族工作、民族关系和宗教工作。尤对回族源流、聚居区的形成、风俗习惯等记载详慎。还对境内伊斯兰教的传入与发展、基本教义和职责、教派、道堂、清真寺、朝觐活动、纪念日、禁忌等精审而记。还升格单列誉满全国的皮毛业一篇,记述皮毛业在当地的形成与发展,行店、货栈和购销,皮革、羊绒加工,技术发展及相关企业等。全志31幅地图,属其特色,其中19个乡镇,各附一图,随文相配,还有地形图、地貌图、土壤图、山系图、水系图、地质矿产图、天然草场图、公路交通图、风向玫瑰图、冰雹路径图、人口密度示意图等。并单设自然灾害篇,分旱灾、雹灾、洪涝灾害、寒潮与霜冻、地震、病虫害及其他灾害共七章,分别记述不同时期发生的灾害,及人民群众防灾抗灾的精神、方法与成效。在人物篇,立传31人;简介历史名人79人;现代名人29人。表列历史人物47人;革命英烈46人;流落红军、八路军战士4人;先进模范59人;高级科教人员19人。并单设民情习俗篇。附录收载文献有:传说、轶事、异象、奇闻、家谱、契约、碑文、墓志、御旨等,后记和索引收卷。2000年获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

甘肃新编专志。新时期修志以来,甘肃还出版行业志、部门志、专业志以及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公司、场队、院所志等276部,其中较为有特色的45部。

《吧咪山志》永靖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纂,兰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主编常全光。该志由概述、大事记、志、人物、附录组成,附图100余幅,27万字。为社会各界了解、研究及开发吧咪山各类资源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志文记载:吧咪山位于兰州市以西,永靖县城以东约15公里处,南临洮河,西接刘家峡水库,是陇上名山马衔山脉的尾端。原名黑山,吧咪山山体长10公里,主峰海拔

2660米。有森林面积12平方公里,有野生动物10多种,有药用植物70种,有可供人类调味的植物十几种,还有可供观赏类的植物100余种,有的树木已有300多年的树龄,树干粗大,树枝参天。是黄河三峡著名的原始森林游览区。随季节变化,吧咪山植被有春花、夏林、秋色、冬雪之景观。春季,山坡繁花似锦,山花满谷,鸟鸣蝶飞,异彩纷呈;盛夏,树木郁郁葱葱,浓荫蔽地,曲径幽深,凉爽的空气使人心旷神怡;深秋,满山红叶,透出青松翠柏,充满诗情画意;入冬后,白雪皑皑,银装素裹,数不尽的琼雕玉翠琳琅满目。吧咪山不仅风景绮丽,更有“金花仙姑”神奇传说,誉满陇原。据考,山上道观建于成化四年(1468),原建大殿宇三间,厢房数十间,后由乡民建成百子宫、转阁楼、祖师殿等殿宇;同时,有陕甘总督左宗棠手书的“金花神祠”铜匾、刘尔忻书“慈航广渡”、鲁大昌书“泽被群生”等匾额多块。1958年殿宇被毁。1992年由民众集资、出力,经三年努力,于1994年又修成四周二十八柱正殿一座,百子宫、金花宝殿、山神殿、土地庙、前殿仿古大门等十四座大型殿堂,三十间住所,总建筑面积达320平方米。建筑起脊卧阁、雕梁画栋、斗拱飞檐、巍峨壮丽。各殿堂内分别供有“九天圣母”、“金花仙姑”、“三霄娘娘”、“山神土地”、“黑池龙王”等鎏金铜神像。道观前有一口丈余深的储水井,称为“池”,池中蓄水从“龙口”流出,当地百姓誉为“神水”。水旁,道观东边挺立着一棵高大的油松树,粗0.8米,高20余米,树冠似一把张开的大伞;庙台下院,有4棵树皮灰褐、两人才能合抱的大朴树,也叫茶树,分列东西,树冠达20米,将小院遮盖成荫,清凉幽静。志文还记载,山中有伟晶岩中的沸石矿,花岗闪长岩中的铜矿等宝藏。吧咪山的人文历史已有五百余春。如今,这里已成为陇上道教圣地和永靖黄河三峡著名旅游胜地。

《酒钢志》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酒钢,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是国家“一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之一。该志反映出酒钢系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国家碳钢和不锈钢生产基地。主体技术装备水平居国内先进行列。1985年起,酒钢一直入围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

业行列。该志是为庆祝酒钢公司建厂五十周年而编撰的大型工具性志书。编委会主任为酒钢(集团)公司董事长马鸿烈;副主任为酒钢(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梁传密,总经理臧秋华;名誉顾问为酒钢(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韩显沛、马忠朴。编纂办公室主任为酒钢(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曹红斌。原全国人大常委会主任,酒钢初建时任设计院院长的乔石同志为该志封面题字书名“酒钢五十年”,为该志的又一称谓。该志上限始于1958年,并对1955年发现镜铁山矿作了延伸记述。下限断至2006年,前后50年。采用篇、章、节、目、条的编排形式,在篇章之前增加无题序,以容纳由于史料不详等多种因素导致条目中难以记述,而酒钢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历史条件,同时对篇章做高度概括,以加强补缺,增加可读性。全志以文为主,辅为图表。单位名称多用简称。正文中原则上不出现自然人的姓名,特殊情况除外。全志设“概貌篇”、“综合管理篇”、“生产篇”、“建设篇”、“营销篇”、“科技篇”、“生产保障篇”、“生活后勤篇”、“文化教育篇”、“党委工作篇”、“群众工作篇”、“子公司管理篇”等12篇54章83节572个子目,近2000个条目,约120万字。2008年6月在酒钢(集团)公司建厂五十周年前夕刊印面世。酒钢(集团)公司创建于1958年,志文则从1955年华树沟探矿写起,因镜铁山矿在当年被勘探发现,才有了酒钢诞生的资源条件。酒钢建厂50年,三上两下,建设历经艰难曲折;十年徘徊,长期亏损,企业规划多次变更;改革开放30年,开拓创新,现成为甘肃省骨干和龙头企业及西北地区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该志如实地记述酒钢的发展历史和全貌。但部分章节叙述略嫌累赘,有重复现象,且有评论性的褒扬文字,不大符合志书的体例。全书校审欠细,错别字较多。

《八卦营村志》八卦营地处祁连山前冲积民乐盆地南缘永固隆起南部,是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永固镇所辖的一个村。该村志由村志编委会编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出版。是近年来张掖地区所撰写的多部村志之一。《八卦营村志》虽为一村之史,但其撰述突破详今略古的惯例,从凸现八卦营本地特色出发,将其赋志(下转第41页)

崇信县

地方志工作综述

崇信县地处平凉市东部，全县辖2镇4乡2个管委会，79个行政村，410个合作社，总人口10.2万人，总土地面积850平方公里。2011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5.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7.2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1亿元，大口径财政收入达到4.5亿元，地方财政收入达到1.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6363元和3718元，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等指标增速位居平凉市前列。

崇信县志办与党史办于2002年1月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机构，承担全县地方史志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纂、宣传和业务指导工作，现有工作人员5名。近年来崇信县严格按照《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的要求，认真贯彻中央、省、市业务指导精神，以“存史、资政、育人”为根本任务，深入挖掘地方史志资源，扎实开展史志宣传，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精编地方史志书刊，取得了一定成效。史志办先后编著出版了《崇信年鉴》(2003-2006)《旗帜在这里飘扬》《中国共产党崇信县历届代表大会文献汇编》等书籍3卷本108万字，指导出版《崇信县工业志》《崇信县军事志》等部门志书13卷本286万字，配合上级部门编书供稿154万字，正在编纂的3本已有阶段性成果，22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崇信县历史》已经印刷征求意见稿，39.5万字的《崇信年鉴(2011)》已交付印刷，91万字的《崇信县志》(1991-2010)二稿已送特邀编辑、顾问审阅。成果由以前的数年一项增加到现在的年数项，先后有两本书获得省级地方史志成果二等奖，史志办两次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彰奖励，各项工作进展良好，全县史志事业进入加快发展的

新战略机遇期。

1、领导重视，部署到位。崇信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史志工作，将史志工作摆上全县重点工作的议事日程，每年县委工作会议专题安排史志工作，并将史志工作任务纳入全县党建目标责任书，与其他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由县委副书记和一名副县长分管、联系史志工作。县委先后6次发文调整全县史志工作领导小组，县委书记任组长，县委副书记、县长任副组长。2010年12月9日，县上组织召开了由全体县级干部、部门乡镇主要负责人和包抓责任人参加的二轮修志动员部署会议，县委书记作了专题动员讲话。2011年3月25日，县委书记亲自带领四大家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对史志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实地解决困难和问题。特别是在《崇信县志》(1991-2010)征稿遇到进度慢、质量不高、部门不够重视等问题时，县上又及时出台了县级领导包抓责任制，专门下发文件明确了每名县级领导的包抓任务、方式方法和责任；在各级领导的包抓督促下，全县106个单位在7个月内完成了185万字1085张照片的供稿任务，为编纂初稿赢得了时间和主动。涉及全县性的资料征集、出版发行等重大工作，均以县委办、政府办联合发文的形式进行专题部署安排。在人、财、物等方面给史志办以倾斜和支持。县上高规格的部署、高标准的调研、高频率的调度真正使主要领导将史志工作放在了心上、分管领导抓在了手上，其他各级领导落实在了行动上，形成了良好的史志工作氛围和机制体制。

2、开门修志，方法灵活。崇信县为县志编辑部聘请了4名资深顾问和9名特邀编辑，负责撰稿和审核。为了进一步理清全县20年的发展脉络，县志编辑部还对1991-2010年期间在崇信担任过“四大家”主要领导职务的17名退休和在职领导干部进行访谈，了解全县20年来发展变化光辉里程，掌握第一手编纂资料。为了加强纵向沟通和横向交流，县史志办创办了《崇信史志通讯》，同时，在全市率先创建了“崇信史志网”，通过网络联系，使沟通交流有了平台和载体，更加简单、便捷、透明。在县志资料征集过程中，为了搜集全面、详实的基础资料，各部门、各单位抽选老同志、笔杆子对本行业(单位)20年的档案资料进行认真细

致查阅,并通过走访老干部、举办座谈会、部门联动等形式广开渠道,征集资料。县委办、政府办、组织、宣传、教育、财政、党校、档案等及县内大型企业等单位密切配合,出钱出物,大力支持。彻底扭转了史志部门势单力薄,无人管问的局面,在全县范围内形成党政领导总抓,史志办牵头,各部门联动,社会参与,齐抓共办、开门修志的工作格局。

3、建强队伍,靠实责任。崇信县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主任,县长任常务副主任,全体县级干部和县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在各乡(镇)、县直及省市驻崇各部门均明确史志业务分管领导和主办负责人,形成了横跨到边,竖包到底的史志队伍网络,建立了95人在线的史志工作QQ群,史志办每年对史志专干在党校主体班进行全面培训。制定下发《崇信县志编纂规范》,建立了撰稿、审稿责任制和主任、编辑包抓责任制。从史志办部门来讲,崇信县始终坚持以“以有为争有位,有位才有味”的工作理念,积极倡导“肯干事是德、会干事是能、多干事是勤、干成事是绩”工作量化标准,编辑部和史志办一体化运作,坚持狠抓学习不放松,理论和业务并举,学习和应用结合,开展史志讲堂,轮流授课。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先后组织职工赴山东、上海、北京、福建、江西、兰州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学习,解放思想,开阔眼界,提高认识,增长才干。六年来,史志办工作人员由2006年的2人增加到现在的5人,编制由5名增加到6名,新进入年轻工作人员3名,其中副主任1名,先后有5名同志受到组织的提拔、重用。先后有4人(次)受到县上的表彰奖励,有2人次受到市上的表彰奖励,有6人次受到省上的表彰奖励。单位人和事顺,风正劲足,干事有力。

4、服务大局,切准要害。崇信县始终把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做为史志工作的第一要务,把提高质量、保证质量做为第一硬任务来抓,把创新做为彰显自身特色、把选准课题做找准服务的切入点来办,在抓好《崇信县志1991-2010》和《中国共产党崇信县历史》两项主业产品的同时,也抓好了年鉴、党代会、获奖名单等辅助“产品”的开发,使主业不放松,副业不断线,做到了主副结合,长短相间,单位年年有成果,职工人人有事干。积极创新思维、创新方法,用成果感染读者,影响部门,争取

领导认可,从而赢得支持和帮助。坚持立足行业、彰显地域、奉献时代,在对外宣传上,县志办为来崇的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一手的县情概况资料。在经济建设上,为各个重大项目落户崇信提供了详实的前期地情资料,为县上的各项申遗、创优提供了历史根源。在服务群众上,坚持用史志成果激励人、成就人,为全县能干事、干大事、干成事的英模人物和先进单位搭建了名垂青史的平台,为各级惊天动地的辉煌壮举留下了奋斗足迹。在换届之年,县志办又编纂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崇信县历次代表大会文献汇编》;在“十一五”末,适时编纂出版了十一五获奖名单汇编——《旗帜在这里飘扬》;在建党90周年之机,举办了“历程·辉煌”大型图片展览,印发了革命烈士保至善传小折页;特别是2010年12月,按照“二十年左右续志”的要求启动二轮修志工作后,《崇信县志》(1991-2010)编纂工作领导高度重视,部门积极配合,征稿进度快、质量高,编纂工作进展扎实有序,各项工作齐头并进。今年又完成了《崇信年鉴(2011)》。所有这些行动,既把握政策导向,又体现时代要求,既符合领导思路,又反群众意愿,既做到了领导丰采有特写、部门形象有展示、群众活动有身影,又做到了切入得体、图文并茂、宣传有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展示了史志成果,提升了部门形象,实现了共赢发展。

5、夯实基础,保证投入。为保障编纂工作顺利开展,崇信县采取争资列项、财政支持、社会赞助等办法筹措经费,彻底改变了“钻研书写有劲、出书缺钱无力”的窘迫局面。财政支持力度伴随着成果频出逐年加大,使各方所需经费得到了保障,落实了编纂、出书经费,改善了办公条件,兑现了职工报酬待遇。六年来,业务经费由当初的4000元增加到16万元,先后累计争取省财政专项资金20万元,市财政专项资金4万元,县财政专项60多万元,购置办公桌椅12套,档案文柜4套,照(摄)像机1台,电脑9台,一体打印机2台,接入光纤通讯,实现信息化办公,单位的办公条件走在了县委机关的前列。积极化解处理历年所欠印刷经费等债务14万元,解决部分历史欠款遗留问题。创造舒心办公环境,激发了干部职工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体现人文关怀,凝聚人心,促进了工作。

《甘肃近代机械工业史料》编纂始末

安文迟

保存珍贵的历史资料是修志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职责。收集资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得来不易。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资料是非常珍贵的,如果用完后不注意保存而丢失,不但十分可惜,而且对历史也是一种罪过。我们应该以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将贵重资料归入档案,或者编好史料长编,存入省档案馆和省图书馆。

1989年,我在编修第一轮《甘肃省志·甘肃工业志》时编写了一册《甘肃近代机械工业史料》,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印数3000册,除送省档案馆、省图书馆收藏外,其余很快发行一空,很受机械工业企业和省内外研究工业史志的专家学者的欢迎和赞赏。

《甘肃近代机械工业史料》是《甘肃省志·机械工业志》编纂过程中的部分原始资料。史料记述的时间是从1872年到1949年,约77年。史料的来源主要是省图书馆、省档案馆、省政协编写的文史资料丛书,也有兄弟省、市提供的一些资料。史料主要记述甘肃机械工业的兴衰变迁、管理机构的沿革、主要人物的活动,以及与机械工业有关的机械工业学校的史料。《甘肃近代机械工业史料》与我编写的《甘肃省机械工业百年大事记》可相互补充、相互参照,同为有史料价值的资料丛书。

这些史料主要是官方文书、官员来往信札、大事年表、报刊通讯、会议记录、统计年鉴、地方志、回忆文章。有些资料极为珍贵,几乎是抓紧时间抢救出来的。再现了当时机械工业的历史面貌,编者不加任何修改,必要时只作注释。

这些史料十分珍贵,鲜为人知,编者辑录成册,目的是为广大读者,特别是机械工业战线的广

大职工了解和研究甘肃机械工业的历史提供翔实的资料。

全书选登的各类史料共50篇,约15万字。资料编排以时间为顺序,以便读者查阅和利用。

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原副主编李光为本书写《序》。

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原主任王秉祥题词“寻踪觅迹成绩卓著,存史资后更利腾飞”。

现将《甘肃近代机械工业史料》(1912—1949)的目录抄述于后,供编修史志工作者鉴赏。

目 录

西安机器局与兰州制造局	(1)
清政府经营的近代军用工业	(6)
左宗棠经营西北大事记	(11)
左宗棠生平大事简表	(15)
各省机器局建制年表(摘编)	(15)
清政府经营的近代军工业简表(摘编)	(16)
各省机器局建制年表(摘编)	(17)
清季各省之机器局(摘编)	(18)
甘肃机器局始末简记	(20)
甘肃机器局见闻	(24)
彭英甲时代	(31)
清末彭英甲举办甘肃洋务实业的一些情况	(33)
甘肃造币厂纪实	(39)
建设厅成立及沿革	(44)
甘肃工业纪实(摘编)	(46)
甘肃之工业(摘编)	(47)

甘肃省建设厅制造厂职员值日规则	(47)	甘肃省立兰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概况	(112)
签呈	(48)	风雨飘摇中的甘肃机器厂	(116)
机械工厂工作报告	(49)	兰州工业幼苗	(120)
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资源委员会、 甘肃省、甘肃机器厂筹备处主任阎树松 交接约定书	(52)	1947年登记工厂工具计、作业计、生产能力 累计	(122)
甘肃省工矿业理事会第一次理事会议记录	(52)	参观甘肃工业	(125)
甘肃工矿业理事会成立	(54)	兰州市工业普查经过(摘编)	(127)
兰州机厂改组	(58)	甘肃省工业会纪念特刊	(128)
兰州机厂制造部工作概况	(59)	甘肃统计年鉴(1944年—1948年) ...	(129)
甘肃工业资源、兰州市工厂调查	(61)	工矿商业	(133)
八十年间本省工业报导之一	(72)	甘肃省建设厅机关情况调查	(134)
甘肃省机器业工厂概况表	(76)	促进生产座谈会第三日	(135)
本局制造厂工作概况及今后展望 ...	(86)	讨论机械电气问题	(136)
兰州市机制工业概况	(101)	导河县志·金石门	(137)
甘肃省经济概况	(104)	联勤总部第八补给区四〇二厂概况	(138)
天水工业鸟瞰	(106)	张心一同志写给《甘肃省机械工业志》编辑室的信 (1987年5月14日)	(150)
甘肃省工矿业最近复工的经过 ...	(108)	王振清改良脚踏纺车说明书	(151)
兰州的纺织业与机器业	(109)	刘卫石的创造与发明	(152)
武威工业鸟瞰	(111)	兰州市古今地名对照表	(154)
益民路机器生产合作社	(112)	(作者系《甘肃省志·机械工业志》主编、主任编辑)	

(上接第37页)叙述置于两千多年来整个河西地区开发的大背景下,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千年古村的沧桑变化,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西部农村的发展脉络,这是已经出版的一些村志所少见的。全志除卷首设概述、大事纪略外,设19章74节,计34万字。章目依次是:行政建置、地理环境、民族·人口·宗教信仰、村民生活、农村体制变革、政党·政权·群团组织、农业、林业、畜牧业、水利、手工副业、文化教育、文物古迹、医药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乡风民俗、人物、文献辑存。跋与后记收尾。全志以翔实的资料记述了汉代至2005年八卦营村及其周围地域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变化,综合呈现出该村不同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和轨迹,是一部微观的志书,全志在

一些具体章节下设立了具有乡村乡土特色的细微条目,如:民国及其以前的村民生活,民族·姓氏渊源,农民扫盲,八卦营古城遗址,方言·俗语·农谚·歇后语,本地中草药,婚丧喜庆,口头文学及趣闻轶事,编修村志会议记录等。特别反映出该地区农村的民俗民情,尤以衣食住宿,婚丧嫁娶,寿辰礼俗等甚为细致,同时也记述了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农村在不同时期的体制变更和曲折道路,以及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产出的变化。但是,志书在总体的章节设计方面,题目显得较为宏大,有些已超出村志范围,如写县志一般,与村情村志不符。但总体看,也不失为是一部记述村情、反映民情、承前启后的乡土教科书。

《张掖地区志(远古——1995)》篇目

- 志载盛事——序一
- 信史永存——序二
- 志留千古——序三
- 凡例

第一编 综合

- 第一章 概述
- 第二章 大事记
 - 一、远古至清朝
 - 二、中华民国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
- 第三章 历史建置沿革
 - 第一节 建置沿革
 - 第二节 历朝区划
 - 第三节 当代区划
 - 第四节 区乡(公社)名称演变
 - 第五节 行政界线
- 第四章 县(市)概况
 - 第一节 张掖市
 - 第二节 山丹县
 - 第三节 民乐县
 - 第四节 临泽县
 - 第五节 高台县
 - 第六节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 第五章 城乡建设
 - 第一节 县城建设
 - 第二节 乡镇建设
 - 第三节 小康村建设
 - 第四节 机构与管理
- 第六章 环境保护
 - 第一节 管理机构

- 第二节 环保管理
- 第三节 环境监测
- 第四节 环境污染与防治
- 第七章 历年荣誉单位名录
 - 第一节 获国家部级以上表彰单位名录
 - 第二节 获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表彰单位名录

第二编 地理

- 第一章 地貌
 - 第一节 祁连山山地
 - 第二节 中部平原
 - 第三节 北部山地
- 第二章 地质
 - 第一节 地层
 - 第二节 岩浆岩
 - 第三节 构造
 - 第四节 地质发展史
 - 第五节 第四纪古地理环境
- 第三章 气候
 - 第一节 光照
 - 第二节 气温
 - 第三节 降水
 - 第四节 相对湿度
 - 第五节 蒸发
 - 第六节 地温和冻土
 - 第七节 气压
 - 第八节 风和风能
- 第四章 水文
 - 第一节 河流
 - 第二节 地下水
 - 第三节 冰川

- 第五章 土壤
- 第一节 土壤类型
- 第二节 利用分区
- 第三节 土壤评价
- 第六章 植被
- 第一节 走廊平原植被
- 第二节 北部合黎、龙首山区植被
- 第三节 南部祁连山区植被
- 第四节 走廊平原和北部山区植被
- 第七章 自然资源
- 第一节 土地资源
- 第二节 水利资源
- 第三节 生物资源
- 第四节 矿产资源
- 第五节 景观资源
- 第八章 自然灾害
- 第一节 干旱
- 第二节 洪涝
- 第三节 冰雹
- 第四节 霜冻
- 第五节 风暴
- 第六节 干热风
- 第七节 病虫害
- 第八节 地震
- 第三编 经济(一)
- 第一章 生产关系变革与经济体制改革
- 第一节 农牧区土地、草原所有制变革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
- 第三节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 第四节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 第二章 综合经济计划
- 第一节 计划管理体制
- 第二节 综合计划
- 第三节 专业计划
- 第三章 综合统计管理
- 第一节 统计机构
- 第二节 统计报表制度
- 第三节 统计整理与分析
- 第四节 统计管理
- 第四章 审计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审计
- 第二节 共和国成立以来审计
- 第五章 财政
- 第一节 财政机构与体制
- 第二节 财政收入
- 第三节 财政支出
- 第四节 财务管理
- 第六章 税务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税制
- 第三节 农业税
- 第四节 工商税务
- 第五节 地方各税
- 第六节 税务管理
- 第七节 促产增收
- 第八节 利润监交
- 第七章 金融
- 第一节 机构沿革与管理
- 第二节 货币
- 第三节 存款
- 第四节 贷款
- 第五节 信用合作
- 第六节 社会信用
- 第七节 保险
- 第八节 金融管理
- 第八章 工商行政管理
- 第一节 机构沿革
- 第二节 历代集市与管理
- 第三节 共和国成立后市场发展与管理
- 第四节 工商企业登记管理
- 第五节 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与管理
- 第六节 合同·商标·广告管理
- 第七节 经济检查与打假
- 第九章 物价
- 第一节 物价演变
- 第二节 农产品价格

- 第三节 工业品价格
- 第四节 收费
- 第五节 物价管理
- 第六节 管理机构
- 第七节 农产品成本调查

第十章 技术监督

- 第一节 体制·机构
- 第二节 标准化
- 第三节 质量
- 第四节 计量
- 第五节 行政执法
- 第六节 宣传教育

第四编 经济(二)

第一章 农业建设

- 第一节 农业区划
- 第二节 “两西”农业建设
- 第三节 农村小康建设
- 第四节 扶贫开发
- 第五节 农村能源建设

第二章 农业

- 第一节 农业发展
- 第二节 耕作制度与种植结构
- 第三节 农作物生产
- 第四节 良种生产与推广
- 第五节 主要农作物栽培技术
- 第六节 土壤肥料
- 第七节 植物保护
- 第八节 经营管理
- 第九节 组织机构

第三章 畜牧业

- 第一节 畜牧业发展
- 第二节 畜禽种类及繁育改良
- 第三节 畜禽生产及饲养管理
- 第四节 畜禽疫病与防治
- 第五节 饲草饲料
- 第六节 渔业
- 第七节 机构与科技

第四章 林业

- 第一节 森林资源
- 第二节 天然森林经营保护
- 第三节 造林绿化
- 第四节 林副特产
- 第五节 林政管理
- 第六节 林业科技教育
- 第七节 林业机构与人员

第五章 农垦

- 第一节 历代屯垦
- 第二节 当代农垦
- 第三节 国营农牧场
- 第四节 张掖农垦公司

第六章 农业机械

- 第一节 农机具演变
- 第二节 农机具经营体制
- 第三节 农机作业
- 第四节 农机供销与维修
- 第五节 农机管理与科技推广

第七章 水利

- 第一节 水利事业发展
- 第二节 引水工程
- 第三节 蓄水工程
- 第四节 其他水利建设
- 第五节 水利管理
- 第六节 机械施工
- 第七节 抗旱与防汛
- 第八节 组织机构

第八章 土地管理

- 第一节 土地所有制
- 第二节 土地管理
- 第三节 土地资源开发利用
- 第四节 土地执法监察
- 第五节 管理机构与人员

第九章 工业

- 第一节 体制·结构
- 第二节 采掘工业
- 第三节 冶金工业
- 第四节 电力工业

- 第五节 机械工业
- 第六节 建材工业
- 第七节 化学工业
- 第八节 铁木器具加工
- 第九节 食品工业
- 第十节 纺织工业
- 第十一节 服装·鞋帽·皮革业
- 第十二节 造纸·印刷·纸制品业
- 第十三节 工艺美术品造业
- 第十四节 中央、省属驻张工矿企业
- 第十五节 企业管理

第十章 建筑·房产

- 第一节 建筑业发展
- 第二节 建筑工程
- 第三节 设计施工
- 第四节 建筑业管理
- 第五节 房地产业

第十一章 乡镇企业

- 第一节 发展概况
- 第二节 所有制形式
- 第三节 行业与产品
- 第四节 重点乡村与企业
- 第五节 企业管理

第五编 经济(三)

第一章 商业

- 第一节 [民国]前的张掖商业
- 第二节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商业管理机构
- 第三节 私营商业改造
- 第四节 百货商品经营
- 第五节 五金·交电·化工商品经营
- 第六节 烟草专卖经营
- 第七节 糖酒副食经营
- 第八节 肉食品经营
- 第九节 蔬菜经营
- 第十节 饮食服务
- 第十一节 商办工业
- 第十二节 商业财务与仓库管理。

第十三节 商业企业改革

第二章 供销合作

- 第一节 管理体制与机构
- 第二节 农副土畜产品经营
- 第三节 农业生产资料经营
- 第四节 日用工业品经营
- 第五节 废旧物资回收
- 第六节 社办工业
- 第七节 财务会计

第三章 对外经济贸易

- 第一节 古代至[民国]时期对外经贸
- 第二节 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外经贸
- 第三节 外贸商品购销与出口
- 第四节 进口贸易
- 第五节 外贸工业
- 第六节 外贸部门扶持农副土特产品生产
- 第七节 经济合作
- 第八节 国际经济援助与外贸友好往来
- 第九节 体制与机构

第四章 粮油管理

- 第一节 粮油机构
- 第二节 粮油征购
- 第三节 粮油销售
- 第四节 粮油调运
- 第五节 粮油仓储
- 第六节 粮油加工
- 第七节 各项管理

第五章 物资经营

- 第一节 机构沿革
- 第二节 管理体制
- 第三节 经营发展
- 第四节 金属材料经营
- 第五节 建材化轻物资经营
- 第六节 木材经营
- 第七节 机电设备经营
- 第八节 物资再生利用
- 第九节 物资储运
- 第十节 石油经营

第六章 交通运输

- 第一节 管理机构
- 第二节 道路运输
- 第三节 驿运
- 第四节 公路
- 第五节 桥梁
- 第六节 公路养护
- 第七节 路政管理
- 第八节 公路运输
- 第九节 公路运输管理
- 第十节 交通监理
- 第十一节 铁路
- 第十二节 航空

第七章 邮政电信

- 第一节 通信溯源
- 第二节 管理
- 第三节 邮政
- 第四节 电信

第六编 政治

第一章 政党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
- 第二节 中国国民党地方组织

第二章 民主党派

- 第一节 组织沿革
- 第二节 主要活动

第三章 政协

- 第一节 政协张掖地区工作委员会
- 第二节 县(市)政协
- 第三节 全国政协、省政协张掖委员名录

第四章 群众团体

- 第一节 职工组织
- 第二节 农民组织
- 第三节 青少年组织
- 第四节 妇女组织
- 第五节 商民组织
- 第六节 科普组织
- 第七节 文联组织

第五章 政权

- 第一节 历代政权
- 第二节 人民代表大会
- 第三节 张掖地(分、专)区行政(专员)公署
- 第四节 张掖市政权组织
- 第五节 地方政府
- 第六节 人事

第六章 政法

- 第一节 公安
- 第二节 检察
- 第三节 审判
- 第四节 司法行政

第七章 军事

- 第一节 军事机构、驻军
- 第二节 兵役
- 第三节 地方武装
- 第四节 军事设施
- 第五节 战事纪略
- 第六节 红军西路军战斗在张掖
- 第七节 人民解放军解放张掖

第八章 政事纪略

- 第一节 剿匪·镇反·审干
- 第二节 “三反”“五反”
- 第三节 整风·反右派
- 第四节 大跃进·反右倾
- 第五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第六节 文化大革命
- 第七节 拨乱反正
- 第八节 清理“三种人”·整党

第七编 文化

第一章 教育

- 第一节 学校教育
- 第二节 幼儿教育
- 第三节 小学教育
- 第四节 中学教育
- 第五节 中等专业教育
- 第六节 高等教育
- 第七节 成人教育

第八节 民族教育

第九节 特殊教育

第十节 教师

第十一节 勤工俭学

第十二节 教育经费

第十三节 体制与机构

第二章 科学技术

第一节 科技机构

第二节 科技队伍

第三节 科技成果与应用

第四节 科技普及与服务

第五节 科技管理

第三章 文化

第一节 文化行政管理机构与文化事业单位

第二节 文化市场管理

第三节 文学

第四节 民间文艺

第五节 戏剧

第六节 美术

第七节 群众文化

第八节 电影

第九节 图书

第四章 文物古迹

第一节 古文化遗址

第二节 名胜古迹

第三节 革命遗址及纪念建筑物

第四节 馆藏文物

第五节 路易·艾黎捐赠文物

第六节 文物管护与调查

第七节 考古发掘与研究

第八节 文物管理机构

第五章 艺文

第一节 历代旧体诗词

第二节 当代新体诗·赋

第三节 楹联

第四节 散文

第五节 小说

第六节 民间故事

第六章 卫生医药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医疗

第三节 卫生·防疫

第四节 医药

第七章 体育

第一节 机构·人员·经费·设施

第二节 学校体育

第三节 群众体育

第四节 体育训练

第五节 体育竞赛

第六节 先进单位和个人

第八章 新闻出版

第一节 新闻

第二节 出版

第九章 广播电视

第一节 体制与机构

第二节 广播

第三节 电视

第四节 采编与通联

第十章 档案

第一节 档案事业管理

第二节 档案馆

第三节 机关档案工作

第四节 学术研究

第十一章 地方史志

第一节 中共党史资料征编

第二节 旧方志保存与整理

第三节 新方志编纂与出版

第四节 地情资料

第五节 方志序言选录

第八编 社会

第一章 民族

第一节 古代民族

第二节 当代民族

第三节 民族工作

第二章 人口

第一节 人口源流

- 第二节 人口变迁
- 第三节 当代人口变动
- 第四节 人口分布
- 第五节 人口构成
- 第六节 人口素质
- 第七节 计划生育
- 第三章 宗教
 - 第一节 佛教
 - 第二节 道教
 - 第三节 伊斯兰教
 - 第四节 天主教
 - 第五节 基督教
 - 第六节 宗教工作
- 第四章 社会保障
 - 第一节 管理体制
 - 第二节 劳动就业
 - 第三节 职工队伍
 - 第四节 劳动工资
 - 第五节 劳动安全
 - 第六节 劳保福利
 - 第七节 劳动保险
 - 第八节 社会福利
 - 第九节 社会救济
 - 第十节 优抚安置
- 第五章 人民生活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人民生活
 - 第二节 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生活
- 第六章 婚姻·家庭
 - 第一节 婚姻状况
 - 第二节 家庭构成
 - 第三节 家庭成员关系
 - 第四节 家庭教育
- 第七章 道德风尚
 - 第一节 高尚品德
 - 第二节 舍己救人
 - 第三节 拾金不昧
 - 第四节 尊老爱幼
 - 第五节 热爱集体
- 第八章 社会风俗

- 第一节 生活习俗
- 第二节 礼仪习俗
- 第三节 时节习俗
- 第四节 生产习俗
- 第五节 社会习俗
- 第六节 庙会
- 第七节 民间禁忌
- 第八节 少数民族风俗
- 第九节 异闻奇事
- 第九章 社会陋习
 - 第一节 缠足
 - 第二节 赌博
 - 第三节 吸毒
 - 第四节 纳妾
 - 第五节 嫖娼
 - 第六节 迷信
 - 第七节 帮会道门
- 第十章 方言
 - 第一节 语音
 - 第二节 词汇
 - 第三节 语法
 - 第四节 谚语
 - 第五节 歇后语
 - 第六节 俗语
 - 第七节 逆序词
 - 第八节 四字格词语
 - 第九节 谜语
 - 第十节 绕口令
 - 第十一节 民歌
- 第十一章 裕固族语言
 - 第一节 西部裕固语
 - 第二节 东部裕固语

第九编 人物

- 第一章 人物传
 - 第一节 古代人物
 - 第二节 近代人物
 - 第三节 当代人物

第二章 人物录

- 第一节 红西路军牺牲于张掖团级以上干部
- 第二节 红西路军参加地方工作与张掖籍中共党员
- 第三节 掩护红西路军人士
- 第四节 中共张掖地委、行署(专署、革委会)历任主要领导人
- 第五节 知名人士

第三章 人物表

- 第一节 红西路军部分将士在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主要职务名录
- 第二节 流落红军
- 第三节 抗美援朝烈士
- 第四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烈士
- 第五节 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烈士
- 第六节 先进人物
- 第七节 张掖籍副地(厅、师)级以上公职人员
- 第八节 副高以上知识分子

第十编 文录

第一章 古籍选录

- 一、〔西周〕《穆天子传》张掖记
- 二、〔东晋·十六国〕《法显传》张掖录
- 三、甘州回鹘史录
- 四、回鹘传
- 五、甘州回鹘上后梁太祖表本
- 六、〔五代十国〕《使于阗记》甘州录
- 七、《西夏纪》甘州录
- 八、甘肃等处行中书省
- 九、〔元〕《马可·波罗行纪》张掖录一
- 十、〔明〕陕西行都司部汇考
- 十一、〔清〕梁份《秦边纪略》卷三·甘州卫
- 十二、〔清〕洪亮吉《伊犁日记》张掖录
- 十三、〔清〕祁韵士《万里行程记》张掖录
- 十四、〔清〕方士淦《东归日记》张掖录
- 十五、〔清〕林则徐《荷戈纪程》张掖录
- 十六、〔清〕倭仁《莎车行纪》张掖录

- 十七、〔清〕冯俊光《西行日记》张掖录
- 十八、〔清〕陶葆廉《辛卯侍行记》张掖录
- 十九、〔清〕方希孟《西征续录》张掖录
- 二十、〔清〕李德贻《北草地旅行记》张掖录
- 二十一、〔清〕袁大化《抚新记程》张掖录
- 二十二、〔民国〕林竞《西北丛编·日记》张掖录
- 二十三、〔民国〕陈万里《西行日记》张掖录
- 二十四、〔民国〕林鹏侠《西北行》张掖录
- 二十五、〔民国〕明驼《河西见闻录》张掖录
- 二十六、〔民国〕高良佐《西北随轶记》张掖录
- 二十七、〔民国〕李孤帆《西行杂记》张掖录
- 二十八、〔民国〕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张掖录

第二章 金石镌华

- 第一节 碑碣文选
- 第二节 碑碣名录

第三章 历史文献

- 第一节 〔清〕以前文献
- 第二节 〔民国〕时期文献

第四章 红西路军史料节选

- 第一节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毛泽东等领导人
对红西路军的电文
- 第二节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及援西军组织
体系
- 第三节 红西路军战斗历程
- 第四节 红西路军回忆录

第五章 当代文选

- 一、领导人文书
- 二、解放文告
- 三、区划文件
- 四、经济文献
- 五、资源文录
- 六、人文史料

精心组织 众手编志——后记

- 《张掖地区志》基础撰稿人名录
- 《张掖地区志》初审人员名录
- 《张掖地区志》校阅人员名录
- 《张掖地区志》摄影者名录
- 《张掖地区志》录制印装人员名录
- 惠顾《张掖地区志》人士名录

编千年历史 辑百科地情

《张掖地区志》简介

张志纯 何成才

《张掖地区志》由原中共张掖地委、张掖地区行署主管，张掖地区志编纂委员会主持，张掖地区志编纂办公室主办。

《张掖地区志》于1994年8月始编，1999年5月编竣；2004年5月由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终审批准，201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审核出版；2011年由兰州大众彩印厂印刷。

该志前置3序、凡例，后殿1记；正文设10编、81章、454节，计436余万字。断限上溯远古，下至1995年。

编纂工作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稳准实、力创新”的指导思想，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扬奉献精神，超常规运作，精益求精，善始善终。

篇目到位 按照现行社会行业分工与事物门类性质相结合的办法，谋篇布局。采用大编体，编下分设章、节、目，个别酌立子目，体现了“依类相从”的原则。第一编为“综合”，破众志惯例，将“概述”“大事记”纳入此编，排列编首；接着依次为第二编“自然地理”；第三编“经济（一）”（综合经济）；第四编“经济（二）”（产业经济）；第五编“经济（三）”（流通经济）；第六编“政治”；第七编“文化”；第八编“社会”；第九编“人物”；第十编“文录”，亦即附录。从大编结构的整体性和逻辑性看，这种体式突出地反映了张掖地方特色，集中地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文化古今状况，同时便于操作运行。编属诸章，基本上是为各为一个主管部门

或专业系统；章下各节，大体上是所领门类。整个篇目层次分明，条理清楚，系统性强，以其朴素简练的文字全面记述了全区所辖一市五县的纵横地情。

资料到手 该志奉行“志书的质量在于资料”“资料的生命在于真实”，视资料为“食粮”。修志伊始，编委会拟文《张掖地区志资料采集办法》，对资料的搜集、筛选、鉴别、运用作出明确规定和严格要求。汉至清代资料依托〔清〕顺治《重刊甘镇志》、乾隆《甘州府志》，道光与光绪《山丹县志》等；民国资料依据高台、东乐、民乐、临泽、张掖县志及各县民国档案。为使张掖历史可靠可信，不致讹传误承，还参照清乾隆《甘肃通志》、宣统《甘肃全省新通志》和《二十五史》，印证了张掖的一些重大历史事实。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百科内容则充分利用首轮各县（市）综合志、专业志、部门志和地情资料；吸纳地（市）、县（市、区）各级各类档案馆、室藏各种档案资料；采录历年地方新闻报刊、图书；访谈社会知情人士，索取口碑资料；调查山川河流、文物古迹、资源物产、风土民俗，获取第一手资料。还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修的《甘肃省志》各分志作对校，采用了有关张掖的记载。资料的采集重在方法，即：先是收时一把抓——凡属《志》需范围，用什么找什么，见什么捞什么，不嫌其多，只求其全。有多才有“全”，全中才能选出“精”。全志资料总约5300多万字，最后成果字数为430余万字，

比例 14:1。后是集中再分家——纷繁复杂的资料集中后,按志书篇目所列的编、章、节、目 4 个层次相应地分为大、中、小、属 4 个类别,把所有资料“对号入座”地分归于宿。资料贵在鉴别,到手的资料真假难辨,价值相混,用前须经严细审核、科学鉴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资料运用履行了如下程序:1.以每节为单元拟出撰稿提纲,将事先粗分的资料再细分到节属各目,使其各得其所;2.编者按志体要求和行文规则,将资料编写为节,纂辑为目,成为资料长编;3.由资料员对“长编”中的各条资料,根据原始资料进行逐一核对,错者改正,误者修正,讹者纠正,乱者理正;4.全方位审核:志书编就、提交初审前,对口送请有关部门和相关专家审查,个别订正、广泛征询,取得社会认可,最终达到无错或极少错。

内容到家 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是古丝绸之路东段南、北、中三路的交汇重镇,是典型的塞上江南,也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地理、优秀的民族、丰博的人文、富裕的物产以及现代经济腾飞、社会进步的凯歌,构成博大精深的著述载体。《张掖地区志》诸编各涵千秋,包罗万象。“大事记”像一条滔滔不绝的长河,把张掖五千多年的历史从古贯至今,可谓“朝有所稽,代有所考”。在“建置沿革”里,可看到禹导弱水,穆王西巡,张掖变迁,甘州沧桑,北凉兴灭,吐蕃统治,回鹘鼎盛,西夏经营,甘肃军司驻山,甘肃行省创立,陕西行都司徒置。“县市概况”中,西汉武帝时就已建县的删丹(山丹)、氐池(民乐)、觶得(张掖)、昭武(临泽)、表是(高台)和当代设立、全国仅有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史地诸情跃然纸上。“自然地理”则把读者带进巍峨的祁连山,连绵的合黎山,高大的龙首山和锦绣的焉支山;带进广袤的中部绿洲平原;带进种类繁多,惠及生灵的生物与矿藏资源;带进古老的地貌、地质、地理区域;带进大陆性温带气候环境,亦带进国内第二大内陆河——黑河;还带进干旱、洪涝、霜冻、冰雹、虫害、地震等灾情祸难。“经济”,含生产关系、经济体制、计划统计、财税金融、工商物价、技术监督;古代军

民屯田、现代农林水牧渔;近代手工作坊、当代工业企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商业供销、贸易物资、粮油管理、交通邮电等经济各领域历叙演进,竞相凸现。“政治”,略述近代甘州行政建制、社会群团体系;详记当代张掖地区党群政权、统战侨联、政法军事、政坛纪略。“文化”,兼收并蓄,含容宽广,有教育、文化与科技;体育、卫生与医药;文物、古迹与艺文;新闻、出版与广电,还有档案、图书与史志。“社会”,历陈境内古今民族人口、宗教信仰、婚姻家庭、民情风俗、社会陋习、道德风尚、方言谚语、人民生活等,全面揭示了张掖的人世环境。“人物”,真实记载了张掖两千多年来本籍和客籍在抗御外侵、民族融和、屯垦戍边,经济开发、文教复兴、建政创业、为民造福中涌现出的各种拔萃人才和出类英豪。“文录”以珍、稀、精为标准,辑“古籍选录”“金石镌华”“历史文献”“红西路军史料”“当代文选”数百件贵重史料,是本志精中之华。

方法到人 该志与国内兄弟众志一样,在继承祖国传统修志体例的基础上,采百家之优,戒数户之劣,探索践就了一套符合张掖实际的修志体式。此式与众志相比,多为共同之处,少为不同之点。独特方面有:甲,奠定切实宜行的“务虚”基础。修志启动前和修志期间,编委会开了三次会(《张掖地区志》编纂工作动员会、《张掖地区志》各编纂单位承包责任书签订会、《张掖地区志》分编主编承包责任书签订会),发了三件文(《张掖地区志编纂方案》《张掖地区志编纂行文办法》《张掖地区志档案资料管理办法》),办了三个班(资料采集学习班、编辑业务培训班、志稿审改研讨班),编了三本书(《地方志体例综录》《编志手册》《实用编写手册》),从而解决了领导重视、各方配合、编务运作等问题。乙,实施循序渐进的编纂步骤。先是承编单位写初稿:各章按专业分解 70 个承编单位,各自组织编写班子,按时、定量、保质地写出初稿;期间由所隶分编主编巡回现场指导,夯实前期工程。后是分编主编编志稿:经承编单位领导审定、分编主编验收的各章志稿,再由其按统一规范、统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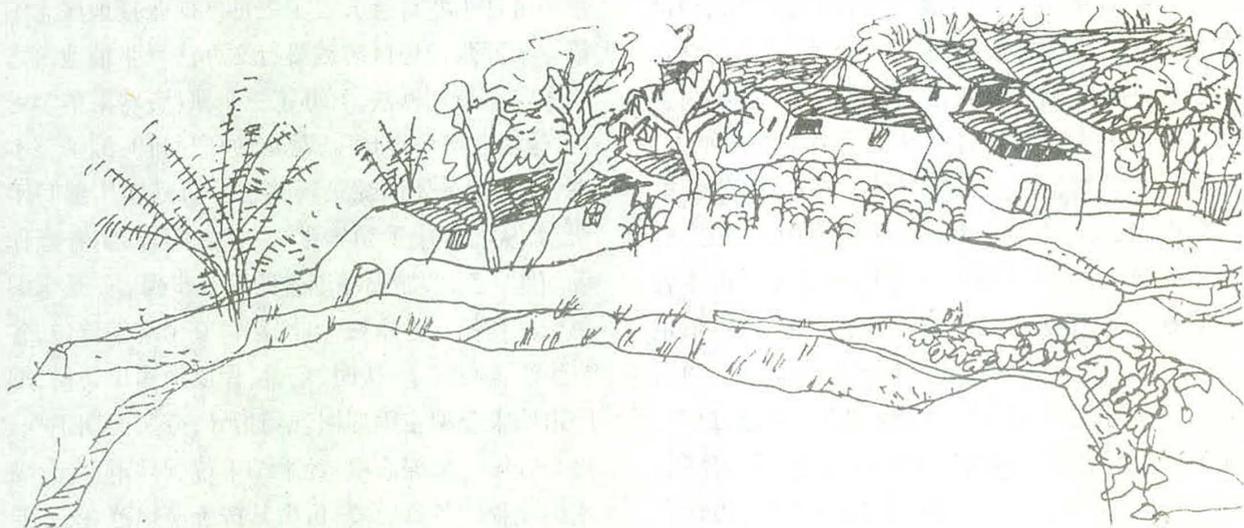
求编写志稿,初具志型。再是总主编一支笔统稿:删繁就简,削糟剔粕,处理交叉,合并重复,精练文字,升华水平。最后提交编委会初审。丙,采用直接了当的工作方法。当初设计篇目时,瞻纵顾横,深斟细酌,一次定型。操作中,除增改个别节、目外,始终未作大的变动,遵循到底。初拟工作程序、时序进度、三审项目、志书规模如何,到终回顾,基本是沿路蹈矩而行。志稿由初稿到定稿从一而终,都在印刷厂排样,中间未另打印任何稿样,既避免了多余环节所造成的反复校对的麻烦与讹误,又节约了人力、时间和经费。

特色到地 即突出地方特色。环视全志,集全区天情、地情、史情、社情、物情、人情、文情于一体,融资料性、科学性、实用性、可鉴性于一体,构成一部综合性的资料全书,也是继 220 多年前《甘州府志》刊行以来的又一部张掖信史。若从普遍中找特殊,这部书的突出特色有五:一是文化氛围比较浓——整部著述除在章里节间以纪事垂世的史学笔触渗透文化现象外,还专设了一编“文化”。张掖新石器时期以来的古遗址、古文物生动地再现了先民的聪慧;历代遗留下来的诗词歌赋与碑碣铭文真实地记录了历史的沧桑;教科、体卫、档案、方志、都从各自的演变客观地反映了专业文化内涵。二是经济含量比较丰厚——全志经济“专设三编、约 60 多万字,占总字数的六分之一。各类经济的历史与现状充分体现了“金张掖”的“金”价值。

祁连山的终年积雪、万年冰川是滋润广袤沃野的天然水库;千里草原、无垠山川是繁衍畜类、蓄积林木的自然宝库;古代垦殖的原始性和现代农业的科学性在“志”里得到充分展现,尤其是闻名遐尔的高产粮油、驰名中外的伏质羊牛、喜闻乐见的土特产品,淋漓尽致地渲于“志”中。三是红西路军的悲壮战歌迭起——在概述、大事记、军事章、人物编、文录等部分,以不同角度记述了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5 月红西路军两万一千余人、与十多万国民党马家军浴血奋战的征程。形成整记与散叙相结合,众星拱月式的特点。资料虽宏微兼纳,分别表述,但显示出“聚珍汇宝”之效,突出了重点。这里数百次与敌战斗,万余名将士壮烈牺牲、数千名红军溃散流落、四五百人回到党的怀抱,以及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为纪念这些烈士所建的陵园、碑塔……一一载入张掖的千古史册。四是珍贵文献收录颇丰——历代文史精品、各级官方文选、权威典籍选摘等,增添了志书的史料种类,提高了方志的存史品位。五是图文并茂,形象性强——综合性图片排列于“志”首,专题性图片集中于“卷”前,图片与内容互相映衬,既形象地反映了张掖的历史和现状,又体现了本区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图片丰富多彩,鲜艳靓丽。

全志分装上、中、下三册,印刷清晰,装帧精美,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作者系《张掖地区志》主编、副主编)



张国臂掖的辉煌

喜读《张掖地区志》有感

郝玉屏

“张掖”之名，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早就闪烁着熠熠辉光。〔汉〕武帝以其一统天下的气魄和伸张国威、沟通西域的雄才大略，于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分酒泉郡，以“张国臂掖，通衢西域”为远谋，置张掖郡。从此，“张掖”，虽有“西凉州”、“甘州”的变更，但“张掖”一名历久弥显。这里，曾是〔十六国〕时期北凉的国都；〔北魏〕拓跋焘徙治此地，改称“西凉州”；〔西魏〕废帝三年（公元 554 年）又改西凉州为“甘州”；〔隋〕大业三年（公元 607 年）继改为张掖郡。〔唐〕末，“甘州回鹘”在这里设牙帐；〔宋〕西夏李元昊置甘肃军司；〔元〕至元十八年（1281 年）设甘肃行中书省；〔明〕洪武五年（1372 年），设甘州卫，二十六年又迁陕西行都司于此；〔清〕雍正二年（1724 年）设甘州府……张掖成为历代中原王朝在河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战略要地。

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灿烂的文化，单就编史修志来说，张掖也代有载籍，北凉阚骞纂《十三州记》、宗钦撰《蒙逊记》、以及《西魏记》，可惜佚世无存。〔隋〕裴矩撰《西域图记》，〔唐〕赵武孟编《河西人物志》，〔明〕包节著《陕西行都司志》、郭绅著《甘州卫志》、曹子登著《甘州纪变》、庄廷伟著《治甘州记》，以及《张掖记》《张掖志》《张掖县乡土志》等，也已失传。惟有〔清〕杨春茂纂《重刊甘镇志》、钟庚

起撰《甘州府志》和几部县志存世。尽管如此，充分说明张掖注重文化遗产的血脉却代代不断。

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延续至今，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张掖地区志》，历经 15 年艰辛耕耘后，终以熔铸千古，承前启后的三卷煌煌巨著，呈现在世人面前。该志系大编体结构，以 10 编为纲，领 81 章，辖 454 节，有 436 万字。内容博大宏富，资料翔实精细，图表精彩鲜亮，文字精炼顺畅，不啻为我省继《天水市志》之后，又一部与张掖历史文化名城相匹配的地区志书。

在欣喜激动中，仔细阅读该志，我以为有如下突出特点：

第一，充分展现了张掖地区的地方特色。一是地理、地貌和自然特色鲜明。在“综合编”专设张掖“历史建置沿革”章，说明张掖建置的悠久历史和政治地位的重要。在“地理编”专设“地貌”和“自然资源”章，不仅记述了张掖南部祁连横亘，山脉连绵；中部平原广袤，地势平坦；北部山岩裸露，童山秃岭的地貌特点，而且分节展现土地、水文、生物、矿产和景观资源，尤把“景观资源”归类成马蹄寺风光旅游区，细化为三十三天、格萨尔王殿、九间石房、天马蹄印、临松瀑布、祁连积雪等 24 个景点；山丹自然风景区，细化为山丹军马场、窟窿峡、焉支山、大佛寺、山丹汉明长城等 6 个景点；丹霞

地貌旅游区,细化为南群、北群丹霞景点。二是民族特色突出。由于张掖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历史上先后有西戎、月氏、乌孙、匈奴、吐蕃、回鹘、党项等 14 个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融合发展,并形成全国惟一在张掖的独有民族——裕固族。鉴于此,在“社会编”专设“民族”章,详记历史上各个民族的起始、演变和消长,并对当代民族藏族、回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的发展,以及裕固族、藏族和蒙古族风俗列专节记述,尤设“裕固族语言”一章,详细记述了西部裕固语和东部裕固语的元音、辅音、词汇、构词法等,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在“文录”里特收 1989 年 5 月 4 日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批准的《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自治条例》,具有极好的存史价值。三是充分展现了红西路军在张掖浴血奋斗的历程。1936 年 11 月 18 日红西路军进入张掖境内,攻占山丹,血战高台,鏖战倪家营,一路与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部和反动民团进行了数十次大小战斗,最后兵败祁连,于 1937 年 3 月 14 日红石窝会议后,左支队西进新疆。在 4 个月的艰苦日子里,红西路军指战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英勇奋斗,悲壮捐躯,留下了感天动地的英雄事迹和丰厚不灭的精神财富。该志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分别在大事记、军事章、人物编,以及文录里都有浓墨重彩地记述和翔实具体的资料选集。还有对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和乔治·艾温·何克,于 1943 年往返考察河西,次年艰辛辗转来山丹,开办培黎工艺学校,为中国培养建设人才而奉献终身的事迹和精神都有具体著录。总之,举凡人无我有,人有我独的特点、特色,虽志书体例有限,但都在不同的编、章、节里给以相当篇幅,翔实著述,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二,充分彰显了时代特色。张掖不仅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而且在共和国成立以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该志创造性地将经济门类分设为“综合经济”“产业经济”和“流通经

济”三编,精心梳理,科学归纳,成为志书中的一大亮点。翻开志书,农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两西”农业建设、农村小康建设、农村能源建设、商业企业改革、国际经济援助与外贸友好往来、科技成果的应用、环境污染与防治等饱含时代元素的内容比比皆是,时代气息扑面而来,读之如沐春风,如吮甘饴,令人欣喜不已。例如在“综合编”中,专列“乡镇建设”和“小康村建设”两节,并重点介绍了 11 个小康村,如说临泽县平川乡芦湾村有村办厂 4 家,380 户中有 330 户修建园林式住宅院,新建三层农科教大楼一栋,农户门前院落全部硬化、美化,屋后家家有果园。参观者赞曰“葡萄串屋顶搭,富民政策照万家,摩托彩电进农家,芦湾盛开富裕花”。同时,把张掖改革开放后,农林水牧发展,经济百业兴旺,物资丰饶以及高产粮油、优质牛羊、土特产品等,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充分体现了“金张掖”的含“金”量。尤在第十编“文录”中,收录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济文献,如《张掖九十年代农村经济发展对策研究》《建立农村经济新机制的有益实践——甘肃省农村改革张临高试验区总体报告》《阔步前进的四十五年》,以及地委、行署《关于在全区实施“十项工程”建设的通知》,可以预见,未来的张掖将更加美好,未来的成就将更加辉煌!

第三,资料梳理层次有序,而且相当深细。以“社会编”第十章“方言”为例,其下共设置了语音、词汇、语法、谚语、歇后语、俗语、逆序词、四字格词语、谜语、绕口令、民歌 10 节,仅就词汇一节下分天文、地理、季候、时令;农业、农事、农具;动物;植物;城乡房舍建筑物什;饮食;衣料服饰;摆设日用器皿;人体称谓;文教活动;疾病;婚丧;其他;亲属称谓;行业;动作情态外来语;逆序词计 18 目,收录词语过千,特色鲜明,精细无比!仅谚语一节,又细分为哲理谚语、学习谚语、人际谚语、生活谚语、健康谚语、农业谚语、季节气象谚语、林业谚语、畜牧谚语、地震谚语 10 目。收集谚语上千条,丰富多彩,民情浓郁!再以人物表为例,仅先进人物一节,就细分为地区暨省属驻张单位、各县 1949—1995 年受中央、国家部委以上领导机关;省委、省政府

表彰先进人物表,收张掖地区 1959—1983 年全国妇女先进人物名录、张掖地区 1979—1995 年省委表彰妇女先进人物名录以及省第一至四次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表彰人员。眉目清晰,一览无余。尤第十编“文录”,编者以珍、稀、精为标准,分 5 章辑录“古籍选录”28 篇;“金石镌华”碑碣文选 47 篇;“历史文献”又分〔清〕以前 22 篇,〔民国〕时期 4 篇;“红西路军史料”分为 4 节,收录中央、军委及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于西路军的电文、西路军和援西军组织体系、红西路军战斗历程以及回忆录多篇;“当代文选”细分为 6 目,收录了领导人文书、解放文告、区划文件、经济文献、资源文录以及人文史料。大大提升了该志的存史价值和学术品位。类似的内容还可以列举很多,恕不一一细述。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王蒙曾说:“文化、文史都是一个积累和记忆的过程,没有记忆就没有文化。”而一地的方志正是文化的一种载体,它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汇纳百科,老少咸宜,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政者可以从方志中体察地情人情,体味治理方略;研究者可以从方志中追寻资料,探讨现实课题;广大群众可以了解家乡的历史人文,激发建设家乡的热情;青少年可以浏览历代诗词、民间传说故事,陶冶性情。总之,在全国掀起建设文化强国的时期,地方志的文化价值将会得到进一步地提升。

我在阅读《张掖地区志》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一部地区志就是一地丰厚的文化资源宝库,这里贮存着生态文化、古迹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化、丝路文化、名镇文化、农垦文化、红色文化等等,它与矿产资源相比,不但挖不尽,而且愈挖愈厚,享用不尽。随着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增强,被束之高阁的地方志书,一定会华丽转身,变土为宝,点石成金,彰显出文化光芒,焕发出无限生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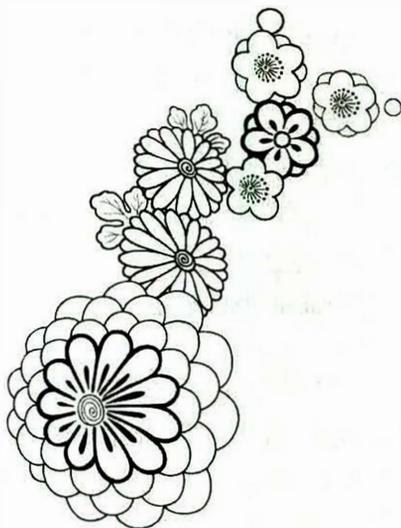
我在读到该志社会编里“道德风尚”一章时,深深地为那些百姓们的舍己救人、扶困济危、拾金不昧、尊老爱幼、热爱集体的一桩桩一件件事迹所感动,他(她)们以其纯厚、善良的义举,诠释了人生价值,他们以其朴素的精神品质为我们树立了道德的标杆,他们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充满爱心,积

极向善,蕴含正气的道德力量。这不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所需要的滋养吗?

我在读到为营救、掩护红西路军失散人员的事迹和小传时,读到流落红军在各县的列表时,读到在戏剧、民间工艺美术、医疗、体育等各个战线上,为做出贡献的小人物或立小传,或列表录,或随文记人时,深深感到志书忠实地记录了每个时代,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各行各业的先锋和模范。小故事,小人物,往往体现了大精神,不仅为社会树立了榜样,更重要的是,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真谛。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记录他们,从而使已经过去的历史更加丰满,更加鲜活,志书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存史、资政、教化作用。

所有这些,启示我们修志工作者要不断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入挖掘、发现伟大时代里,产生在我们身边的最美、最受感动的人和事,记录他们的高尚品德和高尚行为,使之发扬光大。“国民之魂,文化予之,国民之魂,文化铸之。”愿地方志书在建设文化强国中发挥其更大作用。

(作者系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原副主任,正厅级巡视员)



《张掖地区志·文录》编纂特色浅析

何 忠

以“古籍选录”“金石镌华”“历史文献”“红西路军史料”“当代文选”为主体组成的《张掖地区志》第十编《文录》(以下简称《文录》),作为全志殿后之编,既是地区志整体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前九编所言史实可信度的重要佐证。《文录》“荟萃四方举要,纂辑古今文献”,传承“金张掖”的历史文脉,百卉含英,特色鲜明,值得称赞。

广阅博览 穷尽珍贵史料

地处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历史悠久,各族兴旺,文化璀璨,民风朴实。古往今来记述张掖人文地理和社会发展的典籍文献多如繁星,《文录》编从“弱水流沙”中披沙拣金,广阅博览,以五章八节选录了内容涉及张掖的古今文献,纂辑了多篇珍贵史料。

在“古籍选录”章,辑文 28 篇,选录了古、近代各种典籍中涉及有关张掖的记载,并以“张掖录”统之。其中主要有〔西周〕《穆天子传》、〔东晋·十六国〕《法显传》、甘州回鹘史录、〔五代十国〕《使于阗记》、〔宋〕《西夏记》、〔明〕《陕西行都司部汇考》、〔清〕《秦边纪略》,以及〔元〕马可·波罗、〔清〕洪亮吉、祁韵士、方士淦、林则徐、倭仁、冯焄光、陶葆廉、方希孟、李德哈、袁大化、〔民国〕林竞、陈万里、林鹏侠、明驼、高良佐、李孤帆、范长江等人的行记、日记、见闻。这些历史人物亲历、亲闻、亲记的一手文字,是见证是时张掖现状的真实记录,史料珍贵,价值重要。

“金石镌华”章,从〔唐〕〔明〕〔清〕〔民国〕至新中国期间张掖地区的祠、寺、庙、儒学、书院、城郭及记述自然灾害、水利工程、革命英烈等碑文碣石中,选录了有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碑刻 40 通;另对〔明〕时甘肃镇和清代甘州府以及地区所属张掖市、山丹县、民乐县、临泽县、高台县、

肃南县尚完好或破损、毁失的 92 通碑碣,依据旧方志记载,列“名录”,以存史。

“历史文献”章,用两节篇幅,分别辑录了〔清〕以前的书、诏、令、表、疏、敕 22 篇,〔民国〕时期蒙藏委员会调查室《祁连山北麓调查报告》、慕少堂《甘州水利溯源》、水利部甘肃水利工程总队《大通河水利工程计划书》3 篇文献。水利是工农业生产和城市居民的命脉,依赖祁连山水源的张掖地区亦如此。本章选录的〔民国〕时期关于河西的两篇水利资料,加上“当代文选”章中的张掖专署《关于下达灌溉用水示范规章的通知》(1960 年 5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田雨《古代河西走廊的农田水利》、兰州大学冯绳武《河西黑河(弱水)水系的变迁》、中国林业科学院林研所陈炳浩《甘肃祁连山森林的重要性与生态环境问题》等论文,对今天和未来河西的经济开发和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仍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红西路军史料”章,是《文录》的重要部分。1936 年底至 1937 年初,转战张掖地区的山丹、民乐、高台、临泽、肃南等县的红西路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最终兵败祁连。为铭记红西路军将士的悲壮历程,本章选录了 12 篇党中央、中央军委及毛泽东等领导人对红西路军的电文,西路军及援西军的组织序列,列表简记了红西路军的战斗历程,并收录了原红西路军将领李先念、徐向前及饶子健、张力雄、秦基伟在山丹、高台、临泽与敌血战的革命回忆录,以及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营救收容红西路军失散人员的日记摘抄。

“当代文献”章,则以张掖解放后领导人文书、解放文告、区划文件、经济文献、资源文录、人文史料为题,选录了新中国成立后张掖政治、经济建设的历史与现状的重要资料,其中有些档案文件是

首次公开发表的。

校勘按注 指点录文得失

《文录》所选录的历史文献典籍中,多涉及古今张掖的山川、人物、事物,由于历史的发展变迁,语言文字的进化,以及原始史料在传抄或刊印过程出现的错讹衍漏,对录文进行必要的校勘注释,既是遴选过程中的必须步骤,也是求实精神和研究成果的具体体现。可喜的是《文录》的遴选者张志纯先生是张掖知名的方志专家,在多年从事地方史志编研工作中,曾校点整理过〔清〕《重刊甘镇志》、〔清〕《甘州府志》及临泽、高台县志等多部旧志,具有娴熟扎实的校释功底。在《文录》的校刊注释中,或采用原文的注解,或添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得以在赏读时分享曲径通幽、辨古明今之便。

《文录》编中采用“编者按”的形式,在介绍某些文献大要的同时,也用简洁文字点评其精华所在。如在《陕西行都司部汇考》的“编者按”中指出:“由于清朝皇帝为满族,对歧视少数民族的语言极为敏感,故本汇考在编汇中‘凡违皆改,无碍不易’。如将明朝镇番卫改为镇边卫,镇夷所改为镇彝所,扶夷驿改为扶彝驿,古浪的古和戎城改为和茸城,肃州古威虜城改为威鲁城……等等。”

〔清〕人梁份(1641—1728年)所撰的《秦边纪略》(原名《西陲今略》),是其只身游历今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宁夏、甘肃大部、青海东北部及新疆南部时,实地考察,广询博访,考订沿革,议论得失而成的著作,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但因其原版本有六七种之多,内容互有异同,差错颇多,俱无一完整。《文录》选用了由青海师范大学赵盛世、王子贞、陈希夷1986年整理校注本卷三《甘州卫》全文时,连同352条校勘、28条注释一并录入,既是对校注者学术研究成果的尊重认同,又扩大了《文录》的信息量和实用性,对保存张掖史料极为有益。

古今并存 重录当代要文

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张掖地委和地区行署带领全区各族人民群众,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2002年张掖“撤地设市”,又为适应新的

历史发展机遇揭开了新的一页。《文录》精选了张掖地区在53年的历程中,具有存史、资治价值的当代重要文件,其中包括一些首次公开与读者见面的档案文书。

1949年9月民乐县解放时,原国民党民乐县长张汝伟曾率部投诚,保护全部国家财产、文件档案未受损失,对我军采取积极支援态度,解放军一野二军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和兵团司令员王震分别给其写出证明信和手谕,给予勉励,并责成对他的家眷依法予以保护。张汝伟深受感动,在王震司令员亲切召见之后,即成立支前委员会,亲自担任主任,动员全县人民献粮捐物支援解放军进军新疆。除满足过往民乐的部队补给外,还组织大车130多辆,向集结张掖的部队运送粮料肉食等物资。这段体现党的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的珍史逸闻,虽曾在新编《民乐县志》(1996年版)中有所披露,这次又收入《文录》,实为慧眼识珠。

毋需讳言,在前进的道路上,张掖也曾走过曲折的弯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文录》所收录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张掖地委《关于做好农村人民公社1958年分配工作的指示》《给张仲良和省委的信》《关于检查纠正“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作风的情况报告》及省委的批示等党内文件,坦陈了党在指导思想路线上曾出现的失误及为纠正这些失误所作的努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河西大地,张掖的经济发展和进步又迈上新的台阶。《张掖九十年代农村经济发展对策研究》《建立农村经济新机制的有益实践》《阔步前进的四十五年》等选文,就是张掖地区在新的历史时期前进步伐的明证。

世居张掖地区的裕固族,是我省独有的三个少数民族之一。“当代文选”中向省政府报请成立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筹委会的报告等文件,以及《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自治条例》《裕固族风情》,体现了党的民族团结、区域自治的既定方针政策,极具张掖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

(作者系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秘书处原处长)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历时七年、六易其稿的《甘州府志》刊行,署名总纂的知府钟赓起也因“计典卓异”而被乾隆皇帝召见,受到“准加一级”的奖励。

又二百三十二年,2010年10月,历时十六年编纂的《张掖地区志》,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共四百三十余万字,分上、中、下三巨卷,是卷帙浩繁了。以原始档案和相关历史资料、社会调查以及有关单位、个人提供的材料为基础,以当代地方史志、考古研究和最新成果为依据的《张掖地区志》,全面记录了自远古至1995年间张掖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民族社会诸方面内容,突出1949年以来张掖的历史沿革、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民族宗教、杰出人物、社会保障、人民生活、家庭婚姻、人口变迁、社会道德等内容。于文字叙述之外,多收地理图幅和碑碣、典籍和各类事物彩照,成为乾隆版《甘州府志》刊行后的又一部地方名志。上可仰对古人,下足无愧后人,一代新志,成为“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最好印证。这部资料性的张掖地情实录和地方性的张掖百科全书,是经世致用的辅治之作,也是惠及子孙的传世之本。煌煌巨著,卓越成就,已为各界读者所共见。

十六年的资料搜集工作,为这部志书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张掖地区志》经过分门别类,多次征集,汇集了大量历史和现实的全面、系统资料,经多方核实后,精选入志。其中有不少是鲜为人知的独家资料,比如张掖百姓在辛亥革命中所做的贡献,就很有意义。大事记记录了宣统三年,也就是1911年4月10日,张掖农民聚众三千余人,和讹诈铲烟的知府李廷颺、豪绅王振鹏展开了斗争。他们破东门入城,捣毁城内的盐店、统捐局,拉倒王振鹏的私宅,对抗甘州提督马进祥的弹压。总督长庚得到消息,马上派西宁总兵马福祥、甘凉道尹张

一百年来又一书

黄岳年

毅前往查办。为首的农民丁积庆、徐成明、刘竹林三人被斩首,主谋的周月林、王九卿充发黑龙江,而进行讹诈贪污的李廷颺、王振鹏则毫毛未动。此案当时虽暂告平息,但民怨结得更深。那年夏天,张掖人王良卿因仓粮积弊久苦农民,趁春间烟案的忿恨未消,暗结帮会及受害农民密谋举事。适河南人王莲清受孙中山先生指示,在张掖一带活动。六月间,王莲清与王良卿等结成联盟,计划利用中秋节日起义,以三千人取张掖,二千人取山丹,一千人取东乐,五百人取抚彝(今临泽县),先以四县作为根据地,再谋进一步发展。不料事泄,事为提督马进祥侦知,王莲清在东乐为马进祥所捕,搜出盟单及用兵规划。王莲清及同行的回族刘姓立被枪杀,王良卿及

帮会头目三十余人,均被按名搜捕杀害,被牵连受害的多达二三百人。陇右宿儒韩定山曾就此指出,国家多难,甘肃也没有置身事外,这里的人民,以自己的行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可信、可用的翔实资料,决定了《张掖地区志》可读、可传、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

张掖是国务院公布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自汉武帝建郡以后,向为西部大郡,人文鼎盛,历史文化积淀十分丰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丝路明珠更是名副其实。《张掖地区志》根据这种基本地情,在篇章设置上,突出文化、经济意味,是对历代旧志重人文传统的继承和革新,也是对一些新编志书重经济、轻人文矫枉过正的反正。仅仅文录一编,即近五百个页面,几乎占到了全书的六分之一,如果合上文化一编,则全书相关的内容即有一半以上的篇幅,的确十分可贵。尽管晋唐时期,张掖富庶,一度甲于天下,但其偏远和后来的贫穷,也是人所众知的。由于种种原因,有关张掖与河西的文献显得格外珍贵。流传有序

的文物典章,几乎和敦煌石室的宝藏一样,湮没甚多。举例子说,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西域图记》《张掖志》《河西人物志》《张掖记》和《河西总镇图说》就都已散佚,《张掖地区志》的纂述过程,既是梳理人文,又是发掘历史。笔者有幸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参与了其中一些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按照主持编纂的张志纯先生的嘱咐,先是收集古往今来贤哲们遗存。由张先生领衔,主编《古诗话甘州》,那几乎搜尽了前人有关张掖的诗作。值得一说的,是当时张掖师专购置了影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我刚好看到,并抄录了其中陕西行都司的内容,这实际就是《陕西行都司志》的核心部分。当时复印的成本还高,我向张先生建议,请地区志办公室派人复印回来,以备使用。现在,看着书中收录的这部分内容,在史学界普遍以为已经散佚的元明典籍,由此而化身千亿,高兴是自然的。

张志纯先生还让我去采访了有功于张掖文化的周定国老先生。当时周先生是师专总务处主任,他是家伯父兴城公五十年代建华学校工作时的同事,当时伯父已经去世,他还很念旧,待我亲切。他给我细说了张掖的历史,把乾隆版的《甘州府志》拿给我看。至今我还记得,说到解放初期毁掉的张掖砖包城墙的时候,他显出幽幽的眼神。他说,那天一些长者去找当道者,人家大手一挥,说这些封建的土围子留下做甚。数千年来积淀、数百年闻名遐迩的半城塔影,就此灰飞烟灭。数年后,当年当地最有威权的官员、三军军长黄新亭来张掖,面对历史文化名城的现状,潸然忏悔:“我有罪啊,张掖城是我下令拆毁的。若保留下,是西北的第二座西安城”这当然是良知尚在的将军泪,然而文物,已然毁灭;民族,已然受伤。

我接着采访了张浩廉先生。浩廉先生是张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创建人,我见到的时候,已经是贤士暮年。走动都很吃力的浩廉先生,拿出他的诗集《拾鳞诗稿》,签上名,盖上章,郑重其事地送给我。这是我较早接受高层学者的签名本。当我把采访后拟写的周定国、张浩廉、陈生藩、周光汉等地方贤哲的传略稿交给张志纯先生的时候,我觉得,张掖文化的熏陶,已经让我在骨子里和这方热

土上生生不息的精神连在了一起。接下来是旧志书《创修临泽县志》和《高台县志辑校》的整理,志纯先生将复印本交给我,我先点,先生再审,复请耆宿展阅。这两种书出版后分别获得了省上的一等奖和二等奖。惭愧得很,名忝佳册,再一再二,这是始料不及的。

1933年,“我国唯一女飞行家”、奉母命为复兴中华民族而西游,写了《西北行》一书的林鹏侠来到张掖。《张掖地区志》收录了她自西宁到肃州的文字,记述了奇女子林鹏侠和同伴自西宁出发,经大通县,翻大坂山,越俄博岭,穿扁豆峡,进入“甘境”的行程。林氏的书里记录了韩启功的事:“下午,至旅部谒韩旅长,至则见军士捣土运砖,修筑院内房屋,旅长亦灰土满身,亲自督工。见余至,甚表欢迎,即扑身上尘垢,束带入室。韩先生为陆军新编第九师名将,久经战阵,屡建奇勋,威镇西陲。闻治军严肃,又实行兵工政策,凡军队内一切土木工程,均军士自任,无事外求,今且目睹矣。其勤劳耐劳之精神,实可钦佩。韩云:‘军士宜令习勤劳,免其沾染恶习,日后退伍,不至投闲入于不正当之途。’此诚善于教练士卒者也。座上遇其参谋长汪微川先生,即汪友兰女士之令兄。其人亦热心亢爽之流,殆与其妹相伯仲。闻曹启文先生等众,已于日前过甘州,赴高台相候。得讯急欲追踪作新省之游。谈次,请于明日行。韩先生坚留作一日盘桓,意殷拳难却,因辞出赴县政府,访邵祝三县长。邵先生老于阅历,对西北二切,皆了若观掌。畅谈良久,颇获教益,归寓客已盈室,多为教友,一周旋,夜深方散,已觉劳倦矣!”第三天离开时,韩旅长派副官二人护送。

印象中韩起功还带士卒修整过甘新公路,那么林鹏侠的纪实文字应该是真实的。当时,张掖还来了名记者如范长江,他在《中国的西北角》里也写到了这位“韩玉山先生”及其军队,范的评价是“精神和动作都不差”,范长江还对这些军人发表了演讲,希望他们对国家“多多卖些力气”。其他的西行著作如李孤帆的《西行杂记》里,也记录了韩起功的事。鼎革时代,韩氏或为罪人。国家多难,伦常毁弃,名将而死无葬身之地者(下转第66页)

一部囊括古今张掖的百科全书

——对《张掖地区志》的评述

唐国增

读书就要读好书，藏书就要藏有价值的书。《张掖地区志》就是我要读的好书，是我要藏的有价值的书。要评论一部书，必须要评评它的编者，还要评评它的内容。

我与《张掖地区志》的主编张志纯老先生相识，不到十年时间，他是一位知识渊博且非常重情义的人，他对我帮助很大，我非常尊敬他，也很感激他。2012年新春佳节前夕的一个双休日，他给我打电话说，历经几任张掖地区领导关心、倾注着众多史志工作者心血的《张掖地区志》终于出版发行了。得此消息，我匆忙打的来到他的办公室里。一进门，看到满头银发的他仍旧坐在小山似的材料堆里工作着，周围堆放的各种书稿与他等高，虽然多，但叠放有序，不难看出，大部份都是由他编校过的《张掖地区志》的各种打印稿，地上的几大箱《张掖地区志》几乎占居了半个房间。他见我进来，匆忙让坐，并沏热茶一杯，转身从办公桌上抱起早为我准备好的一套三本的《张掖地区志》，双手递给我说：“请您指导！”这对我来说，“指导”二字显然是他对我的高看，足见他的涵养和大家风范。我同样用双手接过这部期盼已久的著作，抱在怀里，如获至宝，这是我受赠的最高文化礼品。它的到来，恰如“雨中送伞”，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满足了我以后全面查阅张掖地方历史文化资料的需要。

这些年来，因工作需要，我相继编辑出版了《图说张掖未解之谜》旅游文化丛书、《悦读甘州·古韵》《甘州风情》《甘州声屏文萃》等书，以及与民间艺人合作搜集整理出版了《甘州宝卷》《甘州小调》《张掖地蹦戏》《张掖民间小曲子》等书籍和音像制品。因为我对历史知识缺乏，在编辑出版这些作品的过程中，张老先生给予了悉心指导，就连我使用的许多参考书都是他赠给的，包括由他编辑整理的《甘州府志》《甘州府志校注》《重刊甘镇志》《高台县志辑校》《创修临泽县志》《金张掖史话》《张掖文物古迹荟萃》《张掖民间传说故事》《张掖春秋》《古诗话甘州》《诗咏金张掖》《张掖概览》《肃南史话》《裕固族史话》《高台史话》等权威著作，许多书籍由于出版时间较早，在书店很难买到，非常珍贵。编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它可以充实自己的生活，开拓自己的思路，释放自己的思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自己；同时又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常常是挑灯夜战。尽管自己拥有的参考书很多，但是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找起来还是相当费劲的，当时非常希望有一部比较权威的能够系统介绍张掖各方面情况的地方志书作为参考，遗憾的是《张掖地区志》正在编审当中，还没有出版，未能如愿。没有《张掖地区志》当参考，走了很多弯路，真是害苦了自己，好在有自己占有的大量的资料作后盾，总算是按期完成了我那些书的编辑出版任务。

修志是一项科学性非常强的工作,同样又是一项具有连续性和规模化的文化建设事业,有着鲜明的自身特点和规律,必须严谨从事,细心对待,来不得半点马虎。据我所知,这部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张掖地区志》,是一部凝聚着集体智慧的巨著,它是迄今为止第一部详细记载张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志书,编纂工作花费了16年光景。其间省市(地)县(区)三级党委、政府积极参与,相关部门通力合作,70个承编单位、150位撰稿人查阅、收集资料,主编、分主编和审稿者及总纂者反复核对修改。经过了筹备发动、搜集资料、撰写书稿、评稿审稿、编辑校对、印刷出版等若干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规定的时限和操作流程,这项浩大的文化建设工程,与甘肃省内外地方志相比,有其共同之处,也有许多与众不同之点,可说是独特楚楚。

贯古通今的历史长卷。全志以记述近现代为主、承载历代为辅的方法,客观准确地展现了远古到1995年张掖地区全景式的历史画面,内容涉及远古历史、古代民族、历史沿革、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民族人口、杰出人物、社会保障、人民生活、家庭婚姻、人口变迁、社会道德等方面。纵观全部内容,它高屋建瓴地回顾历史、透视事件,多侧面、全方位地记载历史、反映规律。

内容翔实的地情巨著。全志以原始档案和相关历史资料、社会调查以及有关单位、个人提供的材料为基础,以当代张掖地方史志、考古研究和最新成果为创新点,以再现张掖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采取略古详今的原则,天文、地理、自然、经济、社会全有,地情、史情、社情、人情、文情皆入,全面记述了张掖各领域发展变化的历史足迹。正如序言所述,“纵述历史,横陈百科,万事尽录。”“上承府镇志精华,下纳县市志卓著,荟萃四方举要,纂辑古今文献,网络周全,储备宏富。”

体例完备的科学文献。全志分上、中、下3卷,81章,454节,载文430多万字,分综合、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文录等部分。文体一律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记述体,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文字采用国务院公布的简化字,科

技、专用术语、名称、名词均经过了专业部门的审定。这部在新形势下诞生的地方志,在积极继承传统志书基本体例的同时,树立了“万物皆可志”的“大志观”,断限明晰、体例完备、文字典雅、篇幅控制合理、记述方法得当,以开阔的视野、明晰的思路拓宽修志领域,既具有地方特点,又具有时代特色。在指导思想、篇目设置、收录内容、工作手段等方面都比其它志书更胜一筹。让读者查阅起来更直观,更方便,资料性强,可读性也很强。

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全志分门别类地收录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图片,仅录入的历史地图就有张掖地区行政区划图、张掖地区地势图、张掖地区影像图、西汉张掖郡图、北凉图、西魏西凉图、北周甘州图、隋朝张掖郡图、唐朝甘州图、元朝甘肃行省图、明朝陕西行都司图、清朝甘州府图、红西路军战斗路线图、1955年地域涉及整个河西走廊的张掖专区图等,有的是首次公开,独家收录。700多张历史照片更是弥足珍贵,将这些照片分为亲切关怀、重大活动、编史修志、秀美山川、农业生产、地县工业、商贸供销、文物选粹、市容一瞥、教书育人、医疗卫生、美术撷华、近代书法、当代书法、工艺作品、群众文艺、军事之页、民族之花、古今文书等栏目,真实、形象、直观地记录了张掖的历史瞬间,可谓点睛之笔。

综上所述,《张掖地区志》内容客观公正,言之有理,言之有物,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它是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是广大读者了解张掖地方历史的权威资料。它的出版发行,充分展现了张掖市地方志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全省地方志工作方面作出了表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广受好评。

近20年来,与《张掖地区志》的出版发行密不可分的先是首轮县市综合志《高台县志》《山丹县志》《张掖市志》《民乐县志》《临泽县志》《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志》相继发行。张掖地方史志丛书编撰工作同样方兴未艾,经过市县(区)史志工作者的不断实践和探索,丛书的种类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内容越来越丰富,《张掖交通志》《张掖地区水利志》《张掖地区教育志》《张掖公路总段志》《张掖

农场志》等第一轮部分专业志、部门志和基层区、乡、村志相继问世。史志工作者为张掖人民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他们这种自强不息的可贵精神、甘于奉献的高尚品质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值得肯定,值得赞扬。

现在,摆在世人面前的三本《张掖地区志》我们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围绕《张掖地区志》所发生的编书故事和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渐渐地模糊,甚至被遗忘。《张掖地区志》有内页 3000 页,插页 116 页,436 万多字。按编辑出版书籍的一般惯例,每编一本书,作者至少要看十遍。那张志纯老先生每审一遍《张掖地区志》至少是三个月时间,要看十遍,其难度可想而知,他所花费的时间和效率让人惊叹,他的付出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如果要评选张掖近年来编审出版物文字数量最多的人,非张志纯老先生莫属。这些年,他的时间差不多都用在了《张掖地区志》的出版发行上,他身患糖尿病,一直坚持用药,他凭着坚强的毅力,除了编审,就来回奔波于各级部门、印刷厂和出版社之间,找领导、找资料、找经费。因各种原因制约,编辑工作面临半途而废,是张志纯老先生跑前跑后,到处疏通关系,求情下话,才使得编辑出版工作得以延续,这厚厚的三本《张掖地区志》真是来之不易。如果没有他永不放弃的信念,没有他无私奉献的精神,没有他对修志存史事业的忠诚,《张掖地区志》就不可能出版。从厚厚的三本书中,我看到了他所倾注的心血,他的这种执著让我感动,今生能有幸读到这部囊括古今的《张掖地区志》,真是一件幸福而快乐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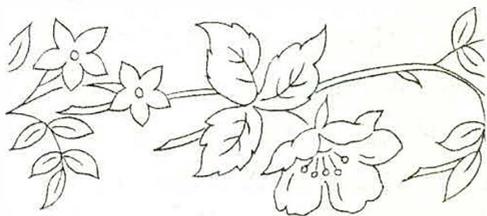
本志的出版还得到了社会贤达的大力支持,朱兴杰、殷如学、许福林、章晓文、李玲、任荣林、陈冈等 26 位张掖地方企业的老总给予了不同形式的赞助,这种支持地方史志出版的善举功德无量,不愧为明智之举,他们的名字将伴随志书永久流传,倡议张掖的企业家们今后能够多多支持地方志和地方文化作品的出版发行。

修志的目的在于用志,唯有用志,才能资政,才能利民,方显其价值。《张掖地区志》的内容丰富得让人惊叹,大量的资料前所未有,是非常宝贵的

地情信息资源,它的潜在价值是十分巨大的,它不仅衍生出新的文化成果,而且还会转化为生产力,在经济和社会事业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我而言,我现在在甘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从事政府调研、政务信息、文秘服务等工作,负责编辑区政府内部刊物《甘州政务》,管理甘州区人民政府新浪官方微博“甘州发布”等等,《张掖地区志》是我书架上必备的工具书,是我工作的坚强后盾和得力助手。《甘州政务》每一期必有“人物传记”这一栏目,我从《张掖地区志》中查阅历史人物的基本情况,以确保历史人物的客观公正;在编辑“甘州发布”微博时,借鉴《张掖地区志》里“文化编”中的内容,来撰写甘州名胜、诗赋甘州、甘州方言、甘州美食等广大博友喜闻乐见的信息;在撰写调研报告时,一些数据常常与《张掖地区志》记载的数据作比较,以增强报告的可信度。我从《张掖地区志》中学习地方知识,了解金张掖的过往今昔,它是我学习“充电”的“蓄电池”,是我不断“淘金”的富矿。《张掖地区志》的用途很广,我们不当将它摆在书架上当观赏的“花瓶”,更不要把它压在箱子底下永久地沉睡。只要是识字的张掖人都要来读它,只要是想了解张掖的外乡人都要学它,只要是全市的公务人员都要用它。

细细品味,《张掖地区志》就像一杯陈年的老酒,散发出诱人的清香。感谢致力于为张掖修志的各位仁人志士,没有你们的艰辛努力,就不会有这三本沉甸甸的巨著;没有修志人员的不懈努力,就不会有今天春暖花开的修志局面!

(作者系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甘州区人民政府调研室主任)



资料性与可读性俱佳

——读《张掖地区志》感言

蒲乾亨

由张掖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志书《张掖地区志》，在中共张掖地委和行署的领导下，在省地方志编委会等有关单位的支持和指导下，在地区有关部门和省属驻张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经过 100 多位撰稿，主编数十年的辛勤劳动，这部时间跨度约 8000 年、地域跨度约 6.9 万平方公里的志书终于问世了。这部志书的编辑出版，是一项浩大的、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历史文化工程，它的出版，是一件功在当代、惠及后世的大好事，可喜可贺！

早在 1994 年 3 月，时任中央张掖地委书记的马西林就提出了编修《张掖地区志》的倡议。此后，地委、行署对此事非常重视，多次开会研究，做出决定，成立机构，抽调人员，进行培训，制订纲目，颁发办法，组织实施。在编写的全过程中，编纂办公室做了大量细致而卓有成效的工作，统一了口径，避免了弯路，提高了工作效率。这对加快这部书的编写进度、保证志书的质量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必须肯定的。

粗读这部巨著，笔者认为该书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体例完备，内容丰富

这部书共十编，包括综合、地理、经济(一)、(二)、(三)、政治、文化、社会、人物、文录。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志书中应该收入的内容都收入了，可说是面面俱到，方方皆有。而且还有很多地图、照片。这些资料是弥足珍贵的。

二、史料翔实，来之不易

这部志书时间跨度长，要尽可能齐全地收集自远古迄今的史料，而且使之翔实可信，谈何容易！展开这部志书的上卷，在正文前，你就可以看到从《西汉张掖郡图》至《清朝甘州府图》等 9 幅历史地图；接着你会看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胡耀邦总书记、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亲切关怀张掖的照片；还有朱德、李先念、徐向前、李鹏等中央领导人的题词；此处还有反映历史现实的大量珍贵照片。这些照片，特别是历史地图，民国以前的图片都很珍贵。

第一编第一章《大事记》从远古（约公元前 6000—前 5000 年）至 1995 年这漫长的约 8000 年内发生在张掖地区的大事及第二章《历史建置沿革》，收集这些史料，需要寻找和阅读多少历史文献，其艰辛程度之大，可想而知！

中卷正文前，收入了优美山河、湿地风光、农业生产、土特产品、林木果业、水利建设、畜牧渔业、地县工业、乡镇企业、交通邮电、商贸供销、故址遗存、文物选粹、砖雕精品、古近建筑、市容一瞥、教书育人、医疗卫生、体育运动、美术撷华、近

代书法、当代书刻、楼馆门额、工艺作品、群众文艺等珍贵照片。这些照片,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张掖悠久的历史、优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自然资源、丰厚的文化积淀,特别是真实地记载了新中国成立之前张掖经济文化的落后(如2—13页“〔清〕末张掖邮差”和“〔民国〕时期张掖邮差”)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状况。这些照片资料是历史的见证,是地方史志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它为我们描绘出了张掖历史进程的轨迹。有了这些资料,更是这部志书具备了图文并茂的特点,大大增强了它的可读性和历史价值。

再看下卷,有《原红西路军的当代将帅》,以徐向前为首的96位将帅的军衔、照片;《流落张掖地区红军部分战士》《保护红军有功人士》以及其他资料和照片。这些珍贵史料也是来之不易的!

下卷第十编《文录》中,选录了从〔西周〕《穆天子传》至〔民国〕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等100多篇古文献中的张掖录。读者可以设想一下,要收集这些史料,首先要知道从哪些书中去找,然后找这些书,阅读这些书,并从中选录出有关张掖的内容,好多还加了“注释”、“校勘”和“编者按”。这是何等艰难?又要付出多大的辛劳?这一编第二章《金石镌华》内有《碑碣文选》,并列表选录了张掖的金石碑碣,这又是多么艰巨的工作?该编第三章《历史文献》,选录了〔清〕以前至当代的诸多文献,特别是红西路军的文献。凡此诸种,对后世都是有裨益的文献。

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张掖地区的广大读者对该书的编纂人员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向你们表示衷心诚挚地感谢!

三、张掖方言,特色明显

社会编第十章《方言》中收入张掖语音、语汇、语法、谚语、歇后语、俗语、逆序词、谜语、绕口令、民歌等内容。除民歌外,其余部分收集得相当齐全,而且分门别类进行编排,使之眉目清晰。笔者是张掖人,看到这些感到格外亲切、熟悉。

特别一提的是张掖方言的地方特色明显,洋溢着浓厚的乡土气味,例如“谚语”中之“季节气候谚语”:“龙首山戴帽帽,雨下地上起泡泡”;“南北

两山明,近日天气晴”(原注:两山指祁连山、龙首山);“祁连山拉雾,必有连阴雨。”一看,这就是张掖的气象特点。又如“农业谚语”中有:“化肥有个怪脾气,只长庄稼不养地。”过去没有化肥,种地只用农家肥(土肥),现在普遍使用化肥,农民就摸透了化肥的“脾气”。这些说明农民很善于从生产实践中不断总结生产经验。再如歇后语:“韩起功统治张掖——恶贯满盈”。一句话就点出了国民党统治下的张掖人民所遭受的深重压迫。

撰稿者不单单是收集方言,而且对方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或是采用了语言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对方言进行了分类、注音,并注明语意。若将这些内容独立成篇,就是一部学术成果!

综上所述,《张掖地区志》是一部承上启下、鉴古喻今、继往开来、体例周密、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图文并茂、足以留存千古的信史,是张掖地区志编委会代表全地区约130万人民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一份厚礼,是全体编纂人员数十年辛勤劳动的结晶。他们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主人翁精神,辛勤的收集、筛选、校对资料,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编章辑节,斟字酌句,以确保质量;初稿完成后,在编委会的领导下,主编呕心沥血、反复考证,精编编辑。按程序进行了初审、复审、终审,从而确保了该书的质量,力求经得起社会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尽可能地不留缺憾。编委会和全体参编人员,你们辛苦了,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你们的名字将永载史册,你们的功绩将永远留在张掖地区人民的心中!

综观全书,就笔者看过的部分而言,文字校对还是相当好的,错误不多。对这样一部大部头的书,能做到这种程度,已属难能可贵。但第八编第十章《方言》部分错别字和错的标点符号较多。为纠正错误,笔者不揣冒昧搞了一份《勘误表》,仅供参考。需要说明的是:张掖方言中有些词语易说不易写,话是说了,但不知该用何字,这就需要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斟酌。

对第九编第二章第五节《知名人士》,笔者提了点建议,请在修订时考虑。

(作者系河西学院副教授)

让张掖历史渊源流长

——悉读《张掖地区志》序跋有感

张恒善

恩格斯指出：“爱国主义是以爱家乡为基础的。”要爱家乡，首先就要了解家乡。新近出版的《张掖地区志》是张掖历史和现实的地情资料、信息总汇，它以其真实、具体的资料，全面、准确地展示张掖的发展历程，是人文张掖的靓丽名片。该志书看得见，摸得着，听起来熟悉，读起来亲切，不仅使读者了解了张掖渊源流长的历史文化，而且增进了作为家乡人的自豪感和荣誉感，更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热爱张掖之情和建设生态张掖之志。

《张掖地区志》是张掖有史以来最为全面、真实反映全区从远古到 1995 年间的历史演变、变化发展的综合志，全书 430 多万字，可谓鸿篇巨制，气势非凡。该志，别具一格，涵盖内容全面，颇具特色，是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地方性为一体的佳志、精品之作。

《张掖地区志》历时 16 年编纂，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是张掖市第一部全方位记载辖区社会经济发 展的志书。该志以原始档案和相关历史资料、社会调查以及有关单位、个人提供的材料为基础，以权威史籍、考古研究和最新成果为创新点，以通俗易懂、简明朴实的语言，全面记录了张掖自西汉建郡以来至 1995 年两千多年的自然全貌，特别收录了 1949—1995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沿革、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民族人口、杰出人物、社会保障、人民生活、家庭婚姻、人口变迁、社会道德等内容，较为全面地记述了张掖各领域发展变化的历史足迹，展现了张掖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奋斗与贡献。全志分为上、中、下 3 卷 81 章、454 节，共计 430 多万字，是一部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准确，史料翔实可靠，具有较高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地方志书。

香港董桥先生有言，书是庭院，序是影壁，跋是后花园。阅读《张掖地区志》序言，对董先生的这一精典论断深信不已。

《张掖地区志》前置三序。序言一的主要内容是：“志载盛世”。歌颂张掖美丽可爱，张掖历史悠久，张掖前程似锦。序者肯定编者：发奋苦战，披沙拣金，铸就此著，可庆可贺。序言二的主要内容是：“信史永存”。序者指出，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序言回顾了“地区”一级建制以来的变迁情况，简论了编修地区志的起缘、地区志的内容概述。序言指出：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区志必将产生“资治、教化、存史”之功效。序言三的主要内容是：“志留千古”。序者评价《张掖地区志》是一部载籍丰博的地方志，是一部通古贯今的一方全史，是一部价值珍贵的科学文献。三篇序言系时任党政主要领导捉笔，文采飞扬，精美无比，悉心品读，颇有教益。

三篇序言告诉我什么？

张掖是个可爱的地方，张掖历史悠久，张掖前程似锦。序一的作者马西林同志是一位儒雅领导，不仅政界倡导发展经济，关注民生，而且时刻不忘传承文化历史。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他担任中共庆阳地委副书记时就兼任《庆阳地区志》编委会主任，破当时“地区是省上派出机构，不编地区志”之例，倡导主持编纂了全省第一部地区志。90 年代初调任张掖地委书记后，于 1994 年发起，又组织编纂《张掖地区志》，才有了《张掖地区志》的成功。

老领导的拳拳之心、殷殷期望,是这部巨著的面世所在。据张志纯说,马书记调省上不论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时,还是当省委副书记时,常捎书带信过问和关照《张掖地区志》的编修。这套垂世之作完全是他一直操心的结果。

旨在存史、资治、教化的《张掖地区志》,使张掖的历史渊远流长。作为《张掖地区志》编委会主任的梁国安和总纂李龙海,在序言二中主要阐述了“地区”一级修志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当代与后世的必要性。深明修志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序三作者为撤销张掖地区改为张掖市的市委书记田宝忠和市长何振中,任期正值地区志终审后申报出版印刷阶段,对后期付梓给予足够重视,保证了志书的圆满出版。

此志“跋语”与“后记”兼而有之的《精心组织,众手编志》一文,以“组建班子,培训人员”“制订纲目,颁发办法”“分鲜任务,实行承包”“加强督导,严格审查”“实行‘三审’,保证质量”为内容,综述了修志全过程。是一条有领导、有组织、有纲领、有办法、有实施、有经验的修志之路。

我读志不多,但浏览过去省内各级各类地方志中的序言,都未配置作者照片,唯独《张掖地区志》的三篇序言作者都有本人照片,真是“见文见人,独树一帜”。

“人情真足惜,努力事春耕。”正是有了各级领导们的殷切希望,有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才极大地激发了编纂者们不懈怠、不自满、不自足、不保守、不张扬的工作劲头,他们不分昼夜,不计假日,历时10余年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一巨著。在后期的修订工作中,责任主编张志纯先生更是不辞辛劳,不舍昼夜,吃住在办公室、印刷厂,悉心校正,精心修改,不放过每一个小疏漏,不留下每一点小差错,确保了《张掖地区志》的质量和水平。如此辛勤地工作,最终得到了后来继任的地委、行署领导田宝忠、何振中的高度肯定和好评。在序言三中,两位领导概棺定论:《张掖地区志》是一部载籍丰博的地方志,是一部通古贯今的地方全史,是一部价值珍贵的科学文献。

著名方志学家、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先生认为,地方志是对地方情况进行综合性反映的百科全书,是撰述历史借以取材的资料宝库之一,是地方文献中的大宗,蕴藏着丰富而有价值的史料。《张掖地区志》正是这样一本流传千古的好书。我深信《张掖地区志》发行之后,会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将对张掖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巨大的存史、资治和教化作用,一定会流传千古。

(作者系张掖市甘州区广播电视台干部)

(上接第59页)比比皆是。以今例古,则这样的军官,倒也不全是十恶不赦。国难当头时节,弱质女士林鹏侠的壮举,启奋发之气,亮国人心灯,殊为可贵,其著述之有益于世,亦非虚誉。

对金石碑记的著录整理,亦《张掖地区志》一大特色。许多只闻其名未见存录的文字,翻开《张掖地区志》,历历在目,真是一种享受。限于篇幅,不再举例。

捧读巨制,情不能已,有口号颂曰:

弱水环绕昆仑祖,八骏西巡见龙珠。

山河无恙东风乐,二百年来自第一书。

在西宁北山上,有一块“万山之祖”的碑碣。张掖当昆仑之墟,王母宫在焉,文物丰贍,故云。

由于篇幅太过巨大,《张掖地区志》也还留有一些缺憾,有待于补正。譬如木质汉代“张掖属国都尉”印信,现在还在,图录中可以收录的。左文襄公西域用兵,有关甘州的湘军史料文档,当世尚有遗存,也应征集录入。吴浩军《张掖古旧方志存佚及研究整理考述》《甘州府志体例及纂修者考辩》《陕西行都司志存佚考》《国榷》,作者谈迁的《河西总镇图说序》,还有当代圣教正脉法幢宗创立于张掖,相应的重要文献也宜收入。这些都与张掖文明关系至巨,不可错过。此外,由于种种原因,人物收录中尚有一些泥沙未清的成分,作为传之后世的史乘著作,这也应该是要避免的。

(作者系张掖市第四中学副校长)

读《张掖地区志》感想

高慧琴

案头的《张掖地区志》，三大本，洋洋洒洒 430 多万言，装帧精美、散发出缕缕油墨的馨香。我专注地、轻轻地翻看着，一页，一页，又一页……

一部厚重的《张掖地区志》捧在手中犹如把近五千年的张掖历史摆在了面前。我想，编纂这部价值珍贵的科学文献，关键是收集资料。张掖历史悠久，但民国以前根本没有档案可查，虽然在清顺治十四年出版了《重刊甘镇志》、清乾隆年间出版了《甘州府志》，仅依靠这些资料和民国时期的部分档案，还有 1955 年以来的现行档案，是无法编纂出张掖首部内容全面、系统的《张掖地区志》。不容置疑，这部记载张掖历史的浩繁志书的问世，是张掖重大文化建设工程的一个硕果，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收获。

《张掖地区志》的编纂出版，其中不仅有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也有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与支持，同时也凝聚着众多编纂者的心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特别是地区志主编偕同编纂工作者不辞劳苦，挖掘历史，数易其稿，一丝不苟地对志稿进行反复修改，加工完善、查漏补缺、考疑证惑，核实数据，为求志书的完美，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以达到观点正确，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繁简得当，字斟句酌，艰辛奋斗 15 个春夏秋冬，终于把张掖历史全面系统，完整的收录于志书。有些物质载体，例如张掖的老城区，经过解放以来半个世纪的建设，现已高楼林立，老城区形影全无，张掖城东门外的火塔是张掖城区的五塔之一，拆毁已有 30 多年，但是《张掖地区志》的编纂工作者从社会各方面及收藏爱好者手中一点一滴，历经千辛万

苦征集资料，使一些珍贵的史料图片收入志书，重现于读者面前，起到了教育后代，了解张掖历史、热爱张掖，更好地为建设张掖多做贡献的作用。

修志是为了总结历史规律，我们要走向明天，就要懂得张掖是如何从昨天走过来的，地区志有古有今，古为今用，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现实工作的需要。

通过阅读《张掖地区志》，对我启发教育很大。学到了很多知识，比如：“张掖在秦始皇统一中国 26 年时开通了丝绸之路，居住在河西的月氏就成为周朝和秦朝与西汉各国货物交流的中介”，汉唐以来，“西北地区不仅是以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镇而闻名于世的历史文化古城”。而且从“唐代开始就已大兴屯田水利，变旱田为水田，稻收丰衍”。先民们的创造推动着张掖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促使张掖逐步成为河西商品粮生产基地，并为全国做出了积极贡献。《张掖地区志》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张掖历史的发展变化，是地方特色、时代特色都比较显明的综合性志书。具有学习、珍藏、资政、教育、启示的重要作用，为后代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

《张掖地区志》的编纂成书，有许多鲜明的特点：

一是在结构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张掖地区志》突破传统，开一代中国方志新风，体例上大胆创新。规模宏大，把握发展主线，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结构严谨，分门别类；详细记述，系统有序；章节分明，资料翔实；文笔流畅，图文并茂。资料取舍繁简得当，并有大量数据统计。尤为可贵的

是突出了重点,对红西路军征战河西,艾黎在山丹等,对张掖人民有较大影响和重要贡献的人物事件以专篇、专章详细叙述,志载要事特事,是该志的成功之举。

二是它的全面性和系统化。全面与系统地记述是该志的又一特点。《张掖地区志》无论是纵向的时间和横向的空间都做到了百无一失。志书上限追溯到事物的发端,大事记从三皇五帝始,下限断至公元1995年底,时间跨度达数千年。总体为“五脏”,即述、记、志、传、录,附体为“两腑”即图、表。主体部分有十大类,即综合、地理、经济一至三、政治、文化、社会、人物、文录。10编之下设81章,各章之内又含454节,各节酌情再置若干目。既有整体的全面性,又有个体的系统性,真是珠联璧合,相辅相成。特举一例,在卷首配置彩印地区行政区划图、地势图、影像图、历史朝代地理图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张掖的照片、题词等,如此周全与系统是其它地方志难以企及的。

三是充分彰显了张掖地区鲜明的地域特点。张掖是古丝绸之路的贸易流通的枢纽之地,有“文明古城”的美誉,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文献典籍、原始文书、经卷、中国最大的卧佛、木塔、马蹄寺等地面和地下遗存、民间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支撑张掖文化研究的基石。这些博大精深的文化积淀,既是我们世代传承的宝贵财富,也为众多国内外学者所心驰神往的地方。为此,志书又分设了《文物古迹》《古文化遗址》《革命遗址及纪念建筑物》等专题,成为《张掖地区志》浓墨重彩的篇章。凸显了张掖的悠久历史和绚丽灿烂的古文化及近代文化。

四是坚持科学地采集利用资料与数据,做到准确、翔实、可靠。史志编纂中撷取准确无误、真实可靠的资料与数据,是志书的本质属性,也是它的根本要求。资料和数据反映历史的真相,要确凿无误,经得住推敲和检验。编纂者对此态度十分慎重,他们制订并刊于卷首的《凡例》,就明确规定:“统计数据以地区历年统计部门发布的为准,统计局缺少的,采用专业部门数据”;“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馆(室)、图书馆、博物馆、统计局、正史、家谱、

有关报刊、专著和口碑资料”。《凡例》还就记述地域范围、记述内容时限、记事要求、采用表述形式、志书类目结构、人物收录及排序、年号与纪年称谓、计量单位应用和产值统计,价格计算等都有明晰而周到的规定。对于科技、专用术语、名称、名词均经专业单位或部门审核。地名书写,由于张掖行政区划有过多次变更,“志书一律采用1982年地名普查后的标准名称书写”,以规范的现代语体文、记述体。文句力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文字采用国务院公布的简化字。如此细致、周全、缜密、求真的科学态度,保证了《张掖地区志》有较高的质量。

五是编纂始末体现了合力。《张掖地区志》极具权威性。从领导重视和关注度说,编纂委员会的组成,从1995年7月起,由地委领导挂帅,成立编委会,审稿组。诚聘专家学者指导,地区志编委会与70多个编纂单位签订责任书,有240人为地区志供稿。浩瀚志稿由10位分编主编承担编辑,最终落实于总主编。完备的组织和坚强的领导以及奋力的团队,保证了地区志编纂的完成。使洋洋大观的《张掖地区志》,不啻做到内容全面,结构系统严谨,史实详尽求是,而且资料精确无误,真正成为“其文直,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可让人们完整地了解一下逝去的“昨天”。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珍贵史料志书。

(作者系张掖市档案局资料管理科科长)





华亭历史上的名人

——皇甫规

孟春贤

皇甫规(公元104—174年),字威明,是东汉安定郡朝那人。他的祖父皇甫稜是当时的度辽将军,他的父亲皇甫旗曾经任过扶风的都尉。

皇甫规少年时代就很有远见卓识。汉顺帝永和六年(公元141年),西部羌族秘密谋犯进攻长安,包围了安定郡,汉顺帝派征西将军马贤,率领士兵征战讨伐。皇甫规早就知道马贤不爱恤士兵,而且军纪松散,预知必败无疑,其后果真如所料。

当安定郡官员得知皇甫规懂兵事时,就命令皇甫规带领八百士卒与羌人交战,很快就打退了羌兵,于是便留皇甫规在郡任小官。后来,羌族又一次进攻侵掠陇西,皇甫规主动上书要求请战,报效国家,救护乡郡,朝廷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也没有任用他。

在汉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时,皇甫规被选为德才兼备的人士,到京城应考。此时梁太后正在执政,她的哥哥梁冀当时很专权,皇甫规因为

言语直快而触怒了梁冀,只被命为侍卫皇帝的郎官。皇甫规遂后就托病回家,在他的家乡设馆教书14年,教授门徒300余人,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到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冀被杀以后,一月之内,朝廷派官员五次来召皇甫规,他没有去朝廷。

延熹四年(公元161年),泰山人叔孙肆无忌惮,目无朝廷,率领群众起来闹事。朝廷得知后非常惊恐,便召皇甫规为泰山太守,皇甫规到任后,社会秩序很快就转乱为安。这一年秋季,羌族侵犯关中,护羌校尉段颍以征讨不力论罪。冬,羌族又大举进犯,朝中大臣推举皇甫规,朝廷任命皇甫规为中郎将,监督关西兵进行讨伐,他带领士兵杀死羌兵八百多人,众多羌兵相约而投降。第二年皇甫规率骑兵西征讨伐陇右,因为道路不通,军中士兵不服当地的水土而发生疫病,皇甫规到各兵营询问士兵的疾苦,还给他们送水送(下转第80页)

甘 肃 像 什 么 (快板诗)

武威一宁

地理老师在上课，
把中国地图来铺设，
他的提问很奇特：
“甘肃的版图轮廓大，
你们看她像什么？
其中的寓意又如何？”
——哦……

同学们个个都沉默，
仰头把问题来思索。

有位同学抢答说：
像一把钥匙能开锁，
中华文化谜底多，
这把钥匙可解惑。
伏羲八卦真神秘，
敦煌艺术深又博，
丝路千年通西域，
张掖大寺有卧佛，
马踏飞燕雄姿美，
西夏古碑字典活；

有人接着回答说：
像一支哑铃可以握，
锻炼身体强筋骨，
艰苦的环境磨练我；

有位女生接着说：
像一把乐器斜着搁，
可以弹奏最美的歌。

“花儿”“贤孝”传天下，
陇东的民谣也红火。
裕固、藏族歌不落，
兰州的鼓子唱蹉跎；

又有人跟着回答说：
像一柄如意吉祥多，
象征民族团结的谐和；

七嘴八舌有人说：
像一条娃娃鱼挺活泼，
她是濒危保护的种科，
隐舍我们生态的脆弱；
像一串葡萄沉甸甸，
酿出的美酒真好喝；
像一根骨头硬勃勃，
把祖国西部的脊梁托。

最后有人回答说：
像一座横跨的桥梁卧，
把亚欧大陆来联络。
……

老师听了乐呵呵，
进行总结最后说：
“大家的思路都不错，
个个都很有特色。
甘肃是个好地方，
就等着你们来建设！”

民国大事记

(公元1941—1943年)

民国30年(公元1941年)

1月

9日 国民党甘肃省府制定《管理嫌疑户口办法》。

21日 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

是月 甘肃省实施新县制后,除夏河、环县、合水3县和卓尼、肃北2设治局外,其余各县一律将区署、联保裁撤,另成立乡(镇)公所。全省计成立乡(镇)公所805个、保7656个、甲7.8932万个。

2月

12日 被关押在兰州沈家坡王家祠堂看守所之中共甘工委书记李铁轮、副书记罗云鹏和赵子明、惠光前越狱。李、赵二人回延安,罗、惠再次被捕,转押在兰州黄河北沙沟监狱。惠光前于1944年病逝于狱中;罗云鹏于1946年2月25日被杀害,时年32岁。

23日 陇东分区各县进行第二次普选,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大体各占三分之一)政权。

是月 陕甘宁边区遭国民党重军包围和经济封锁。陇东地区党政军及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中共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仅华池县1940年即输出粮食50万驮。

3月

3日 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甘肃省1941年建设公债条例》,规定公债金额为800万元,分两期发行。

4月

24日 国民党甘肃省府与中国银行合资设立甘肃水利林牧股份有限公司,资金1000万元。办理农田、水利、森林、畜牧业务。

是月 国民党甘肃省府提高9种日用品零售价格。

△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交通部、中国银行、甘肃省府在永登县窑街合资创办甘肃水泥公司,资金850万元。1943年3月正式投产,年产量5000吨。

△ 宁夏西海固回民起义军,在马国磷、马思义率领下,进入甘肃张家川境内。张家川300多名农民加入起义军。起义军在当地歼灭国民党政府军两个营后,主动转移。6月6日,在马思义带领下,进入陇东解放区,改编为陇东回民骑兵团。

5月

1日 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公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边区政府的性质、施政方针和革本政策。

13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原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岗为书记。

14日 兰州举行防空演习。

是月 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处长伍修权奉调返回延安。由副官赵芝瑞等5人负责留守。

△ 藏族中共党员吴振纲、希尧,自庆阳返回家乡夏河县,建立党的秘密小组,并在拉卜楞、卓尼、临潭、岷县等地建立青年同学会、藏民同乐会和“联义会”等组织,团结藏族进步青年,开展反对国民党政府剥削压迫的斗争。

6月

15日 国民党甘肃省贸易公司在兰州成立,资本2000万元。并在西安、河西设办事处。

7月

1日 国民党兰州市政府成立,蔡孟坚任市长。全市面积16平方公里,人口17.2万余人。

29日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与甘肃省政府合组成立甘肃省工矿事业管理局。以翁文灏、钱昌照、孙越琦、朱绍良等为理事,谷正伦为理事长。

8月

是月 国民党甘肃省调整本省行政督察区。计:省政府直辖10县、1市;第一行政督察区,专署设岷县,辖9县、1设治局;第二行政督察区,专署设平凉,辖9县;第三行政督察区,专署设庆阳西峰镇,辖8县;第四行政督察区,专署设天水,辖12县;第五行政督察区,专署设临夏,辖4县;第六行政督察区,专署设武威,辖8县;第七行政督察区,专署设酒泉,辖7县、1设治局。全省共67县、1市、2设治局。

9月

1日 成立甘肃储金汇业局,开办储汇业务。

是月 国民党统治区甘肃省临时参议会举行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议案有开办黄河上游河运,建设兰州新市区等。

△ 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授意南方局常委、《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委派中共党员《新华日报》社采编室主任田伯萍(田君实)带领丁毅、宁汉书、丁酉成、黄小穆、高德藩、孙铭勋、彭瑾

到玉门油矿老君庙矿区,以子弟学校教职工身份为掩护,建立党支部。1944年秋,迫于形势,撤回重庆。

△ 陕甘宁边区陇东贸易分局,先后在西华池、驿马关、曲子等地设立贸易站,有计划地调剂对外贸易,输出边区土产,以换取必需品。

是年 7至12月,设在三岔的贸易总公司输出食盐120.3万斤,牲畜1.5万头;输入粮食、棉花、杂货共合金额195.32万元。支援了边区军民反对国民党政府经济封锁的斗争。

11月

6日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陇东分区庆阳、合水、曲子、镇原、环县、华池及新宁、新正8县的51名参议员出席会议。选举高岗为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

是月 甘肃广播电台筹备处在兰州中山林安装3部100千瓦中波发射机,开始试播,每天播音5小时。

12月

下旬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分院在兰州十里店开学。

23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建制。共辖28个县(市),其中在甘肃境内的有庆阳、合水、镇原、曲子、华池、环县、新正(今正宁)、新宁(今宁县)。

是年

△ 国民政府部队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达40余万人。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令由靖远起经水泉子至宁夏固原黑城镇止,修筑“国防工事”,至1942年完成。

△ 国民政府发行“建设公债”、“军需公债”法币各12亿元。派甘肃募集各800万元。又发行“同盟胜利公债”及“美金公债”,派甘肃省募集法币各2000万元。

△ 国民党甘肃省发行“民国30年甘肃建设公债”800万元。又发行“甘肃省30年水利农矿公债”1500万元。

△ 中国银行 雍兴 公司在兰州建立面粉厂，年产面粉 15 万余袋。

△ 本年甘肃全省大旱，复加冰雹、霜冻。全省受灾 47 县，其中重灾者有：礼县、定西、会宁、靖远、皋兰、洮沙等 36 县。受灾土地面积 677.5972 万亩，受灾户 23.3133 万户，灾民 133.8978 万人。

△ 国民政府调驻防武威之骑 5 军军长马步青为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令率部前往。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部队进驻河西地区。

△ 甘肃国民党统治区物价暴涨，货币贬值。粮食价格以 1937 年 6 月为基数，到本年 12 月上涨 10 倍。

△ 国民党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在兰州徐家山建立水土保持实验基地，采用挖水平沟、鱼鳞坑的方法，种树种草，经五六年的努力，种活侧柏、榆树等 7 万多株。

△ 夏，黄河水利委员会林垦设计委员会，在天水黄土丘陵沟壑区建立“陇南水土保持实验区”，试验基地设于天水赤峪沟。是为全国最早的水土保持基层机构。

△ 据统计，全省有较大的炼铁厂家 10 处，集中在成县、徽县、两当、西固四地，均为土法冶炼，年产铁能力 760 吨~890 吨。

民国 31 年(公元 1942 年)

1 月

14 日 民主进步人士史鼎新、王新潮、王教五、杨可显、许青琪、张乾一、刘余生、刘鸣在兰州成立西北民主政团(民盟甘肃支部的前身)。史鼎新为主任委员。提出十项政治纲领。决定以洮河流域为活动中心区域，组织农民互助会、在乡军人联谊会等秘密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是月 设立兰州海关总关。接办原甘、宁、绥区所辖稽征事务。同年 4 月公布《战时消费税暂行条例》，由海关及所属分关、卡负责征收。兰州海关所属分关为绥远，分卡有：西峰镇、平凉、天水、张家川、碧口、徽县、武威、张掖、酒泉及兰州地区的东岗镇、西稍门、黄河铁桥(今中山铁桥)。兰州邮

局、兰州飞机场等处。至抗战胜利，兰州海关及所属关、卡均予裁撤。

2 月

12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划定华池、曲子等县为移民垦区。颁布移民农垦优待办法，设立移民站，规定移民垦区 3 年内不征收救国公粮。

20 日 全国慰劳总会前线将士慰劳团第 2 团由国民党参政会参议员沈钧儒率领抵兰劳军。发动 10 万青年签名寄信慰问前方抗日将士，并举办抗战事迹照片和慰劳物品展览。

3 月

1 日 皋兰县湟惠渠建成通水。渠长 31.5 公里，灌溉面积约 3 万余亩。国民党甘肃省建设厅建立“湟惠渠特种乡公所”(县级)，直隶于省。1947 年 9 月 8 日改为“湟惠渠管理局”。

28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1942 年征收公粮比 1941 年减少 20%，征收公草减少 40%。

是月 中共中央西北局民运部长贾拓夫在延安召集甘工委部分负责人孙作宾；郑重远、陆云龙、吴治国、罗扬实等座谈，总结抗战以来甘肃党的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并向中共中央和中央西北局提出《抗战以来的甘肃》的报告。

△ 国民政府甘肃省合作金库在兰州成立。资金法币 2000 万元。

4 月

是月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规程》。

△ 临洮县溥济渠竣工。全长约 20 公里，设计灌溉面积 3.5 万亩。

5 月

13 日 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和晋绥军区部队。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6 月 2 日正式成立。

24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整风问题致各地委电示。随后陇东地委普遍组织各级干部开展整顿“三风”(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运动。

6月

25日 国民党甘肃省公布《非常时期各地举办联保连坐注意要点》及《组织民众肃奸网及联保连坐切结办法》,以加强其统治。

30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务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规定精兵简政的任务是建立必要的符合实际的行政工作制度。实行合署办公,以提高行政工作效率。

7月

1日 国民政府财政部实行纸币统一发行办法。自本日起,所有货币发行,统由中央银行办理。中国、交通、农民三银行在1931年6月30日以前所发行的钞券,规定限期,交由中央银行接收。各地方银行发行之钞票,由财政部规定办法,限期结束。甘肃省同时遵照执行。

22日 甘肃矿业公司与徽县铁矿商号复盛祥、福顺永、积成茂三家合资成立共济炼铁厂,进行季节性土法生产。年产生铁约500吨。

8月

20日 蒋介石从重庆飞抵兰州,召开甘、宁、青、新4省军事会议。后又至酒泉、玉门油矿、张掖、武威、天水等地活动。

23日 玉门连日大雨。是日山洪暴发,冲垮油井,原油着火,损失严重。

是月 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对甘肃工作的决定》。决定重建甘肃党的领导机构,明确“精干隐蔽,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

△ 陇东分区各县及新正、新宁县普遍实行由选民直接选举乡级参议员和乡政府委员会,10月底全部完成。

是月 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在兰州上西园成立。

9月

是月 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在兰州创办培黎学校。先后设立裁绒、机械、化学等实习工厂,实行半工半读。1974年合并于山丹培黎学校。

△ 灵台中学爆发学潮。380多名学生向国民党县长翟大勋示威斗争,迫使国民党甘肃省改换了县长。

10月

19日 是日至次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边区党、政、军县团以上领导干部300多人参加。会议着重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批判了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少数人犯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会议还对边区政府工作、经济和财政问题进行了讨论,制定了必要的方针、政策。

是月 中共甘(肃)宁(夏)工作委员会(简称甘宁工委)在庆阳成立。孙作宾任书记。

12月

23日 根据《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陇东分区各县分别召开租佃会议,通过“二五减租”决议,并陆续实施。

是年

△ 国民党甘肃省从本年开始将田赋改征实物,并将各项临时摊派纳入田赋正额,一并征实。赋额较以前增加180%。同时按照田赋正额,开始征购军粮。

△ 在大生产运动中,陇东分区共开荒5万余亩,增产细粮1.6万余石。

△ 国民党甘肃省增设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署设武都,辖5县。

△ 据甘肃贸易公司调查统计,本年甘肃全省小麦产量为1500万余石,大米35万余石,大麦80万余石,青稞200万余石,燕麦70万余石,小米100万余石。

△ 玉门油矿500多名工人因生活无着,被迫出走谋生。国民政府派军警搜捕,枪杀多人。同

时扣押工人家属,进行迫害。

△ 民主进步人士任谦在家乡渭源一带招募近 3000 人,组成“甘肃志愿兵团”,自任团长,开到兰州华林坪训练,准备参加抗战。后受国民党当局迫害,兵团解体。任离兰赴渝。

△ 甘肃矿业公司在《甘肃地质矿产调查报告书》中称,经甘肃矿产勘测总队及矿业公司两次对 40 多个县、90 万平方公里的勘测,发现铁矿 10 余处,沙金矿 10 余处,其他矿 130 多处。查明铁矿储量约 389.14 万吨,沙金储量约 10 万余两。

民国 32 年(公元 1943 年)

1 月

1 日 国民党甘肃省府实行火柴烟类专卖。

17 日 陇东分区专署决定,农历腊月十五日至正月十五日为劳军月。全区掀起劳军高潮,凡参加抗战的国民政府军队军人家属和八路军军人家属,均受到同样优待。

2 月

13 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给领导生产卓有功绩的王震等 22 名领导干部隆重奖励。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专员马锡五、华池县长李培福被授予生产英雄称号。毛泽东为生产英雄亲笔题词。

14 日 三民主义青年团甘肃省支团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兰州召开。选举宋恪为干事长,寇永吉为书记。

是月 广河县回族农民马福善、马继祖父子,在临洮县东峪沟伏击国民党甘肃师管区接兵部队,夺取枪支。继而,马继祖在边家湾击败追剿的保安队。接着,临洮县衙下集王仲甲率领当地贫苦农民揭竿而起,喊出“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和“抗粮、保命、反贪污政府”的口号。一场不堪忍受国民党政府剥削压榨的农民大起义爆发。随之,临洮毛克让、杨华如、刘华一、李德旺,渭源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夏尚忠,定西闵福元,漳县蒋廷珍等人和榆中、康乐、卓尼、武都等地的农民,先后宣布起义。起义民众由汉、回、藏、东乡各民族组成,鼎盛

时号称 10 万之众,史称“甘南民变”。3 月,各族起义军在皋兰马坡联袂举行会议,统一番号为“甘肃农民抗日自卫军”,公推王仲甲为总指挥。下属 10 个路军和洮岷路藏军。王仲甲、马福善、毛克让、杨华如、黄作宾、肖焕章、安华雄、苟登甲、王德一、任廷祯分任各路司令,肋巴佛任藏军司令。起义军杀富济贫,开仓放赈,震撼了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后在敌人的重兵合围之下,至 8 月底,甘南农民大起义失败。

3 月

16 日 国民党甘肃省府按照财政部通令开始征收竹木、皮毛、陶瓷、纸箱 4 项新统税,原战时消费税停征。

是月 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高中学生毕业后,须服务社会半年,方可报考大、专院校。

△ 据统计,截至是月,陇东分区庆阳、环县、合水 3 县就减租土地 228.4195 万亩,减租 9.3833 万石。

△ 陇东分区行署专员马锡五,在华池县调查处理了“封芝琴婚姻案”,创造了“马锡五审判方式”(此案后被创作成戏剧《刘巧儿》。)

4 月

3 日 中共中央决定审查干部。康生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把甘肃地下党诬为“红旗党”,主要负责人和在边区的原地下党员几乎全部被关押审查。致使刚组建的甘宁工委陷于瘫痪状态。此后,陇东分区各县及新正、新宁县,也在“抢救失足者”的影响下,在干部中抓“特务”,伤害了不少人。1944 年春,中共中央开始对受冤屈的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

21 日 国民党甘肃省府划拨临洮县官堡、宗丹、三甲 3 乡(镇)及渭源、岷县、临潭各县与卓尼设治局毗连插花地区,成立会川县,县治设官堡。

6 月

上旬 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主使特务分子假借“民众团体”名义。叫嚷“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并调集四五十万兵力包

围陕甘宁边区，多次进行军事挑衅。《甘肃民国日报》连续发表反共社论。在兰一些由国民党操纵之社会团体也配合进行鼓噪。

△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七分校，由山西兴县迁至华池县东华池。由总校副校长彭绍辉兼任七分校校长。

7月

10日 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万人集会，愤怒声讨国民党政府破坏抗战，发动内战的罪行。并致电蒋介石、胡宗南立即制止内战，共同对敌。

8月

1日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病逝。遗缺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继任。兰州市有人为蒋介石独裁政治装璜门面，向蒋介石呈献“万岁册”。

是月 国民政府公布遴选甘肃省第二届临时参议员35人，候补参议员18人。张维为议长。

9月

18日 陇西县城中小学学生集会游行，驱逐国民党陇西县长丁玺，持续一周。兰州部分学生声援游行，并向省政府请愿，迫使谷正伦免去丁玺职务。

10月

是月 国民政府全国水利发电工程总处在天水设立水力发电工程处。开始修建槽河王家磨水电站。至1954年12月建成发电，装机容量180千瓦。这是甘肃最早的一座水力发电站。

11月

1日 陇东分区召开首届生产展览及劳动英雄大会，8名劳动英雄到会，展出农工产品121种。

8日 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撤销。是日，办事处副官赵芝瑞等5人离开兰州返回西安。

26日 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者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陇东分区59人出席。华池县的张振财、新正县的张清益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华池县城壕村被评为模范村。

12月

是月 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根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提出“西北十年万井”计划。决定自1944年开始实施。按此计划，曾组织勘查，培训凿井人员。但行动不大，最后不了了之。

△ 陕甘宁边区各县实行“精兵简政”及开展大生产运动。各地成立变工队、扎工队等互助组织，并发放农贷，提高群众生产积极性，提高人民生活。

△ 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同盟胜利公债”，摊派甘肃7000万元。实募7108.7万元。国民党甘肃省府又发行“整理省债公债”1000万元，以行政命令向各县摊派。

△ 国民党甘肃省府将田赋附加改称“公教食粮”，每斗按田赋正额加征三成。并规定各县驻军副食费、马干费及征购、征用皮毛、输送等敷衍差价，均由地方统筹分摊。人民负担奇重。

△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成立。常书鸿任所长。

是年

△ 陇东分区各县农村开展变工互助活动。参加变工的有组织的劳动力占总数的20%，参加锄草变工的1.3547万人，占劳力总数的33%；参加集体开荒的有751户，共1365人，1029头牛。

△ 陇东分区是年安置国民党统治区河南省移民、难民529户，2281人。三年来，共安置移民1213户，约4460人。

△ 国民政府借口抗战军需浩繁，财政困难，将公粮由征购改为征借，只发粮券，不付粮款，规定借粮不计利息。自第5年起分5年平均偿还或抵纳当年应完田赋。核定本年全省征借总额为200万石。嗣因灾情严重，请准核减为160万石。1944年又增为185万石。

△ 静宁至秦安公路工程竣工，全长125公里；西至敦煌公路工程竣工，全长119公里。

△ 省妇婴保健所在兰州开展婴儿死亡调查。以2岁以内婴幼儿为对象，共查4173人，其中1岁以内婴儿死亡495人，死亡率为11.86%。

延安时期的一项战略安排

——陈云转岗

王 杰

1944年3月初,党中央“决定陈云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81页)。当时“不少同志得知陈云同志这一调动情况时,都表示不理解,认为:陈云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干得好好的,怎么又调了呢?”随着陈云在新岗创造“令人瞩目的成就”,(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页)议论日渐淡化。但“不理解”依然存在沉积成了一个历史疑谜,60年后出现颇有权威的两种不同诠释。一是“排挤说”。2004年5月26-29日,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北京召开的《陈云研究述评研讨会》上,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朱佳木同志在28日大会发言中谈及此事,说当年陈云因抵制康生“左”的做法,被排挤出党的领导核心。二是“加强领导说”。《陈云传》说:“其实,让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说来,面对国民党当局经济封锁的严峻形势,发展生产已成为突出问题,而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又担任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不可能很多地顾及这方面的工作,因此迫切需要加强边区财经工作的组织领导力量”(金冲及主编:《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52页)。

之所以60年后仍在寻求当年陈云工作岗位

转换事答案,盖因此乃中共党史上既关系当时、更影响长远,且涉及厘清陈云生平而世人鲜知案底的一件大事。

一、既成说质疑

1.关于排挤说。当时,陈云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康生兼任中央社会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每向中央社会部介绍去七八位干部,通常要被退回三四位,被退回的同志思想压力很大。陈云派中组部干部科负责人王鹤寿找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传达陈云不同意以“左”的眼光看待干部的做法。中央组织部派往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经常以家庭出身不好或本人社会关系复杂为由退回。陈云要王鹤寿当面对负责中央党校干部工作的曹轶欧(康生之妻——笔者注)讲:“你曹轶欧的家庭关系也不简单,你在上海大学读书时,社会关系也复杂,你能否定自己吗?而且经过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研究,决定介绍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你们不接受,是党内不正常的现象,你们的理由也是站不住的”(王鹤寿:《沉痛悼念陈云同志》,《人民日报》1995年7月21日)。陈云不同意和抵制康生对干部的错误估计和错误态度,就能成为康生“排挤”陈云因由,不能贸然论定。陈云抵制康生推崇“抢救运动”扩大化,引发与康生意见相佐加剧,发生在1943年7月15日康生作《抢救失足

者》的报告之后。而毛泽东首次提出“今后，陈云的工作转入生产方面”（《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1页），是在1942年8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若此为康生“排挤”结果，则出现后果引发前因，因果倒置的逻辑错误。况且，陈云和康生均为中央书记处和要害部门主官，康生是否具有排挤陈云出中央书记处的能量，太值得怀疑！如果毛泽东因为听信康生一面之词，而在1944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度提议陈云主政经济（《陈云年谱》上卷，第381页），既无过硬证据，又太过低估毛泽东洞察人事水平，不符合常理。况且陈云在中共七大政治局委员中，位列五大书记之后第一，两月后又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是故，“排挤说”难以令人信服。

2.关于“加强领导说”。党中央授命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工作，加强经济工作领导意图明白无疑，故“加强领导说”不错。但毛泽东早在1942年即有此提议，时隔一年多之后再次提议、力促成行的事实显示，此乃毛泽东谋划已久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安排。以“加强领导”淡定，既难解释延续达60多年的疑惑，也轻化党中央、毛泽东既急务当时又统筹谋划长远重大安排的战略意义。

二、遴选陈云主政经济——毛泽东深谋远虑的战略筹划

（一）毛泽东谋划遴选担当经济统帅

1942年，毛泽东总结陕甘宁边区五年来公营经济建设，“对于我们，对于我们的民族，都是值得宝贵的非常巨大的成绩”，“我们建立了一个新式的国家的经济模型”（《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15页）。毛泽东十分严谨的采用新式的国家的“经济模型”，明确包含“模型”即已成就，亟待放大成“新式的国家的经济”，乃坚定不移的既定目标。遴选“新式的国家的经济”统帅，既是“加强领导”之亟需，更是实现“经济模型”升华为“新式的国家的经济”的当务之急。这在逻辑上毫无疑问。但这不仅仅是逻辑推理的结论，而且更是经济现实迫切诉求的使然。

中共高举抗日大旗，吸引大批文化人口、难民

云集边区，生产供给不能满足消费需求急趋突出，迅速酿成持续积累坐大的“鱼大水小”矛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因于国民政府拨发军费和海内外民众援助为主的外援支持，“鱼大水小”矛盾得以暂时平衡。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断绝边区军费并实施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催化“鱼大水小”矛盾，致陕甘宁边区经济危机（王杰：《陕甘宁边区经济危机及其成功化解》，《光明日报》2012年6月13日）深化。其中的粮食供求危局，虽因经济指导思想从发展辅助经济转变为发展自主经济，推动大生产运动持续规模化发展趋于缓解，但经济危机根源并未消除，重心转至市场物价、财政金融领域，蓄成恶性爆发待发之势。毛泽东对经济危局蓄势待发之势洞若观火，高度关注。1941年初的两个半月内，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多次给林伯渠、谢觉哉写信，达五万多言。7月31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林伯渠、谢觉哉，说：“现行政策的几个根本点（预算分散，纸币，运盐）又在执行之中，最后的谁是谁非，还无法做结论”。“我现在不能断定纸币与运盐不失败，我同二兄谈过，如弄得不好，也许要失败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更大”。“注意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例如在税收工作上，在纸币发行工作上，在领导方式上，我觉得都是有严重缺点的”（《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315页）。此信十分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既明确边区经济大政和“领导方式”大失确当——“我觉得都是有严重缺点的”，又对当事者欲采用的“另一政策”并不认同——“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更大”。严重忧虑陕甘宁边区领导统筹全局经济乏力，遴选“新式的国家的经济模型”经济统帅，已成毛泽东统筹全局战略势在必行的重大部署。1942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今后，陈云的工作转入生产方面”的提议，虽因故未能成行。但当此扭转经济危局成为全党第一要务，而统筹全局经济乏力之际，毛泽东作此提议，已明确遴选陈云担当经济统帅。

(二)史实证明陈云堪当经济统帅

面对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必须“把东西卖出去”(《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页)的现实,统筹全局的经济统帅,必须既懂经营商品经济之道,又谙管理。陈云出身经营商品经济家庭,又长期学习和经营商业,熟谙商品经济运行大观。担任临时中央特科书记期间,主持几十家店铺成绩斐然,受到共产国际代表“这个人不简单”(《陈云传》,第108-109页)的肯定。后又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独具做生意经历和懂经济特长。而且陈云有出色组织大规模活动的经历。准备长征期间,陈云负责后勤和军工生产,在原定准备期限从三个月缩短到两个月时间之下,“筹集了六十万担粮食,供红军西征开始阶段食用。还加紧生产弹药,弹药生产增加了六倍到三十倍。还给战士置备了特制的军服,筹集了必需的通信器材。”“这一工作完成得很出色。”(《陈云文集》第1卷,第2页)。长征途中渡金沙江时,陈云担任渡河指挥部政治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指挥中央纵队先行渡江,在江北岸的石洞里指挥;陈云则南岸组织指挥大部队上船。陈云坐镇渡口,对渡江的每个细节都进行了仔细周到的考虑,每趟渡船来回需要多少时间,每小时、每天可以渡多少人过江,谁先过谁后过,都安排的井井有条。”(详情见刘武生主编:《巨星灿烂》,《陈云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及《陈云文集》第1卷,第74-75页)。“5月3日晚部队开始渡江后,陈云夜以继日在江边现场指挥。经过几天几夜连续紧张的工作,到5月9日,全军井然有序地渡过金沙江,没有丢一人一马。当国民党追兵赶到金沙江岸边时,红军早已过江多天,他们只能望江兴叹了。”(刘武生主编:《巨星灿烂》,《陈云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第37页)。“红军就摆脱了几十万规模的军队的紧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56页)。而且陕甘宁边区财经关系全局,如陈云所说,做财经工作“我感觉比

做组织部的工作难得多。组织部对一个人的审查不清楚,可以慢慢地搞,财经这个问题一出岔子,就影响其他工作搞不好。”(《陈云文集》第1卷,第385页)。陈云是党内的年轻资深政治家,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资历深、威望高,号召力强,具统率全局经济的政治优势。所以,在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急需统一经济,有组织、大规模“发展贸易”、扭转经济危局之际,懂经营、谙管理的陈云,历史地成为主政经济的当然人选。故尔,1944年3月,毛泽东再度提议陈云主政经济成行。

实践证明,党中央、毛泽东遴选陈云主政陕甘宁边区经济,确是扭转当时经济危局重大抉择的正确决策。周恩来指出:“在陕甘宁边区搞生产的最高峰只有三年,即一九四三、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22页)。在主政陈云陕甘宁边区经济三年“最高峰”的1944-1945年期间,“改变了贸易入超的被动局面,实现了金融稳定、财政平衡和生产发展。这不仅对打破封锁、实现边区军民的‘丰衣足食’,为抗日反攻准备力量,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为解放战争作了重要的经济准备”(《陈云传》(上),第401页)。“创造了中外战时财经史上鲜为人知的光辉的一页。”(李成瑞、朱佳木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三、高瞻远瞩的战略安排

遴选陈云主政陕甘宁边区经济,既是扭转当时经济局面重大抉择的正确决策,更是党中央、毛泽东谋划造就新中国经济统帅的长远战略安排。陈云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党中央不仅安排陈云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局财经委主任,而且明确陈云是将来新中国的经济统帅。确凿的证据是,“1948年5月,周恩来电告东北局:陈云主要工作目前应主持东北的、在将来则是全国的工业建设。”(《陈云传》(上),第594页)。

延安时期,党中央、毛泽东授命陈云主政经济高瞻远瞩的战略意义,在新中国经济史上更得到

充分展现。建国前夕,陈云运筹帷幄,短平快决战决胜经济战线三大战,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奠定了基础,毛泽东肯定“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三年经济严重困难的“非常时期”,陈云在中央领导集体的支持下,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使国民经济以农业增产为先导,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有效地得到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告》《人民日报》1995年4月10日)。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郑重肯定:陈云经济思想“是我们今后长期

的指导方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4页)。胡锦涛总书记高度评价:陈云同志“长期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成功实践和取得的显著成就,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困难关头,人们总是希望听到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也总是能够不负众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胡锦涛在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13日)。

(作者系甘肃省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

(上接第69页)药,兵卒深受感动,于是士气大振,羌族人得知后,自愿归顺皇甫规,从而凉州道路复通无阻。

原安定太守孙俊贪赃受贿,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稟乱杀归顺的羌民,凉州刺史郭閔及汉阳(今甘谷)太守赵熹均年迈气衰,但他们都依靠朝廷中的权贵胡作非为,祸害百姓。皇甫规得知后向皇帝奏诉他们的罪恶行径,后他们被朝廷分别处死或免职,羌民听到后欢庆了几日,羌族大姓滇昌、沈恬等十余万人顺服皇甫规,从此边境地区平安稳定。

皇甫规率领众人立了大功,又驻守在家乡,从来不以私人恩惠拉帮结派。他还指责、劾奏违乱法纪者,更恨宦官专权者,与他们不相结交,从而使朝廷中的权贵门和地方绅士的不满,于延熹五年(公元162年)诬陷皇甫规买通了羌人,假意降顺,皇甫规受到皇帝的严厉斥责,皇甫规便上书辞职回到了家乡。这一年冬季,他又一次被召回朝中为议郎。按军功应该受到封官进爵领赏,而宦官徐璜、左悺几次示意索要贿赂,皇甫规发誓坚决不送,于是便被诬陷为“赂降群羌”罪而下狱。经太学生张凤等300多人上书辩护,奏请免职回乡。延熹六年(公元163年)又一次召皇甫规担任度辽将军,他到了军营几个月,见中郎将张奂很有才略,就推荐张奂为度辽将军,他担任驱使匈奴的中郎

将。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张奂升任大司农,皇甫规仍为度辽将军。

皇甫规虽然为度辽将军,但他被权贵们多次陷害,常打算告病回家。恰好遇上了好朋友王文(漫)的灵柩由上郡(今陕西榆林县境)送还故乡,皇甫规穿丧服越界去迎,还是被人告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刺史胡芳:“皇甫规擅离军营,违犯军律,应予劾奏”。但胡芳惜其才而不听。延熹九年朝中发生“党锢之祸”,朝中忠良大臣大部分被株连,皇甫规未被牵连而感到耻辱,于是上书说他原推荐的张奂已是度辽将军,是他们的附党;在狱中时张凤等人上书救他,是为党人所依附,应当论罪处罚。但朝廷未加过问,人人称赞皇甫规贤良。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召皇甫规回朝廷为尚书。在夏季出现了一次日蚀,皇帝诏问得失情况,皇甫规以“党锢忠贤之应”奏对答,因皇帝对他的回答不满意被降职为弘农太守。不久封为寿城的亭侯,皇甫规辞让未受,又改任护羌校尉。汉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因皇甫规病重召回朝廷,走到洛阳西北就去世了。皇甫规一生著有赋、铭、书、章表、教令等27篇。据《增修华亭县志》记载,皇甫规去世后葬在范家庄(今华亭县东华镇王峡口村范家庄)。

(作者单位:华亭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张掖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ZHANG YE SHI DI FANG SHI ZHI BAN GONG SHI



主任 何成才

张掖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工作职责

- 一、编纂《张掖市志》与《张掖综合年鉴》
- 二、指导县(区)修志
- 三、督导编纂综合志、行业志、部门志、乡镇村志
- 四、组织评议和终审县(区)志、行业志和部门志
- 五、进行全市编史修志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 六、培训史志编纂人员
- 七、编写地情丛书
- 八、建立史志资料馆
- 九、开展读志用志活动
- 十、督导地方史志学会开展史志学术研究, 编纂史志学术成果



工作人员在一起开展研讨

张掖市地方史志学会职责

- 一、采取各种方式研究地方史志, 撰写研究成果
- 二、挖掘、整理史料、编辑出版《张掖春秋》
- 三、编写地情丛书
- 四、协助编审各种史志、图书



地情资料



张掖地区志



2007、2008年出版的地情资料



